

炎黄春秋



当代女包公——刘丽英

我的同学蒋经国

冯玉祥将军 的戏剧人生

西伯利亚 一个中国囚徒

硬骨头名臣范仲淹

人民加奥不是毛子?

5

94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
文化傳統加強社會
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江澤民

一九九四年
元月十八日

本

期

导

读

当代女包公——刘丽英

审江青，判“二熊”，拉风流省长倪献策下马，送暴敛书记叶妈坎上断头台……她，明镜高悬，包公再现。

我的同学蒋经国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的“蒋经国时代”已成历史词汇。这个历史人物，仍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回忆的事……

人民币是不是毛了？

当前，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物价亦频频上升，老百姓在大喜大忧中惊恐地注视着：票子怎么了？

西北利亚，中国囚徒的诉说

奇特的命运，把一个革命者卷进西北利亚严酷的冬天，现已 90 高龄的苏子元，向我们讲述起他那段惊心动魄的人生之旅……

硬骨头廉政名臣范仲淹

他刚直不阿，一身是胆，敢于直谏犯颜，一生六起六落，忧国忧民至死不变。

冯玉祥将军的戏剧人生

海峡两岸称赞冯玉祥是“丘八诗人”，“平民将军”，“抗日名将”，“反蒋英雄”。熟知冯先生生平的本文作者，却对这位传奇人物提出若干令人信服的新说。

我所知道的军阀韩复榘 不是草包

被蒋介石诱杀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他的笑话早已风闻天下，都认为他是粗通文墨的一介武夫，笔者以亲见亲闻的事例告诉我们，此人有满腹经纶，为人精明诡诈。

他们创造了中国的 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为赶上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水平，中国的军事科学家们，夜以继日的劳动，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导弹的水下发射。

《炎黄春秋》1994 年 第 6 期

要

目

- 萧克：陈独秀诗集序
- 难得清醒
——一个老编辑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
- 辽沈战役我一直在林彪身边
- 李立三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写实
-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查账大员李毓昌遇难记
- 陈毅和小藏胞的故事
- 一个台湾老兵探亲记
- 中国法西斯——康泽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镛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石福生

责任校对: 任 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 码: 100802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元

专 稿

④ ⑧
④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⑧ 当代女包公——刘丽英

萧克

段向群

春 秋 笔

③⑩ ②④
③⑩ 西伯利亚, 一个中国囚徒的诉说
②④ 冯玉祥将军的戏剧人生

于蔚

陆立之

英 杰 谱

③⑧
③⑧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二三事

陈斐琴

殒 星 篇

③⑤ ④②
③⑤ 贺龙惩罚日本军火商
④② 郭沫若和鲁迅的笔墨官司

宋川何善

黄侯星

目 录

他山石	古镜台	时 代 风	遗闻录	求实篇	神州光	文荟园	人海浪	古今谈
④④ 惊世名记者法拉奇的中国情 王基高	⑤⑧ 硬骨头廉政名臣范仲淹 徐庆全	④⑧ 人民币是 不是毛了？ 明天，信用卡能代替人民币吗？ 夏日 让老外目瞪口呆的中国大款 龚雯 银行的钱是怎样进入市场的 孙勇 毛泽东不同意把他的画像设计在人民币上 钟丹 第一张人民币面世 标志一个新时代 左丹 您认识钱吗？ 钟丹	⑥③ 蒋介石的匕首——戴笠 荣华 江安	①⑥ ⑦② 我所知道的军阀韩复榘不是草包 陆立之 ①⑥ ⑦② 我的同学蒋经国 陆立之	⑦④ 他们创造了中国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彭子强	⑤⑥ 读《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一文有感（七律一首） 苏渊雷	⑧① 「文胆」陈布雷之死 王晓华	⑧⑤ ⑦③ 重贿无廉臣 ⑦① 萧何会做官 ⑦① 曹操为啥要曹丕当接班人 竟陵子 ⑧⑤ 军阀政客与风水迷信 刘秉荣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萧 克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百志全体人员大会。首先，我们要感谢花都市委、市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个总结布置工作的机会，感谢各界朋友光临指导。

自去年新春开笔以来，《中华文化通志》的编撰工作已由拟定提纲、收集资料的阶段，进入到撰写阶段。有几位同志已拿出了初稿。现在召开这个会议，让大家一起回顾一年的工作、相互交流、切磋，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明确编写原则，统一技术规范，是必要的。

这次会议要求各志汇报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沟通思想，进一步探讨如何突出文化特色，处理区别“史与志”、“述与作”的关系，解决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还要就某些志的内容作适当分工与协调，以避免交叉，减少重复。总

之，希望大家就如何发挥整体优势，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为推进《通志》全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上真正融为一体，构成不可分割的高质量的整体，充分发表意见。

同志们！我们集中这么多人，用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作这件事，是因为通过编撰《通志》，可以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进行一次系统全面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这是炎黄子孙盼望多年的大事。同时，更为重要的，中华文化是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纽带。编撰好《通志》，使许许多多的炎黄子孙通过《通志》求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共同为弘扬民族文化努力奋斗，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有力地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最近，江泽民同志为

《中华文化通志》题了词。题词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文化通志》是一部大型著作，是百人以上的集体创作。这么多专家在一起，气势雄伟，力量巨大。当然，也会有许多矛盾，需要协调、统一。同军队打仗一样，各军、兵种若干部队，必须协同动作，才能发挥力量。主编作为一个方面的指挥官，必须心中有数。按照统一部署，对各志编写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严格的质量标准，一本一本抓落实。要做好这件事，主编和作者都需要下大力气。大家坐下来，认真讨论，务虚又务实，把具体的要求，一条一条商量好，以便共同遵守，达到共同目的。

《通志》的核心问题是质量。这样的著作是千百年的事，要一字不苟，连每个标点都要准确，才能有利于以文化的形式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对历史和人物的叙述，要求实存真。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两句话很好，“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思想要明确，内容要充实，不能言之无物。这样，就能使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层次分明而连贯，重要内容不遗漏，也不重复。

要提倡竞争。大家在整体配合时，需要协调、统一；但在个人写作时，必须人人都有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的精神。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后，各典各志，读者自有评说。所以，希望大家在写作过程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书写好。没有协同，书稿不易统一；没有竞争，就没有高质量。而没有高质量，就没有生命力，就很难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目的。

我们写中华文化通志，要充分估计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马克思把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对世界历史所发生的作用，提高到“预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的高度。说“火药把骑士阶层打得粉碎”，认为指南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这样高度评价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成就，我们自己更应该作出充分的估计。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



泽东同志这段著名的话,有几个重要思想,一是“数千年的历史”,说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二是“有许多珍贵品”,指出这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东西;三是“有它的特点”,要求对这些特点认真研究,把它揭示出来;四是要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这段话,应该成为编撰《中华文化通志》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用发展的历史眼光,来研究、分析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所说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指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在中国土壤植根、发育。当它和中国文化相融合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文化的个性,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因此,继承并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是炎黄子孙的义务和责任。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并存。我理解,人们所说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起积极作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糟粕”是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阻碍作用的部分。我们为了祖国的兴旺发达,要继承与发展优良的方面,即带有科学性、民主性等优良传统,这样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对糟粕和消极方面要采取扬弃的态度。

“糟粕”在当时是社会现象,要承认其历史事实和历史性,但又要取批判的态度。同时,还要注意,那些糟粕,即便已被历史抛弃,也有残余,甚至回潮。如秦献公废除了殉葬制,过了一千八百多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把这种历史上极为丑恶残忍的制度恢复了。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君主专制,仅仅四年,袁世凯又要做皇帝了。又两年,张勋又拥戴溥仪复辟了。近几年,残余的陋习也出现不少,看宅基、相坟地,迎神送鬼,兴建龙王庙求雨,立石狮子避邪,歌颂桃园结义,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贪污腐化等许多丑恶现象,在五十年代几乎绝迹的沉渣又浮起了。这是应该反对和批判的。

这里还强调指出的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不认真分析,轻易的接受或否定,是不对的。我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

还有一个“古为今用”的问题。中国优秀的历史家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早就提出了“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古为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等,没有这些优良传统的保存与发扬,是不会有今天的,更谈不上“古为今用”了。然而,“文化”是一种“系统工程”,是牵连着民族素质、民族性格的复合的东西,不是一堆零乱的器物,不能拣来就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给以总结”,“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这里讲的是“总结”,讲的是“指导”、“帮助”。我们今天编撰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目的也是对“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有重要帮助”。不认真地分析与总结,是难以做到“古为今用”的。我们都还记得,文革时期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搞的所谓“古为今用”,对文化的破坏有多大。我们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传统文化,不要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搞实用主义。

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它必须随着世界的潮流前进。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变革必然要求人们进行观念形态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换,行为模式的转化,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文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做:“传统文化要和现代化接轨。”

世界的趋势是文化在多样化的各种文化系统的个性高扬中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使世界文化既丰富多彩,又打破封囿,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共同创造出新时代的文化。我们要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打开眼界,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我们要以新的精神面貌,跨进现代化。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有优良的民族传统,自古以来,就有勤劳勇敢,急功好义,为国捐躯,为民请命,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团结统一,择善而行等等。现在我们继承这个传统,就力量无穷。

我们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近几十年的壮大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有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多年,虽然走了许多弯路,但取得了成功,也取得了教训,

我们的事业在继续前进中。不久前党中央号召党学习《邓小平选集》第三卷,这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文献,要认真学习。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与借鉴各国、各民族的有益的文化成份,建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事业的发展。

同志们,文化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学得很少。今天讲出来,带个头,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百卷巨著《中美文化通誌》介绍

这是第一部对中国与中美文化通誌自至今
分门别类通誌的全面系统概括与总结
体的巨著型著作。
它阐明中美关系史的总體结构历史
史沿革和主要特征。
它阐明中国各地域、各民族与文化的
上的贡献及其融合互化的过程。
它阐明中美关系史与世界经济、其他文化的
交流以及中美关系史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
它阐明根据史體例设计历史与逻辑
转换的原则进行设计,在充分研究
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以通誌阐明了的史
实准确地说明历史了事实。

它是国内第一次运用竞争机制
招标招标办法,集海内外专家学者
合作的多级跨工程,是海内外专家学者
多所资助中美关系史研究委员会
行會長陳其邁將軍主持,得到社會
各界大力支持,民力支持了業。
全書共百卷,約三千萬字,一九九二年後
計程加修稿,一九九三年出版,作者一九九三
年初出版,一九九六年出版發行。
歡迎海外各界有識之士關心支持
這項弘揚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
的大業,為章炳著,陸族同輝。
中美文化通誌編委會

●段向群



中国经济改革大潮峰回路转，社会某些机体自然会导致结构性量与质的精神嬗变。人们需要公允的法制制衡，需要能够抗御和根除腐败病毒的黑衣执法人的社会庇护，这是正在步入小康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渴望。

当代女包公 ——刘丽英



刘丽英是谁?其尊姓大名极普通,中国老百姓恐怕有九成人家说不清道不明。

如若提起12年前公审天字号第一夫人——江青的那位不辱使命大义凛然的女审判官,提起敢把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拉下马的那位铁面无私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负责人,或是整顿铁道部以车谋私查办在职副部长等20余位部、司局级干部的重大案例,或是查处山西运城地,县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亦或是协力查处海南进口汽车走私案、公审枪毙广东省海丰县“走私”书记叶妈坎的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却真真切切出自这位被誉为“当代女包公”刘丽英的破解和决断。这位曾长期投身公安战线以刑侦破案著名的“女福尔摩斯”,以她那干练、机智和敏锐的洞察力,常常出奇制胜,敢于将身居高位结党营私者绳之以法,着实令国人拍手称快。

运城试剑

当年著名的抗日烽火圣地吕梁山,革命胜利后,山川依旧,民俗依旧,灾祸依旧,泛滥成性的黄河水依旧困扰着不少边寨山村,再经“文革”的动乱,已到穷极潦倒的地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春风劲吹下,人们刚刚摆脱节衣缩食的窘境,侵吞民脂民膏风、损公肥己风在这一地区却愈演愈烈,其严重性、危害性已对初见成效的改革方向形成最为直接的政治冲击。

当时刘丽英刚刚结束中央两案办公室的审理工作,调任中纪委担任常委兼管纪检三室(即华北东北室的工作)。一天,她在中纪委会办公室的写字台前,收到一封山西省

运城地区纪检干部张戈用鸡毛信形式寄来的十万火急的长信,信中以大量调查材料和很有说服力的内容,反映他所在地区地县级一批新的权贵,挪用扶贫救济款或占盗用国家防洪建材,扩建自己私宅的不法行为,而张戈本人因秉公调查有关案例,全家遭受多次打击报复。张戈的信,刘丽英连续阅读了三遍,她极敏锐地从那封千钧字迹间,预感张戈提出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偏远的运城地区,从近期与日增多的群众来信看,反映了当前建房热潮中的不正之风已遍及全国各地。她正患高血压,服了降压药,决定推迟住院,立即向中央和中纪委起草了由自己亲自带组奔赴运城深入调查的意见书。她的请缨入晋查案不到24小时,便得到中央和中纪委领导同志的批复,她顾不得按正部级规格,仅购得普通中铺卧铺票,便率办案小组驰往三晋大地。

运城地区经十年内耗,人际猜疑,裙带风盛,成为落实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的落后地区。

刘丽英率领的中纪委、省纪委及省公安厅的专案组的突然前来,运城地区的领导班子和社会舆论却冷清异常,地委、地纪委与中纪委调查组第一次碰头便会开得极平淡。地委一些干部认为张戈反映的内容严重失实,提出的问题兼有个人成见,至于遭打击报复,似乎只是个人家庭间的恩恩怨怨。他们在汇报时,很不客气地提醒刘丽英:地委及各县委领导班子很团结,个人意见是否值得兴师千里,甚至问及刘丽英与工作组成员订几日的返程车票。刘丽英颌首微笑道:“怎么连做客都不欢迎啊!吕梁可是老根据地,来学习学习长长见识嘛!走马观花总比下车伊始鸣里

哇拉更合乎我们作为客人的身份吧!”刘丽英与工作组人员在地委招待所安营扎寨,一连三日,工作组按兵不动,全力审阅地委和地区公安局送来的张戈一案的预审报告和有关材料,刘丽英则声东击西地先去查看风陵渡黄河东岸的防洪工地,这是由黄河与汾河交汇九转弯回向河南境内三门峡流经的黄河中游最险峻的洪泛地带,几个世纪来,天灾人祸中水患为先。刘丽英眺望着枯水期的黄河大堤,堤外是几乎没有人看管的防洪工程指挥部的仓库大院,偌大的院中已被窃取一空,剩下的水泥和木材只够搭鸡棚,若是来一场黄河洪患,这点建材如何抵挡得了!刘丽英看到一位站立在院中央、仰天长叹的年迈农民,他拄着木拐,颤巍巍地,脸色木然,刘丽英迎过去问:“大爷,您是看场院的?”

“看,看个鬼哟!”老汉铁青着脸,叱道,“俺是赶来看戏台子的!偷吧!抢吧!明个还扒黄河大堤哩!”

“这没有人管吗?你们这儿的干部为什么不管?”

“干部,哼,要不是干部带的好头,谁个敢!”老爹放开壅塞已久的心怀,向刘丽英述说起一张条子拉走一车料的事……

刘丽英没料想事情比预料的严重得多。她与工作组人员在一座拢着煤火的木板房,找到领班的门卫。

“没法子!”那位淌着清鼻涕的年轻门卫摊开手,辩解道:“都是拿条条来的,开车来的,这个长那个书记,俺也识不清,反正,反正,都是公家的,拿就拿呗!”

“小老乡,那些白条条还在吗?”

“在哩!”那汉子从盛烟叶的筐

箩筐中找出一摞纸条。

“能借几张给我使使吗？”

“成，反正也没用！”

刘丽英将几张白纸条交给秘书陈群，自己披着军大衣，漠然离开了这处混乱不堪的工地现场。

地区行署车队的吉普车载着刘丽英等人，环着运城的郊县绕行一周。的确，从城乡环境比较，尽管运城地区不少村镇农民家庭收入和水平，还在最低贫困线以下，但，各县蓬勃发展的私人建筑，已非常惹人注目，那鳞次栉比的私宅楼院，还真挺讲究和气派的……那是人大主任家，地区水利局副局长家，邻近县张县长他爸爸家，地区副专员亲外甥的……那一幢幢小楼更是气魄恢宏。

刘丽英应接不暇的双眼离开飞快移动的车窗，回头问陪同的干部：“附近有穷点的村子吗？咱们随便走访走访！”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行程，这位地区派来的向导原以为刘丽英等人会同以往的上级、领导干部一样，例行公务从黄河公路直去潼关、华山、贵妃池游历尽兴，或是去侯马附近看晋墓、晋碑……，公差者，游也，即使是明朝廉吏海瑞大人也不乏天水南郭寺留笔。此刻，向导预感到这位中纪委委员“来者不善”，只得叫住了车，转向驰往吕梁山深处。

半月之后，工作组兵分五路，根据按图索骥的线索，查找各种蛛丝马迹的细节。刘丽英是老公安出身，对刑侦预审的程序了如指掌，但这个身份却无人知晓，地区公安局提供案情的预审员和该局的几位主管，似乎不屑多作介绍，因为，隔行如隔山，党纪归党纪，司法归司法。什么叫提供伪证，什么叫查无此证，她懂吗？

刘丽英不露声色，她不仅将张

戈的背景情况了解深透，也对挟私报复的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工作，甚至跑了五省三市收集材料。同时，也对张戈反映公款建私房的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情况，做了周密的核实，案情大体已弄清。那些对本案表现异乎寻常兴趣的关键人物，总想弄清这位女特使的动机和谋略。公安局的一位头面人物甚至找上门来，挑开天窗说亮话：“刘常委，张戈那件事不就是撂几块土坷垃，偷鸡盗狗的邻里之争嘛，这个案子……”

“我们司法部门只对构成刑事犯罪的事实和作案细节感兴趣！”刘丽英单刀直入，“实事求是是案件调查工作的第一要素，对所发生的案情不做深入调查，不做周密的分析，简而化之，轻描淡写，这恐怕不是你们这样的老公安的一时糊涂吧！”

“……”

那位公安局负责人语塞了。刘丽英含蓄的批评，既暗示工作组近期调查所掌握的重大线索，也很机巧地使这位已处在尴尬的地区“同行”有台阶可下。

此后，运城张戈事件很快如笋剥肉露，真相大白，原来案情正如刘丽英分析判断的不差毫厘，张戈遭受打击报复一案，肇事人的确受某位局领导的主使，挟私报复，经历数月的法纪调查，围绕运城地区地县领导干部建私房的典型事例，一一曝光，那些强取豪夺人民赖以养家糊口的救济款，那些凭借手中职权盗用防洪建材的蠢虫被无情的恢恢法网所严厉惩处。

公审“女皇”

八十年代第二个春天，公检法

从文革废墟中重建，法天下替换家天下，人性复归，党开始恢复威信。

春寒料峭时节，京城万人空巷，围聚在电视机前，群情激动地目睹“红都女皇”的最后一幕。

桀骜不驯的第一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法警送上法庭，一人之下的她，依旧摆出“国母”派头，倨傲、矜持地昂首在被告席上。

法官席几位不动声色的老资格大法官，正襟危坐，蓄势待发，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位英姿勃发，不卑不亢的女法官，她气度庄穆，目光峻冷，那炯炯的正义眼神，从气概上已经压倒“领袖夫人”的戏剧性脸谱，她就是刘丽英，文革中爱人（原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冤死狱中，她负责对江青等人的案件审理已近三年，对江犯罄竹难书的罪行了然在胸。

公审伊始，“女皇”施展了三十年代赖以成名的演技，刁蛮泼辣，连续公审三天，更是张狂无忌，她甚至脱下脚上的布鞋敲击桌台或摘下眼镜闭上眼睛装死装活。

在公审前的准备会上，已经预料江青的所作所为，并责成刘丽英为主审。

“哼，”江青色厉内荏：“我江青心里没鬼，我谁也不怕，我永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普通一兵。我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哼，华国锋为什么不来见我，还有叶剑英、汪东兴呢……哼，他们是怕见到我，怕见到革命，怕……”她希望用这种激昂的文革语汇，唤起人们对那个狂热时代的敬畏。

“李云鹤！”刘丽英倒竖柳眉，义愤填膺，她朗声喝道：“毛主席老人家健在的那些年代，你又作过几

件按毛主席指示办的事?毛主席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你却挑动群众斗群众,搞武斗不搞文斗。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你却支持停产闹革命,毛主席三令五申不准军队搞四大,你却要揪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指示要团结党内外一大批同志和朋友,你却打倒一大批,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有何资格大谈特谈革命二字!”刘丽英一气说尽,并拍案而起。江青一阵颤栗,但她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森然一笑,反唇相讥:

“你很会说笑嘛!你是哪里人,参加过哪一派革命组织?”

“我是共产党员,只有一个党的组织。”刘丽英打开卷宗质问道,“犯人江青,你知罪吗?”

“罪?你说我有罪就有罪啦?犯罪的是你们,你是普通党员,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好,说我有罪,拿出证据呀!什么罪名?什么算党夺

权,开玩笑,这是莫须有!”江青几乎要暴跳起来,她声调哆嗦,脸色发白,并不停地用手帕揩拭额角,又不时用一种什么油剂擦涂太阳穴。

“你诬陷忠良,杀人灭口!”刘丽英义正词严。

“具体点,这么大的帽子也要有个尺寸!”

“犯人江青,你认识一位叫郑君里的人嘛!”

“什么什么,郑什么里?好可笑,我哪记得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名字!不认识!”

“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导演,全国大概有上千人吧!我哪认得过来!恕难奉告!”江青假作若无其事,朝观众席摆摆手,显得莫名其妙。

“你们三十年代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共同演出过《娜拉》、《大雷

雨》你不会如此健忘吧!”

“这算什么问题,无聊、太无聊了!”江青闭目以示不屑一说。

“你认不认识郑君里,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

“就算认识过吧!那又怎么样!三十年代,现在是八十年代,你有多大,还不到40岁吧!我的党龄都超过你的年龄喽!”

“文革初,你伙同反党分子叶群,指使专案人员到上海三次搜抄郑君里的家!”

“这不荒唐吗?我在中央文革就不算日理万机,也不会有这份闲功夫吧!再说抄郑君里的家与我有什么关系,莫名其妙!”

“你还交待叶群不准留活口!”

“诬陷,这是政治诬陷!”江青喊叫起来。

“郑君里同志就是在你的授意下,被冤屈致死的!”

“天哪!全是神话!我跟郑君里很熟咧,有50年交情,他现在在哪?怎么样啦?哦,他病故了!真可惜,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江青,你认识这张字条吗?这上面的字迹你很熟悉吧!”刘丽英从卷宗中抖开一张发黄发旧的便条。

“无可奉告!”

“这是叶群留下的你当年为郑君里案写给她的便条!”刘丽英仍不露声色。

“这能说明什么,犯罪是要有动机的,你有什么根据一定要认定这是我所为呢?”江青仍负隅顽抗。

“这就是你的全部动机!”刘丽英举起几张旧时照片,图片上的那位女明星便是三十年代的蓝苹,这是江青指使抄郑君里家的主因。

“法官同志,你们不是口口声声依法办事嘛!你说我这罪那罪,



畏

……她希望用这种激昂的文革语汇,激起人们对那个狂热时代的敬

你有证人吗？”

“有，请证人郑君里先生遗孀黄晨女士出庭作证！”刘丽英传唤证人。

江青为之一震，睁圆眼睛。

“蓝苹！”一个撕心裂肺的叱责声，上海电影局的黄晨女士声泪俱下地奔到证人席，面对着故意又闭目不语的江青，控诉道：“你也会有今天呀！”

此时此刻，江青面对刘丽英法官滴水不漏的审讯，铮铮贯耳的确凿证词，面对那微黄揉皱的旧时照片，面对叶群煞费心机保留的她的“把柄”，面对冤气冲天的黄晨女士，“女皇”面如槁灰，她突然歪颈掐额，呻吟起来，当场作眩晕状，赖在椅上耷拉下脸面，无语以对。

审判江青一案一晃十余载，那公堂对簿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依如昨日，历历在目，已传为司法界的佳话。

省长作茧

经济改革第二次浪潮，按四化标准选拔的各级领导班子，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骄子，更是舆论界的焦点，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老一代领导者退位让贤的最大受益者。倪本人悬河口才，大声疾呼的改革言论，以其在基层的锐气和魄力，独树一帜，于是平步青云，很快成为封疆大吏。在江西这片沉睡而古老的土地上，倪献策本可以一展宏图、施以雄才大略，这对一位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料想，这位煊赫赫赫的改革人物，却因自身无法掩饰的灵魂瑕疵缺乏自控和不检点的人格因素，随着

扶摇直上的地位终难抵挡财色的诱惑，自甘堕落。

倪献策涉及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的揭发检举过程，是极其棘手和复杂的，一是涉及正省级领导干部的隐私问题，以前没有先例。二是反映的问题和涉及的问题本身的价值有限，但，影响却十分恶劣。三是查处的尺度，如处理不当会造成不良的深远影响。所以，对倪的问题，曾先后由中纪委派赴江西南昌三个调查组，都因工作难度大，不好掌握处理的范围和程度，无功而返，从而使倪的问题束之高阁，反而增加了江西省领导班子党政不和的矛盾，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改革进程。

僵持之间，中央及中纪委决定由常委刘丽英带队，再赴南昌，深入调查，判明是非。刘丽英刚因高血压导致的美尼尔氏症出院不久，身体与精力仍未恢复，当她的秘书陈群将中央决定的文件交到台面时，刘丽英立即请来中纪委四室主任马英杰和案件审查处的同志，重新研究有关倪的调研材料，三天之后，丽英同志已带着由四室抽调的工作班子，下榻在江西省委招待所了。

一蹲数月。起初涉及倪个人生活作风的案情并不复杂，倪本人也确认无误，而如以这件男女私情的案例，且未有更充分的材料作为处理根据，显然是小题大作。但，随着案件的发展，倪不仅不事收敛，仍与那位婚外恋的情人过从更密，甚至变得公开化，这是为什么？刘丽英有个习惯，就是在未做出较合理判断时，她会一个人呆在办公室，一言不发，良久端坐，静静长久地思考。根据倪以往的工作表现，并没有大的疑点，而生活作风问题在原单位也有反映。但，因倪的领导

能力和突出的政绩，便被搁浅不究了。按常理，倪的问题在省委内部敲了警钟，问题又反映到中央，倪应有所收敛，这乃是一般常识，问题恰恰在于倪本人却将有关部门的意见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和那女人暧昧如初，这个表象的背后又是基于何种因素呢？而这种因素的价值难道比身居省长高位还要具有魅力和吸引力？这是个难解的谜。为弄清倪本人的思想动机，她决心从那个第三者的周边关系和情况调查入手。她认为，倪是有意将自己的政治资本作为一种抵押，而竭力掩饰另一方面的问题。

根据刘丽英的分析和判断，工作组人员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发现女方作为一家公司的法人，存在着重大的经济不清的疑点，而且，从极不合理获取政府的贷款方面，显然是通过来自省的批示和特殊关系，这下倪的案情有了重大进展。

刘丽英派人到省工商银行，把省领导批复的贷款条子复印了一份，再让他们整理出那家公司负债情况报告，并由工商行开出介绍信。

那是一家有进出口权的综合贸易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不景气。刘丽英领着秘书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你们是……”女总经理以为是来联系业务的。

“我们是银行系统的。”陈群秘书递上介绍信。

“哦，贵客。”她忙不迭沏了两杯茶。

“上午行里来过电话吧，有几笔款有些出入，我们是来核对一下……”刘丽英措词谦恭，像个银行高级行员。

“听大姐口音像北方人，是

吧？”女经理有些敏感。

“我们南下的口音都差不多。”

女经理对这位“南下干部”确认真是“财神”后，突然表现得十分尊重，迅速找来了会计师。

会计师拿出帐簿和省的批条。

“我看不像有多大错，这样吧，把这些材料复印一份给我。”

刘丽英取走了复印材料，那批条上签字者是倪献策。

这位女福尔摩斯，取得了铁证！又请来省长倪献策。刘丽英是个党性和责任感极强的人，希望倪献策有所悔悟，痛定思痛，但，两人的交谈一开始就陷入敌对状态中。

倪献策恼羞成怒地争辩道：“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我认为对我的个人问题是栽赃诬陷，我真痛心。改革开放的今天，我的工作表现，对改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凭空捏造我的桃色故事，不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还会是什么呢？这明摆着是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是对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妒嫉、仇视和心怀不满，别以为我的沉默就是屈服，我这是蔑视、鄙夷、不屑一顾！”

“倪省长，请用茶。”刘丽英缓和气氛说道，“我请你这位大忙人，随便唠唠家常，我可没有兴师问罪的打算！”

“丽英同志，我知道，今天这杯茶不好喝呀！”倪献策索性直言。他虽没与这位钦差大臣打过交道，但他还是在厂矿担任领导工作时，就耳闻这位中纪委女包公的英名，如今，当面锣对面鼓，使他表现得不安和焦躁。

“是啊，茶味可能苦点，但，能清心宁志、爽神开胃，怎能说不好喝呢？”

倪献策呷一口绿茶，这是他联络感情派人送给刘丽英的上品，他

情绪缓解，舒展眉结，问：“丽英同志，府上好像是关外人家吧！”

“是，哈尔滨人！献策同志，你刚才火气不小啊，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襟胸坦荡，实事求是，知错就改，一吐为快……”

“好，丽英同志，您年长我几岁，不妨就称您丽英大姐吧！的确，我承认我的家庭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美满幸福，夫妻关系也……我可以以党性保证，绝不会有那些非份的事情发生！”

“倪省长，××公司的财务情况你了解吗？”

“哦，这是家中外合资公司，我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我可以安排主管副省长和外事部门汇报此事！”倪献策对这位女钦差突转话题，暗自吃惊。

“听说倪省长曾给这家公司申请银行贷款书上签过字，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吧！”

“笑话，真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

“倪省长真的不清楚这件事情吗？”

“让我回忆回忆，考虑考虑！”在刘丽英严厉的目光威逼下，倪献策举足无措了。

经此后反复核对调查，倪献策违反有关投资贷款规定，私下批准挪用公款额度为一家严重亏损的外资企业借本付息，这样一来，他原来的生活作风问题和经济违法以权谋私问题事实清楚，情节恶劣，其本人对工作组的调查结论供认不讳。

旷日持久的倪献策省长违法乱纪案，终于水落石出。中央及中纪委决定撤销其省长职务，停职检查，消息一经报道，震动全国，对方兴未艾的反腐败斗争，起到一匡天下，以正“朝纲”的作用，并通过倪

献策案侧面反映党中央整顿党风，反对腐败的政治决心。

铁路肃贪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第一命脉，俗话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铁轨铺架，富贵临门”。十年改革，铁路交通功不可没，然而，陈旧过时的路轨状况，超负荷运载系统，超期无法退役的动力机车系统，与蓬勃兴盛的国民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反差，如何缓解交通运输行业“瓶颈”难题，铁道部及广大铁路系统员工甘苦与共、露宿餐风，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终于扭转供需失调，积习成堆的体制病势，为改革做出巨大奉献，位居前沿，拳心可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同于李鸿章杯水车薪的洋务运动，亦不同于七君子井中望月般的维新变法，它是中华民族乃致中国社会一种自上而下强国富民的时代需求，是社会体制吐故纳新、博采众长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物质与精神的观念变迁，必然产生一种负面价值的社会副产品，物欲膨胀，贪风骤起，占有欲，不劳而获欲，死灰复燃，而这种子遗的陈腐思维不可避免地渗透进铁路领导者势力范围。从车皮计划、烟草专列到客货运输，扩大营运等等的供求关系网络最突出的、最走俏的紧缺部门，各种利益使然的机会和机遇，各种随行就市，混水摸鱼的发铁路财的关系网，应运而生，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运营状况，贿风泛滥，贪气四溢，霎时间，里应外合，勾结成网。蜂拥而至的炒家掳客，蝼鼠蛀蚁，车匪路霸，甚嚣尘上，使铁路路风一落千丈，到了不治整顿不足

以平民愤的地步。

面对路风急转直下的复杂局面，中央责成中纪委审理此案，中纪委书记陈作霖、李正亭，再次力荐由刘丽英担纲，临行前，陈作霖书记用皖淮乡音对刘丽英笑道：“这回可又要穆桂英挂帅了！”刘丽英过去处理案件多以外省地区为主，处理国务院部委案件并不多。北京为京畿重地，而中央国务院军委、部委的机关林立，响鼓重锤敲不动“皇亲国戚”，老友故朋却能手眼通天。使许多罪不可赦的案例化解为无头案，使专案调查无疾而终。所以，治理整顿某些资深位重的部委领导的法纪问题，没有排除社会和外部干扰的自制能力，没有一抓到底的决心和魄力，最后只能落得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工作组进驻铁道部，刘丽英参加集体办公，她与工作组的纪检干部，面对庞大而错综甚至犬牙交错的铁路运营管理系统，面对门类繁多、科目庞杂的陌生行业，不要说查找案情所需要的线索，就是分门别类地学习和掌握一些专业知识术语，就得从头学起。但，时间不等闲人，照刘丽英的原话：“办案调查与案情相关的领域，必须先掌握和懂得这个领域的专业范围和知识面，又不能象读大学本科那样旷日持久，因为，办案不是超级马拉松赛，需要多调查少表态，重事实讲效率，后发制人。”

铁路系统办案，牵一动万，案件刚刚有了进展，围绕案情有关人的求情信、托情信、领导手条，熟人垫话，像十面埋伏，干扰了正常的立案侦察工作。刘丽英为此立下规定，凡有此类书信或电话记录等全要报到她的办公室，并列为本案的疑点。

一次，一位曾是刘丽英在沈阳

工作期间的老上级、某部级离休干部××，将电话打到刘丽英办公室：“丽英呵，这可是老大难单位！不好搞咧！就像个马蜂窝，听说你身体也不好呀！是高血压吧！”

“谢谢老领导，”刘丽英像是在汇报，“这里是几十年形成的管理体系，制度松弛，纪律涣散，某些领导部门的衙门作风和行贿受贿问题，都挺让人伤脑筋的！×老，您过去在东北路局工作过，应该比我熟悉这个部门的情况！”

“正是因为熟悉，我才劝你好自为之，别像我当年一样，连台阶都下不来！如今这形势你还看不出来！只有打老虎的口号，没有打老虎的决心，可别太认真了！”

“就是金刚石也得碰，我就不信共产党人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好！这我就放心了！”对方在话筒中开心地笑了。

在立案侦察的日子里，几位主持部机关日常工作的调查对象，仍在分庭抗礼：

“工作组有什么了不起，都五进五出了，我就不信有什么三头六臂，调查吧！抓小辫子吧！干革命工作嘛！谁还没个辫子。”

一天，一封匿名信是写给刘丽英的：“……你家不就在万寿路××院××楼吗！你两个儿子和儿媳在哪上下班，乘几路车，你的小孙子去哪个托儿所，叫什么名字，我们有底！就看你识相不识相！”

“不予理睬”。刘丽英批了几字搁一边了。

因为，这类恫吓对刘丽英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

“丽英同志！”驻铁道部纪检工作组的组员小G将调查综合纪要交给刘丽英大姐，不解地问：“铁道部以前有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部级领导有权签批计划外车皮，如果

根据这条成文，恐怕会使我们的调查工作搁浅的！”

“现在不要考虑部里的规定或条条框框，我只需要知道每年有多少计划外车皮、被谁签批出去的！”刘丽英说话的语气平静。

“铁路吃回扣的情况很普遍，我们到下面调查了几个路局，不少单位的领导对我们守口如瓶或者采取回避态度，一些知情人也反复无常，不做配合，所以，目前的取证工作有些停滞不前！”

“小G，”刘丽英微笑地反问：“你是学什么专科毕业的？”

“法律系！”

“好！坐，我们随便聊聊！”刘丽英顺手习惯地翻了一下小G送来的卷宗，她斜眸问道：“你喜欢纪检工作吗？”

“怎么说呢？”小G坦率道，“照我的理想，是想当名扶正匡义的辩护律师，或者在司法部门当一位秉公执法的民厅法官，调到中纪委连自己都挺意外的，还不是干不好瞎干呗！”

“你是爽快人，你怎么看廉政建设呢！”

“我总觉得廉政跟财政好像总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要广开财路就得网开一面，各尽所能，不择手段，就很难不触及或不涉及廉洁奉公的禁区，而倡廉肃贪必然又限制生财之道，弄得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的。所以，我瞧什么都挺难的，丽英同志，您说呢？”小G畅所欲言。

“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完全不应是对立的。改革开放是主体，廉政工作是为改革铺路架桥，这行工作有时非常像排雷的工兵，要亲赴现场，测探雷区，测定雷位，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排除每一个绝不雷同的引爆装置，这不

仅任务艰巨而且随时有祸从天降的危险。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人丁旺盛，又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人的意识形态多种多样，政治欲望，物质欲望，名利欲望，概而括之，就是在改革开放下的私心杂念作怪。这是我们不得不花大力气给予正视的潜在危险，铁路系统的不正之风，也许会象你们调查的那样，流于形式或表面现象，但，作为国家的运营命脉，是绝不允许此风在我们国家至关重要的部门滋生蔓延，哪怕是一点点苗头也要加以杜绝，何况积案成堆，检举信成筐呢！”

“我明白了！”小G点头称是。

铁道部的纪检调查工作持续一年多时间，共计走访了200多个单位近30个城镇，仅为检查其中有关的细节就耗费了难以计数的复审工作，终于弄清全部案情，人证物赃俱全，行贿受贿者及枉法贪赃之人，上至铁道部副部长及至路局局级领导共计十数人，均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

包公告慰

刘丽英曾在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办案多年，许多疑案，难案，有头案，无头案，经她缜密断结，无不迎刃而解。由是她参与查处女烈士张志新割颈封喉的所谓反革命案，

将辽宁一霸毛运新一伙送上审判席，陡然，声誉鹊起、遐迩闻名。文革中期，刘丽英受冤死的已故爱人所谓公检法系统走资派问题的株连，遭到落井下石，吃尽诬陷、诽谤、罗织罪名等的枉法之苦，她对无法无天的时代深恶痛绝。

七十年代中后期，她从辽宁借调到首都中央组织部，参与对全国几十万含冤受屈的老干部的平反昭雪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叛徒”瞿秋白、“潘(梓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等，后调至中央两案办公室专职审理“四人帮”历时数载。她协助中央组织部参与落实了几十万忠心耿耿的老一辈革命者的政策、查处破获数以十万计的党内新生蛀虫的重大案例的工作，涉及地域之阔、职位之高，为天下亿万民众谋回了社会公道，为党与国家挽回难以估算的政治经济损失，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敢于碰硬，不徇私情是刘丽英多年办案所始终遵循的原则。她在对上海胡小蒙强奸集团案，福州“二熊”案的两个以高干子弟为首恶的犯罪集团办案过程中，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纪国法的立场，强调指出：“此案绝无心慈手软，放任自流的道理，天子犯罪与庶民同罪，这两个性质等同的案件就是由于我们国家法纪不严，以权代法的自食恶果！对这些害群之马，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曾几何时，大陆举报中心，一夜崛起，瞬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案例15600余起，其中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案1900余起，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案494起，打击报复案，违反财经纪律和违反外事纪律案，私刻公章，挪占公款案可谓：吃喝风、挥霍风、营私舞弊风、风风秒耳，恂私案、枉法案、贪污受贿案，案案扑鼻。

违纪枉法，贪风贿气，势如脱缰野马，成为当今社会诸恶之首，开封包公府香火绵盛，海公祠重葺庙冢，“青天梦”、“清官愿”，从鸡年渴望到狗年，使反腐倡廉升为切肤之痛的头等话题。

刘丽英语重心长地告诉笔者：“对于执法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舆论制衡，没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重视，没有举国上下的通力合作，我们也许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历代为什么在中国这么辽阔疆域只产生过像包拯、海瑞、于谦等屈指可数的公正廉明之官，这与封建王朝社会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有关。我们今天就截然不同了，时代是属于人民的，我们也是属于人民的，我们就更没有视人民于水火而不闻、睹枉法者乱纲而不顾的道理！在中国像我一样常年从事纪律检查和执法秉公的人员，有几十万人，大概有几十万包公吧！”

(责任编辑：刘家驹)

本刊启事

△本刊今年第三期刊登于光远的《于光远在文革初期的滑稽人生》一文，选自即将出版的《人生六十年》丛书。作者原题为《文革前期本人的趣事、憾事和两者以外的琐事》，发表时编辑作了修改。于的原文较长，编者作了删节。

△由于编辑校对粗心，将本刊第三期《邓小平与三峡工程》一文作者张世黎漏掉；成纆台写成陈纆台，特向两位作者致歉。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的同学蒋经国



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的“蒋经国时代”已成历史词汇。但是他的形象在台湾人民心中并未泯灭。最近海外学术界组建蒋经国研究会,有专家教授们写了12篇论文,评断其是非功过,准备于今年汇集出版。应该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历史人物是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本文作者与蒋经国有同窗旧谊,兹所记数事,提供给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探索与追求

1925年,蒋经国到苏联莫斯科入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当时他是一个纯真的思想尚未定型的16岁少年。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宣布了莫斯科援建孙中山大学的友好决定,并且亲自选拔国民党的高干子女入学。在340人名额中,鲍罗廷选定了30人,其中第一名就是蒋经国。此外,还有于右任的女儿于楞、女婿屈武,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朱培德的女儿朱友伦,赵守钰的女儿赵祥定等20多人。

1927年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支红色武装队伍:“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

○陆立之

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红旗初次在上海天空飘扬。这时,莫斯科立即策应上海,孙大就自然地掀起了欢腾的热浪,蒋经国成了新闻人物。因为联共中央党报《真理报》发行特刊,在头版头条新闻中有一巨幅蒋经国画像。漫画是:蒋经国夹一公文包,笑容可掬地、举手指着上海的图景。标题是:“上海是我们的”。很显然,蒋经国这时候是向往红色暴力革命的。

不久,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莫斯科的反应是强烈的抗议和批判。蒋经国又大义凛然,率先撰文痛斥他父亲暴戾无道的残忍个性,并举事例叙说老蒋凌虐原配毛夫人(蒋经国生母)实况:“揪住一把头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楼……”文章不仅在校内墙报上发布,有些章节还被译载于莫斯科的报刊上。同学们称赞他,校外人同情他,莫斯科的姑娘们频频来校专访,表示倾心。

1928年春,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检讨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蒋经国的思想倾向反对派的理论。他也认为中国革命之失败,应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错误,而不应该诿过于中共领导人。他钦佩托洛茨基有先

见之明,在共产国际六大所争议的“反对派提纲”,其中阐述的中国革命,他认为是正确的。反之,他觉得当权人的粗暴和刚愎自用,遥控指挥,因此导致失败,遭受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三次诬骗。蒋经国在党组会上辩论时,不畏权势,侃侃而谈,阐明自己的观点,表现勇敢机智,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使同学们都刮目相看。我看到他在准备发言之前,沉静而胸有成竹,从马列著作中他选定了若干经典警句,先以小纸条分夹书页,用红蓝铅笔在恰当的词句下划出杠杠;发言时他手捧一摞书,快速地翻阅书页,口若悬河地边讲边念,引证马列原句,在短促的几分钟时限内就阐说了要点。这种非凡的举止,在当时窒息的政治气压下是惊人的。同学们对他的甘冒大不韪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米夫王明一伙人虽恨之切骨,也只是惊愕而无法正面批驳。

在压力下成长

1928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人事频繁更迭,争讼喋喋不休,上层权力之争自然影响



了中国留学生。在东方大学发生了反官僚主义学潮，结果由联共中央宣传部派人硬性压制了，开除了五个学生（宋代杰、李侠公等），东大军事班全部遣回中国；继而又撤销孙大，将全部中国学生合成一新校，命名曰“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由米夫任校长。在反托派运动中，米夫仰承上谕，首先排挤了孙大校长拉狄克，纠集一批心腹，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想方设法要击垮中共领导人。他们利用东大学潮后果攫取了培训中共干部的权力，其目的是进而篡夺中共领导权。

蒋经国在辩论会上舌战群儒，获得了群众的好感，但却遭到了米夫王明的压制。他眼见有人跟踪，被暗搜书包，被窃听谈话，看见别人被批斗，有人失踪，有人被逮捕，有人被明令流放西伯利亚。原先龙腾虎跃生气勃勃的英俊少年，变得沉默寡言了！终日郁郁像痴呆一样。他渴望回国，看见一批批的同学被遣送走了，屡次公布的名单上就是没有蒋经国三个字，这使他惶恐不安。他抉择了韬晦之道，埋头读书不问窗外事，也许能逢凶化吉。但是，灰姑娘的命运仍不能逃脱张牙舞爪的新贵们。凡在图书室里自学的人，都被扣上“学院派”（或“学究派”）帽子被撵了出来，结果是：他和屈武等一同被飭令转学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学习。

所谓转学，实际是一种惩罚，因为东大学潮中被开除的五个学生，有李侠公等三人被转学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宋代杰等二人转学到莫斯科列宁学院。蒋经国被贬谪到此，是因他从理论上批判了王明一伙，同时他又一再打报告申请回国，这意味着他不拥戴斯大林，仍然倾心托洛茨基。像这类情况的人，不下狱就流放，决不会纵虎归山。



列宁格勒的中央军政大学，实际是一所军事院校，传授游击战术和军队政工方法等等。蒋经国被贬放在此，意在使他无所作为，最后从隔离的苦闷中促使他会主动去归附米夫王明。可是，小蒋虽从未涉军旅，初时有些不习惯，但在广州时也曾习见黄埔军校的兵营，对刀枪喊杀也并不畏怯。他的俄语基础坚实，不仅能听讲，也有



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

机会和苏联各民族同学自由交往，还可在军营野外拉练时拼搏锻炼，能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他见识更广了。蒋经国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内心深处有了历史的反思。他先前在莫斯科时，曾悄悄地和邓文仪谈论过吴越春秋，说到申包胥的故事，他说过：“他们要覆楚，我们要复楚。”覆楚者，是指米夫王明。他与邓文仪誓约为爱国主义者。

由于蒋经国坚定不移，米夫王明就想千方百计要打击他。不久，蒋经国因病调回莫斯科治疗，病初愈，硬将他放逐西伯利亚去做苦役，旋又改送农村受“再教育”。他被放逐到雪原荒村，既不给固定住处，也不配予粮食，幸亏路遇一个好心的老农妇援助，他才没有冻死。以后，又被迫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小火车站当搬运工，差一点饿死。为了生计，他又上矿山当苦工。他历尽坎坷，与病魔和死神频频搏斗，像苏武牧羊一样，在异乡苟延余生。

在苏联渡过十个春秋后，蒋经国的克苦勤奋感动了上帝，矿工们十分信赖地选举他任副厂长。又获得了女工芬妮雅（后改名方良）的钦敬和挚爱，总算身心有了寄托，蒋经国的精神也舒畅了许多。但是，正当西伯利亚的寒流似将解冻的时候，米夫王明一伙人并没有遗忘这个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压力又凝聚起来，王明的十二道令牌又接踵而至，再一次扣帽子打棍子，诬说蒋经国在西伯利亚矿厂有反党活动，硬性撤销副厂长职务，开除党籍，并勒令回莫斯科检讨，听候处理。这是致命打击，将他置之死地。蒋经国当时有妻和子，家庭生活来源断绝。在绝望中，他决不向米夫王明乞怜。夏天，他进入丛林采摘草莓，秋风中往远处寻觅枯枝做燃料。他设想探溯一条秘密通道，逃过格伯乌的边防鹰犬，越过界碑跨入祖国。有一天，原本和妻子约定出去

找树桩子回来劈柴禾，但他很晚才回家，只背回来一麻袋旧书；其中有普列汉诺夫著作和托洛茨基写的《往返》（流放逃亡记），以及其他一些禁书。蒋经国兴奋地好像已获得“阿拉丁神灯”，连夜阅读那些禁书，竟将王明的催命令牌置诸脑后。

父与子的弥合

1937年，蒋经国已28岁了。米夫王明在他头上高悬的那柄剑竟没有坠落。蒋经国像车辙中的一尾鲋鱼等待甘露，奇迹终于出现了。斯大林没有忘记中国朋友蒋介石，他在日本军阀发动战争中，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好，要求以中国人民的血肉去捍卫中苏边境不受日本侵犯。作为人质的蒋经国结束了苏武牧羊的悲剧，成了友好的吉祥信物，获得天赦，返回祖国。

蒋经国归国后痛定思痛，他没有忘记12年中所遭遇的辛酸苦难，也牢记着“复楚”的誓言，他决不让斯大林模式的政体在中国土地上成活。

蒋经国决心辅弼父亲巩固河山，他觉得自己在莫斯科学生时代是少不更事、幼稚可笑。他却不知道现在父子间的鸿沟如何弥合。十年前，小蒋在莫斯科写过针砭文章，当时倒像陈琳之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老头子至今心里还悻悻然。如今又带回了一个洋婆娘，不符合奉化家族的传统礼教，又如何取得谅解？蒋经国思虑万千，心里忐忑不安，又难于靠近父亲，只能回到丰镐房去陪伴阿娘。

幸亏，宋美龄别具慧眼，她识别这是一块和氏之璧，以她的远见卓识从中斡旋，用管仲射钩中带的齐桓公故事说动蒋介石，化除了芥蒂，促成子承父业，避免了彼得二世悲剧的重演，蒋经国终于成了蒋王朝的真正接班人。

回国初期，乍一接触政治生活，蒋经国感到十分迷惘。那么多的派系之争，复杂的人际关系，戏剧性的勾心斗角与演化，官场的丑态与卑劣的灵魂……比之苏联的一边倒更使他搞不懂。于是，他开始试着从父亲规箴的圭臬，读曾国藩、王阳明的著述，又观摩江西政学系头面人物熊式辉的两面手法，继而钻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渐渐地，蒋经国读通读懂了“中国人”。他积累心得，揉和自己12年间苦难历程的经验教训，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审时度势，集众家之长，铸成自己的体系。具体做法是：因袭父志，首先在江西创办训练班。这是蒋介石的成功之道：在训练中培育干部，精选心腹，组织核心，统驭权力。蒋经国有跨灶之才，他以“发扬黄

埔精神”为口号，成功的办了“虎岗”“赤珠”等训练班，从中甄别筛选，组成了自己的班底。

除了口号之外，蒋经国也做了不少实事。任何一个国民党政府官员所不能做、不愿做、不敢做的事，例如查访民间疾苦，他都认真地躬亲做到了。他致力于将官与民之间的距离缩短，用普通人民所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去为民除害——时常青衣小帽的去民间禁烟赌娼，消灭土匪恶霸，铲除贪污陋规等等。这类除暴安民的措施，换得了人民真正的信赖和赞颂，美誉他为“蒋青天”。蒋经国在赣南创业的口碑，竟超越了政学系斫轮老手熊式辉。

蒋经国却不自负，他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父亲的领袖形象是唯一的。在苏联，斯大林就是唯一的上帝嘛！蒋经国又创建了一套独特的中俄合璧（或是俄为中用）的办法，将人民的歌颂嫁接到父亲的冠冕上，并创立一个“太阳节”——宣布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是“太阳节”，办《太阳报》，谱唱“太阳歌”。歌词大意是：“蒋委员长是太阳，是人类的救星，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是他指引我们的方向……”父子间的历史缝隙从此弥合了。

崭露头角

1938年，国民党许多宗派和特务集团合并，混成一个三青团。这个新集团，很像法国革命史上的“雾月十八日”所拼凑的那种三教九流班底，它的意图是像酝酿什么新政体，强化专政。但这类乌合之众纠聚一处，实际是“一团黑”，它的内部人事倾轧，相互掣肘，就连惯用权术的蒋介石一时也摆不平。争名夺权者是陈诚、陈立夫、朱家骅等大头目，但实际权力却操纵在黄埔系复兴社头目康泽之手。

蒋介石想到了蒋经国。自从听了从江西传来的“太阳歌”之后，老头子心情舒畅，蒋经国被安放在三青团



左起：陈惠，陈果夫，陈立夫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带儿子到汉口看望生母毛福梅

中央的交椅上，让他能与父执辈平起平坐，继而任命他为“江西省支部干部训练班”主任。蒋经国确也克绍箕裘，从“青干班”中筛选出了一批心腹骨干，如李焕、王升之流。

1944年，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又兼任“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主任，头角峥嵘，青云直上了。

青年军的政干班是建立青年军的核心组织。青年军的成立，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以抗日为幌子，动员知识青年参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全国大中学生在“抗战建国、力行革命”的口号下入伍的。其实，这是蒋经国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心得的实践。他放手改革旧有的军队政工系统，利用“发扬黄埔精神”为旗号，恢复北伐时期党代表制度，使原有军队政工权威老将贺寒衷、邓文仪等黄埔一期的老大哥都退避三舍，起用以强人著称的黄珍吾和素以智囊闻名的胡骝，又以少数留俄同学为骨干，培育出一批高干派充青年军九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只有二零九师政治部主任刘汉清是留俄同学）。又选拔黄埔系复兴社信得过的自己人充任各师师长。蒋经国则统御全军成了“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十万禁卫军的首领。

这支崭新的部队素质较好，给养优厚，士气旺盛，军容整肃，从各个方面它都超越了国军的任何部队，特别是在心理作战方面，蒋经国能指挥若定，是由于政工制度的改革，恢复了党代表制。旧有军队政工干部只是军队主官的附庸，常受歧视或猜忌，党代表是指挥枪的主体，他的权威高于部队军官。这种俄式梯队的组织，蒋经国是操纵自如的。

恢弘的构想

1946年，兵未血刃的“青年军”决定复员。蒋介石

发布指令说：“知识青年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投笔从戎，抗战救国，其功不可没。应负责帮助他们复学、就业。”蒋经国尊奉意旨，为他们办理复学、升学、复职、就业等事，并授予每一个兵一个荣誉职衔：“少尉预备军官”。又在南京国际部专设“预备军官干部局”（局长蒋经国）“复员青年军联谊会”。蒋经国全神贯注细致地为十万青年军复员着想，使他们感到精神上有寄托，物质上有温暖，心情振奋。蒋经国就很自然地统驭了这十万在乡军人。实际上他已是地下“党卫军”的首脑了。

蒋经国的新设想是组织“第三势力”的新党。纲领是：“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是想利用自己已掌握的“三青团”这个躯壳，就可改建成什么党。首先清除那批腐朽的老家伙，再与共产党争取群众，防止恶化毒化。父子俩详尽地分析了局势的发展和利弊得失，他们肯定了人心向背、国际舆情等等方面，认为大有可为。老头子囑咐经国草拟出具体方案。

不料事机不密，陈果夫闻讯立即动员元老派陈立夫、戴季陶等面见蒋介石，坚决反对另组新党，建议改组国民党充实新细胞。他们的理由是：国民党与三青团都是你自己的左右臂膀，不能以你“团长”蒋中正去打倒“总裁”蒋中正，这岂不貽笑大方。蒋介石沉思良久，结果又同意确保原有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原则，保留国民党取消三青团。改组国民党后在中央党部增设青年部，增补蒋经国为中央委员兼部长。

新党计划告吹，蒋经国还是没有突破国民党的关系网。

我想起1942年一件往事。这年夏天，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到西北旅游，当时下榻兰州励志社。恰巧我已寄寓在此，并代表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接待他们（当时我充任甘肃省政府首席参事）。我们久别重逢，又有许多的空闲时间供我们聊天，因此能畅谈积愆。我聆听他在莫斯科12年历险的全过程，理解他对国民党腐恶势力感受，和毫不隐讳的说明对米夫王明等人的憎恨，以及阐明他今后的设想等等。当时他的畅所欲言和远大抱负，我只觉得钦佩。后来在旅游了敦煌、玉门油矿、嘉峪关等地之后，蒋经国又和我说了些心里话，我十分感动！这一席话我深切感到他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雄心。我曾将这些心里话称之为恢弘的构想，我相信不论事隔多少年，蒋经国的构想不会在他脑子里抹掉。

蒋经国说：他对西北的壮丽河山非常喜爱，它不像重庆那样乌烟瘴气，西北的天晴空万里、地面辽阔一望

无际、人民淳朴朴实，不像重庆官场的尔虞我诈，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前辈人在黄土高原黄水之滨驰骋耕耘，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炎黄子孙的祖先在这里。我们应该从头做起，在西北来开拓一个新天地，这不会是空想的乌托邦罢了。我看有广阔的前景，大有作为。我想在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合并为一个大区，如果可能，我愿留在西北专任这个大区的专员，不再回赣南去了。你以为我想的不实际么？（大意如此，原话未笔录。）

我认为他不是一时的观感和冲动，他的开拓疆土为炎黄子孙设想，是他爱国的雄伟抱负，也蕴藏着对国民党腐朽势力的极度愤懑。他以我为知己，希望我代为筹划如何实现这件事。我为他代谋，先说服谷正伦，要求谷出面向重庆保举。谷正伦问明了蒋经国在赣南专区的蜚声政绩，表示了对他的欢迎，并嘱咐我立即草拟电稿专呈重庆侍从室。

电报发出之后，我们又设想了许多方案。蒋经国的思虑精细而处心敦厚，差不多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丁牲畜的生老病死都全面周详的计及了。一幅幅的蓝图在他脑子里转动：文教、卫生、妇幼、托儿所、医院、学校、民族间和谐、商贸发展、畜牧、耕耘、交通水利……等等，他兴奋地谈了又想，想了又谈，我们似乎从天方夜谭中发现了河西走廊是沙漠中的绿洲。

遗憾的是：隔时不久，重庆侍从室来电：“请速去西安胡宗南处。”寥寥数字，蒋经国懊丧地嘘了一口气，对我耸耸肩，双手一摊，做了一个俄式的失望表情。我们猜想：可能是老头子听了侍从室某个人的什么献计，审慎的防范盛世才新疆事件的重演，不放心蒋经国滞留在西北边陲。

为了慰藉蒋经国的情绪，我陪伴他们兄弟俩去了西安。沿途，从兰州经天水到宝鸡，这一段公路由他们兄弟俩轮番驾驶汽车，我和司机、警卫员都一直坐在后座作客，一路上无法聊天。从宝鸡到西安，在陇海铁路的火车里，我们又回想到大西北的开拓计划，惋惜构想的诸多方案未克实施。当时蒋经国对炎黄子孙的发祥地有极深厚的感情，曾相约以后一定再找机会共同兴建这片疆土。我深深理解，蒋经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会至死不渝，以后他在台湾的建树果然没有忘记炎黄子孙的谱系。

恢弘的构想未能实现，正规的事业无法施行，导致蒋经国步履阑珊，这是一大憾事。

错落的脚印

“三青团”取消之后，先前的特务组织CC派复兴社又死灰复燃，原有的中统、军统秘密黑帮本来没有停止活动，如今就更猖狂了，他们杀人如草芥，任意蹂躏老百姓，五毒俱全，罪恶昭彰，以前有人说“特务不死，国无宁日”，可臭名昭著的特务魔王戴笠已死于非命，中国社会并未安宁。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徐恩曾……还在角逐争雄，仍是乌烟瘴气。这时候的蒋经国也深有所感。他想与这些狐鼠一决雌雄或是一网打尽，挺身而出为人民做一件好事。但是，他搜集了许多机密的情报后，发现黑帮特务机构除了扰害人民的罪恶外，在政治体系中它是“国家机器”，在维护政治统治的各种手段中是不可缺的。于是，蒋经国饬令他的智囊们研究各国秘密警察的资料，由留俄同学黄中美、徐季元钻研苏俄格柏乌、切卡、克格勃的组织过程，蒋经国要采摘各国优良。

由于谋士们的策划，蒋经国要在抗战结束后逐鹿中原，他制定了一个叫做“实验绥靖区”的计划，准备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五省部分地区作试点，实现他的“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不料，行政院在外来压力下（主要是美援附带条件）不能不表示民主和平的姿态，说战争已结束，不许可有“绥靖区”的设立，尤其是在五个省区内划分实验，干扰政体，碍难实施，不予通过。蒋经国走入了死胡同。

经过一番周折，蒋经国在智囊胡轨的献策下，决定运用潜在的十万在乡军人，要闯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局面。这就是组织“戡乱建国总队”。它隶属六个大队，后来又派生出“大上海青年服务队”，这是潜存在地下两



蒋经国与夫人蒋方良女士

年的精锐力量，气势雄伟的公开走上了街头。按蒋经国的想法，它将大刀阔斧的“戡乱”，把中国社会一切腐恶汰除干净。他宣布的方针是：为民除害，树立廉政清风；安定民生，防止通货膨胀；经济公开，取缔投机倒把；坚持正气，消除腐恶党派。看样子，他先要着力扫除贪污吏、豪绅恶霸，然后再回马枪刺戮中共。他的第一枪是直刺上海的“老虎”。但是，蒋经国功亏一篑，这一场冲刺又失手了。他虽下决心，六亲不认，什么叔叔伯伯大爷哥们都凭尚方宝剑办事，凡有敢于违抗戡乱者，严惩不贷。可是蒋经国虽能捋虎须，但不懂得笑面虎的伎俩。上海有一套“铜网阵”，正是可以陷白玉棠于死地的一些圈套。蒋经国一开手就触痛了黑手党头目杜月笙，笑面虎略施小计就叫蒋经国进退维谷。蒋经国一不做二不休，抖擞精神，拼力学武松打虎，碰上了孔少爷的扬子公司的白额金睛猛虎，老虎咆哮吼叫，召来了宋美龄姨妈保驾，这一下，蒋经国醒悟到：十里洋场不像江西土劣地霸容易收拾，这里埋伏了官宦巨贾、宫廷内戚、豪门教父，他们与党政决策人忧患与共，操纵着经济命脉，平民百姓习惯于被巧取豪夺不敢吭气，凭蒋经国匹夫之勇决改革不了制度的腐恶。纵使有十万精兵也敌不过一个教父，何况宫围裙带还串挂了一大片。蒋经国只好铩羽而归。

据我们的同学好友俞季虞说：小蒋除了在政治舞台上二连碰钉子受挟制，还有一件很恼人的事，那就是在外交事务上的受挫。1945年，蒋经国任外交特派员，在中苏谈判中曾直接顶撞斯大林，反对苏联兼并外蒙

古，据理力争东北问题。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抗击日本，就是为了要收复失地，现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反要划出外蒙古大片土地，这怎么向人民交代？”但是斯大林不改变主意，并执拗地要按他与罗斯福私订的“雅尔塔密约”，强行要恢复1904年沙俄战败后让给日本的中国东北部分领土，苏联要占有大连旅顺不冻港和南满铁路等地。蒋经国看透了斯大林的侵略野心，对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首领彻底地丧失了信心，他抛弃原有的些微的幻想，愤而辞去外交特派员的官职。后来就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录，题为《五百零四小时》（二十一天日记）。

由于这些年内忧外患的交迫，蒋经国痛恨“所有的虚伪和欺骗以及争权夺利”，他一心只想着“复仇雪耻”。因而步履艰难地竟堕入了错落的脚印。他和最亲密的朋友俞季虞彻夜谈心，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检讨自己的得失，纵观大局，分析前景，最后认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必须有自己的战斗组织。这样就诞生了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集团“中正学社”，外围组织叫做“铁血救国团”（到台湾后改名“反共救国团”）。

“中正学社”（代号为“青年问题座谈会”）成立于1948年4月间，这是蒋经国要“复仇雪耻”的核心组织。他采用法国布郎基主义精神，只精选极少数的心腹亲信，生死与共的结为核心。

“中正学社”的全部成员只有21人，除蒋本人自任社长，俞季虞任书记，有16人是年轻的门生，两名赣南旧部，一个蒋家亲属。组织的决策领导是俞季虞为首的5人小组。蒋经国在这里倒借用了一句斯大林的口语叫做：“干部决定一切”，让五人小组向他负责。

“中正学社”的外围组织“铁血救国团”（代号为“社会问题座谈会”），以李煥为书记，开始有50人，后来发展为200余人，主要骨干就是在乡军人中筛选出来的。这个铁血团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神经中枢，王升就是“戡乱”的第六大队队长。一直到蒋介石的“滑铁卢之战”为止，这些被历史车轮碾碎了的社与团，才零零散散地跨海逃遁，俞季虞全家老小五人，都溺死在去台湾的“太平号”沉舟中。

最后的怀念

蒋经国在苏联经历了坎坷的12年，回国后在国民党的浊流中又沉浮了12年，到1949年挥泪离别家园，可说是“壮志未酬”。从他个人的早年理想出发，囿于传统制度的羁绊，也曾跋涉过不少艰难的路程，奋搏中进



蒋纬国

入了弯道，这一切也属历史根源，也都像噩梦般地过去了。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和怀念的，那就是蒋经国自始至终的强烈爱国的民族意识，他至死不渝的没有忘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他嫉恶如仇，为民除害，他痛恨贪污腐败，他面对世界强人为国家民族寸土必争，甚至在坚决反对“台独”而受狙击，这一切都表现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应该抹煞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既然新社会是旧社会孕育胎生的，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他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是一个完人，这并不奇怪。

我曾试着比较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的个性秉赋、气质，以我亲见亲闻的直觉感受，我的印象认为这两兄弟共性都是真诚的。乍一看，两人外型迥乎不同，经国内向、表现深沉，睿智稳重，胸有成竹；纬国外向，豪迈爽朗，热忱英武。我回忆那次从兰州去西安途中，在宝鸡火车站发生了一件小事，可见证他们兄弟俩都很纯正善良，不过是处事的态度不同而已。当时我们正伫立在月台上候车，纬国见到一个捡煤渣的孩子被路警戏弄欺凌，踢掉了那孩子的小篮子；纬国立刻奔过去责斥仗势欺人的警察。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凛然正气，溢于言表。经国见状，冷静地对我说：“你看看弟弟！这种事在中国实在太多了啊……”后来我们在火车上吃饭，纬国因见到服务员的拇指浸入了他那碗面汤里，忍不住又发脾气摔了碗。事后，纬国有些歉然地对我说：“刚才我太鲁莽了……在家里，母亲叫我小神经的。”经国不高兴地制止他说：“吃你的面罢！”

这件小事表明他们心性相通，刚柔相济。我后来思考，纬国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少年气盛，遇事可能欠



1976年宋美龄从美返台，蒋经国登机迎接。

沉着，经国待人接物比较多虑，例如“小神经”的前置词也许是“老神经”，据传闻宋美龄曾戏称蒋介石为“老神经”，此时是蒋经国怕家丑外泄，所以制止弟弟的闲话。

蒋经国曾说：中国像一辆破车，驾驶技术再好的司机，也难保它不出差错。“蒋经国时代”已经消失，但愿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梦能早日实现，以弥补已铸成的差错。

(责任编辑：刘家驹)



冯玉祥将军的戏剧人生



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左一)和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右三)在开师大会上。

多年来，海峡两岸称颂冯玉祥先生是：“丘八诗人”、“平民将军”、“抗日名将”、“反蒋英雄”，而本文作者陆立之老先生却对这位传奇人物提出新的评说。

——编者

我曾多次见过冯玉祥，每次见面交谈都有新印象。又由于他的子女洪国和弗能都同时在莫斯科和我同学，我从他们处又得悉一些有关冯先生的思想与生活的转化情况，因此我对冯先生的政治道途的波折深为关注。我曾不少次与我的朋友——也是冯先生的亲信部属友人们：陈天秩、张振亚、杨念熙、郝鹏举、张克侠诸君，谈论过冯先生的思想转变过程。冯先生走过了曲折不寻常的道路，生活中充满戏剧性，现在我将客观印象和历史背景，综合叙述冯先生奋斗的一生，供研究参考。

冯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把满洲皇帝赶出了皇宫，从而连根拔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这为人之不敢为的历史壮举，发生在1924年，正是冯先生从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希望别树一帜的时候。我很信服毛泽东主席的论点，他于《学习与时

局》一文中说过：对于一个人的历史问题的处理，应着重当时的三个根源：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我们先看看冯先生思想转化的这一年，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一、从奉直第二次大战中，冯玉祥回师北京，倒戈，改称“国民军”；二、驱逐溥仪出宫；三、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三件事，轰轰烈烈，举世瞩目。追溯根源，可获得如此结论：一是冯玉祥在思想上受了李大钊的影响。当时李大钊以为：冯玉祥将来可能转向革命。因此李在设法扶植、鼓励冯。二是冯本人对军阀制度的不满，觉得老是寄人篱下，永不能当王侯。过去，在清朝末年，他与吴佩孚同在袁世凯的新军中，同等级的充当管带（营长），同在东北驻防，后来袁世凯称帝，吴任第六旅旅长，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又同在四川作战；再以后又同在湖南作战；吴佩孚升了直隶军总指挥，冯玉祥地位不变，反成了吴的部属。往事已矣，且按下不提，而在第二次奉直之战前夕，吴佩孚仗恃有贿选总统曹锟的宠信，咄咄逼人的气势，俨然自诩为兵马大元帅——9月18日，吴在“四照堂”点将，气指颐使地令派冯玉祥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战斗任务是：从古北口、喜峰口向平地泉进军。这是条件最差、最艰苦的一次行军，地形与交

通都十分不利。这时候，冯玉祥的思想很自然地回想到李大钊的交往了。于是，他推迟了5天才缓慢地出发，到10月5日又与后备军总司令王承斌联络，密商反吴。最后于10月19日联络王承斌、胡景翼、孙岳共同倒戈，迅速回师北京——他们昼夜兼程，急行140里，于10月22日回抵北京，在北京举行政变。

冯先生在任河南督军时，由于思想上已受李大钊影响，其作风确也与众不同。他按北方人民的习俗，时常便衣私访，探问民间疾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取缔烟赌娼，惩办贪污，提倡节俭……也确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尽管他采取的方式方法仍是封建落后的“包公”、“彭公”等等老一套，但在当时环境和人民所能接受的条件下，他的措置是有成效的。甚至他这套衣钵后来又被韩复榘继承了在山东施用，居然也扬了名。

回师北京后的另一“逼宫”闹剧，是吓唬曹锟。首先斩杀了曹的男妾李彦青，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10月25日，冯先生和王承斌、胡景翼、孙岳，又加上黄郛（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合组“国民军”，表示与广州的孙中山先生遥相呼应，又主张改组政府以“政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张 勋

冯国璋

段祺瑞

黎元洪



冯玉祥到莫斯科时受到群众欢迎。

冯先生当时设想，黄郛原是孙先生“同盟会”成员，胡景翼原与国命党人有联系，如果凭借“国民党”枪杆子执掌“政务”，再请孙中山先生北来掌舵，就大有可为了。当然这幅“蓝图”不能施工，因为“政务委员会”是要废除内阁制，老军阀当然不赞同，孙中山北上后不久就病逝，冯玉祥先生的海市蜃楼也就幻灭了。

曹锟倒台后，群龙无首，由冯玉祥、张作霖、卢永祥等人联名拥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

段祺瑞是一只老狐狸，他被捧上台后，玩弄手腕，他的施政宣言是“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也就是说，他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对日本友好。

在段“执政”的主持下，冯玉祥与张作霖划分了地盘：冯军管辖京汉铁路沿线；奉军统驭津浦铁路沿线；表面上是共同扫荡吴佩孚残余势力，实际上是划地区主宰。

段祺瑞稳坐江山，冯玉祥、张作霖又换了金兰谱帖，成了把兄弟。但为时不久，双方都向段政府索取军饷，突发了矛盾，奉军直逼北京。守卫北京的冯军避其锐锋，忍让地退往宣化和张家口，回平地泉，未经战斗就丧失了北京的实力范围圈。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反帝运动的“五卅惨案”，冯玉祥先生义愤填膺地电请张作霖老把兄（张比冯大7岁）联名，要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张接电后不仅不敢得罪日本主子，还立即派张学良率轻骑兵2000人到上海，进行镇压群众。

这时候盘踞南京的孙传芳，感到奉军对他压力太大。孙原属直系军阀，吴佩孚被打倒后，他原想依附段祺瑞来保全地盘，但看到段本身还倚仗冯奉双方的均势才能稳坐江山，他就改结好于冯，与冯也结为义兄弟（孙比冯小3岁），并互相誓约，共策抵抗奉军南侵，他们约定：由孙传芳诱敌深入，把奉军精锐吸引到江浙区上海南京等地，由孙军作歼灭战斗；打到徐州后，由冯军策应，截断奉军归路，就可瓮中捉鳖了。

但是冯先生改变了主意。当孙传芳追逐张作霖到徐州时，冯军按兵不动，并宣告中立，电劝双方收兵和平。冯密电告孙，说与张是虚与委蛇，仍是与孙结好；另一面又派张树声去聘向奉张，游说彻底肃清吴军残余，以杜后患。这时候实际是冯先生已敏感到：吴佩孚正在死灰复燃，且有人向吴献策联张反冯，而孙传

芳原属直系，很可能回归建制。如果在徐州消耗兵力，再受奉直双方夹攻，那就失算了。因此，兵不厌诈，冯先生表示中立，又与双方暗通款曲。另一方面，11月15日在天津与张作霖签订8条密约，共同反吴；11月20日，又再一次与郭松龄密约：彻底地从东北军内部老巢去瓦解奉军。郭被杀后，冯奉联合反吴的计划和冯孙联合反奉的计划，都是弄巧成拙，不现实了。

总的说来，冯先生在1924年一年间的周旋，毁誉参半，在思想虽受了李大钊的影响，但不定型，因此他的奋斗历程，还仅是刚刚举步。

1925年5月间，由于李大钊的介绍，苏俄代表鲍罗廷到张家口访问了冯玉祥先生，商谈了国民军与国民党的连系问题。随后，苏俄派了32人组成的顾问团到张家口。冯先生受到鼓励，也于同年10月派熊斌率领的代表团去俄，探索军援的幅度，也为自己赴俄创造条件。第二年，冯先生于5月9日到达莫斯科。

在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冯先生即席演说表示：“是为了加强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学习重建国家和红军的经验到莫斯科来的。我们很高兴在这儿找到了发展的榜样”等语。第二天5月10日，拜谒列宁墓，在墓前表示，他决定参加中国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在这场所，冯先生表决心是意味着他受到了伟大列宁的英灵感召，像他信奉的基督耶稣一样，灵的启示使他在沙漠中能找到泉水。之后，在四个多月中，冯先生到处演讲，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有人赞赏说：他是农民，一定能为农民利益而战；有人肯定说：他是工人，自然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斗争。据说，根据李大钊和鲍罗廷等人的意见，共产国际已考虑到把冯玉祥和蒋介石、汪精卫并列在

第三位,当时深受苏俄高层领导人的嘉许。因此后来1927年武汉政府出现裂缝时,鲍罗廷还准备将地下活动的大批干部,由武汉转移到西北去。

冯先生在莫斯科的演说,一开头总是说:“我是工人的儿子!”“我永远是资产阶级的叛逆!”等词句,因此他在莫斯科成了风云人物。他又将长子洪国从德国叫来,转入孙中山大学读书,也留下大女儿弗能在孙大学习,二女儿弗伐到莫斯科工厂做工,又将随行的军官们都留在莫斯科学习,表现了高度倾心革命的风范。因此,苏俄高层领导欣赏这条汉子可信,孙大同学们都觉得冯先生可敬,大家都会心的微笑,认为能够与冯先生结识是一种光荣。冯先生不虚此行,他得到信赖的是有40万人的装备和600万卢布的军火,他于8月17日离开了莫斯科。

冯先生于9月15日回到五原,他在这里举行了有名的五原誓师大会,公开宣布了加入国民党,并命令全体国民军官兵集体宣誓入党,改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自任总司令,委派和他偕同回国的苏俄陆军大学毕业生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从这里开始,在行动上摆脱了军阀体系,做了一员真正的响应北伐的革命军人。11月28日,国民联军攻占了陕西西安,即委于右任为陕西省主席,冯玉祥的威名也远播广州,一时传诵为南有广州北有西安,冯玉祥的名字成了革命的象征,他的布衣短袄形象变为偶像了。这一段时光,应该说是冯先生一生中美好的时刻。自从他由军阀群体中勇敢地迈出一大步,这不朽的巨人形象备受群众欢迎拥戴,如果冯先生从思想上站稳脚跟,取代蒋介石汪精卫的席位,这会博得共产国际支

持的。

非常遗憾的是:1927年又成了历史的转折点。也许由于在莫斯科过于轻易的取得成功,使冯先生变得傲岸;也许是什么军师策划的馊主意,冯先生不珍惜那美好的声誉,竟又一次在思想上“倒戈”。

1927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事变,这是蒋介石从革命阵营中的叛变。它的影响,比冯玉祥先生的北京政变更广泛,而且恶劣。紧接着,是长沙的“马日事变”,以及贵州、四川、广东、江西等省一阵风的狂吹,特别是西南各省市的军政头目的嚎叫,震动了冯先生的神经。夏斗寅、杨森、陈焱、刘湘等的进逼武汉,朱培德的“欢送共产党人出境”等等,使冯先生反复思考。在这举足轻重的关键时刻,应该如何抉择?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前,国民军被迫退出天津,离开北京,在荒漠的西北屯垦,幸亏李大钊另眼相看,雪中送炭,使冯先生名利双收。如今,一阵狂飙,连李大钊也被卷去了生命,甚至蒋介石竟敢拘留广州的苏俄领事,这以后将如何发展?

1927年6月9日到13日,冯玉祥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唐生智以及苏俄顾问加仑将军都出席了。这时候,武汉政府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冯先生身上,盼望能会师北伐,来缓解内部矛盾。冯先生审时度势,又作了惊人的决定·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北伐,提出“分共”以压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他说:武汉政府成员可并入南京政府,个别人不愿去宁可出洋考察。冯先生“分共”的主张还首先创行,免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职务,所有以前由中共介绍参加国民军的官佐100余人一律遣散,少数被处决。冯玉祥的行动获得汪精卫们的赞赏,同意他

的意见,调回唐生智、张发奎部队,将河南地盘划归冯玉祥,正式加委冯为河南省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主席,刘郁芬为甘肃省主席。又在开封成立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管辖豫、陕、甘三省。

另一方面,在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并与胡汉民、李宗仁等召开徐州会议,讨论党务、政治和军事问题。又与蒋介石换帖结为义兄弟。蒋从此尊称冯为“大哥”(冯比蒋大5岁),还自7月份起,每月馈赠250万元作国民军经费。冯先生这次“倒戈”,名位、地盘、金钱都获丰收,只是精神上空虚了。

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合伙反共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他的夫人李德全和子女都震惊和恐惧,不知会发生什么报复行动。但俄国人似乎尚计不及此,李德全就乘隙回国了。冯洪国和冯弗能依然留在孙大学习,洪国也像“四·一二”事变后的蒋经国一样,发表声明斥责他父亲反革命,声明的词汇也与小蒋声明相似,结尾也是:“现在你我属于敌对的阵营,你是反革命。今后我一定和反革命父亲斗争到底!”无独有偶,蒋经国揭露蒋介石暴戾行为举例说:“揪母亲头发从楼梯上拖滚到楼下!”冯洪国揭发冯玉祥暴虐行为是:“母亲是被你残酷地活活踢死的!”洪国还不只一次地向同学们讲述这件事的经过,“要为母亲报仇!”

在1927年2月间,“四·一二”事变尚未发生时,冯先生曾派鹿钟麟率领一批军官到莫斯科就学,其中就有张克侠、何基洋、浦化人等等。这在当时,表明冯玉祥先生是把莫斯科当作娘家,有困难就找“家”里解决——这是善于辞令的鹿钟麟的解释。由于鹿钟麟的巧言令色,共产国际对冯玉祥也深信不疑。郑州会议、徐州会议、由“分共”到“清

党”，冯先生的巨人形象像被太阳融化的雪人，大家都觉得惆怅！

但为时不太长，我们在莫斯科又听说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不和睦，据说是北伐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与阎锡山互争北京天津等处地盘，又为了南京编遣军队，对冯军不利，于是引起了战争。又传说，冯玉祥已任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但远道传闻语焉不详，我们后来回国才知道，冯先生煞费苦心经营多年的子弟兵，由于他的家长作风和各种客观因素，崩溃了。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瓦解，许多将领叛离投蒋，从韩复榘、石友三、梁冠英、刘郁芬、孙连仲等人的叛离，都使冯先生痛哭失声，有时还自己打耳光，后悔不迭。吉鸿昌投蒋时，据说是苦肉计，蒋介石的侍从室已掌握这份情报了。

冯玉祥专断，引起老部下们的公开不满，以前那些罚跪、打屁股等粗暴行为，已不再能控制已成为省主席或总司令的高官们。有知识有胆量的人正面提出批评说，冯先生只会用愚民方式练兵，不懂得政治，即使用兵打了天下，也不会治理。当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还是垮下来了。有的老部属在背后嘀咕说：冯先生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也没有什么正规的纲领，见风驶舵，摇摆不定。平时只拿一些爱国爱民的空口号团结人，用个人感情关心生活笼络人。这些意见也刺激过冯先生。在南京时，我曾遇见他到陆军大学去旁听，很认真的作笔记，也时常虚心地向教官提问，似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思想不开窍，死记硬背对他并无帮助。后来，在军事失败后，冯先生想从头学起，他决心要做一个文武全才懂政治哲理的人，于是上了泰山，准备勤学苦练，并且化了大笔的钱，专聘了不少专家教授为

他讲课。

北大经济学教授陈豹隐（启修）就建议他成立一个研究室，目的是想帮助冯先生搞通思想，成为一个当代的军人，除去满脑子军阀时期的沉渣。冯先生上泰山学道——是戮力修学政治的道理，要一洗部属们讽刺他不懂政治。

1933年5月，冯先生自以为在山上学好了“鬼谷子”的阴符七经，已懂得百战百胜之妙。下山表示抗日必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愿意再度与共产党合作。他自任总司令，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委派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不料这次失败得很快，不到三个月，“同盟军”又瓦解，冯先生于8月间又第二次上泰山。以平素冯玉祥练兵的诀窍来说，战争似不应该如此一触即溃的，事后探讨，内因比外因更严重。据说：第一除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加上中央军的掣肘，战斗不利等因素，更严重的是内部不团结。此次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是临时组合的宣传部队，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出世未久的女学生，这兵力不强本可意料，而指挥员逞一时之勇，遭此失败。而方振武是从山西来的“民主救国军”总司令，冯先生对他有看法，把他的骑兵合并入“民众抗日同盟军”，安了一个“北路前敌总司令”名义，另外又委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掌支配权，这在部属因主官的好恶而对方振武有意见，这也是意中事，例如冯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张一桃和吉部的政治部主任宣侠父，都说方是“自封的总司令”，对他都很轻蔑。最后战事发展到危急时，冯玉祥先撤下吉鸿昌、方振武走掉了，惹得张一桃们大骂“投机取巧”、“老奸巨猾”、“临阵脱逃”等等难堪的语句。只有宣侠父这个冷静的共产党员说

了一句有深意的话，他说：“冯先生一生三起三落，都有他的原因。他要走就让他走吧。以后，他还是会回头的。”

但是察哈尔“收后”，冯先生并没有“走”远。他是第二次上了泰山。这一次，他不是学习一点皮毛的理论辞章就自满的下山，而且决心彻底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他聘请了许多名师教授，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国际政治、中国史、古典文学、物理、化学、英文、日语，以及《春秋》、《左传》……等等课目，简直就是大学研究生攻读的全套课程，后来又增加练字和绘画。当时冯先生是51岁，精力充沛，失败后并不气馁，他的学习是很认真的。除了听课作笔记，参加座谈会讨论发言，有时上大课时他也提问，学习的气氛是浓郁的。听课的人除冯先生和李德全夫人外，有时候他的部属官佐也临时参加；讲课的教授们都是知名人士，如陈豹隐、李达、邓初民、陶行知、吴祖湘、杨伯峻、宋斐如、赖亚力、苏秉琦等先生，总计共有二三十人；都是北大、清华、工大、法学院、商学院等名牌院校的教授和毕业生。泰安地方老学者范明枢老先生讲古典文学，冯先生更是悉心听课。有时也作实验，例如上化学课作氢气试验，上天文课后夜间到山顶看星星等。这两年的时间，从科学的唯物的立场观点看，冯先生在思想上应该是大有收获的了。但老师们还是觉得美中不足，可以肯定的是：两年来冯先生的世界观有所转变，但又显得不纯，过于庞杂了。也许是急于求成，一口气要吞下一桌酒席，冯先生书单子很长，但实际只能一口一口地吃饭，因此他的思想里装进的东西还是有层次的。在两年中，冯先生在山上仍不忘情山下事，也不断与各方有信

使往还，策动西南军事反蒋，并曾派余心清代表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但诸般活动，都成泡影。1934年，他最宠爱的大将吉鸿昌，被蒋介石捕杀，不少老将领的背叛，等等事实与理论学习联系不上，思想还是不贯通。这时候冯先生忽然欣赏墨子《非攻篇》，经过范先生透彻的譬解，他似乎领悟到其中的道理，于是聚精会神的临摹大字，工整地把《非攻篇》四百多字抄完，特聘石匠，仿泰山金石峪的刻字《金刚经》那样，在“馍馍石”上雕凿了这几百大字，留作纪念。这就表达了冯先生在山上学习两年后的思想总结。

1935年11月1日，冯先生终于应召到了南京，再一次与老把弟蒋介石合作。这时候国民党界于的官职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委会常委”以及“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等。

1938年到武汉之后，“非攻”思想又起了变化，冯蒋之间又有争执，结果是“副委员长”、“司令长官”的军职被撤销，冯先生的口号是抗战救国，这时候抗日战火方殷，而冯先生失去了兵符，以前的老部属都转向听任蒋介石指挥了。思想上又向左转，没有枪就改用笔吧。冯先生开始找到老舍先生和其他左翼作家，他企望用纸笔代刀枪，从新开拓新路。冯先生创办一个出版社叫“三户图书社”，是用《史记》上的典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喻意是积极的，以前陈铭枢反蒋，也曾集纳许多有志之士办过“神州国光社”，从左的角度去作宣传工作，冯先生参考了这个意见。

到重庆后，思想上又有些波澜。客观环境是满目腐败现象，物价飞腾，民不聊生，“亡国论”、“读书无用论”充斥社会，报纸上大字标题是“十年寒窗不如一条扁担”，似是

为劳动价值赞颂，也是为知识分子唱挽歌。冯先生一时心潮澎湃，不知哪个朝代曾有此现象。他又专聘翦伯赞讲授中国史，希望从历史上找到方向。但这时候已年过花甲，思想不通就影响个性脾气难改

——从前，家长式独特的方法训练子弟兵，三九天也叫官兵赤膊操练劈刺，每天晨操搞“官兵问答”，罚跪、打屁股，甚至电话中命令“跪下！”谁也不敢反抗。在家庭中更是唯一的主宰，如冯洪国所说“母亲是他活活踢死的！”——现在，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上下内外已没有一个人绝对服从！有一天，因家庭琐事斥责了三小姐，不料她敢于不服而且服毒自杀，以死抗议！这件事使冯先生感受极大刺激，思量良久，竟又忘了他的“三户”精神，转趋出世之想。他看破红尘到缙云山上当和尚（这时他已不再信奉基督教）。这天恰巧我正在找“康藏佛学院”的太虚法师，听他说法：我就回想到在南京励志社听冯先生讲基督精神，又在武昌看他写“丘八诗”画牛画驴，现在又亲耳听他说要皈依佛法——这意想不到的思想变迁，真令人费解。

1941年，冯先生60寿诞，重庆《新华日报》曾出专刊，由周恩来副主席撰文祝贺。原意当然是争取冯先生坚定立场，再度积极地和中共做朋友，共同为中国的革命解放大



冯玉祥在读书。

业奋斗。在思想上，似乎很少挽回冯先生自己的想法。他从缙云山下来之后，又另辟蹊径，突然又想做中国的“教父”——他从1942年起始组织一秘密会社叫“利他社”，用封建迷信方式开香堂收徒弟。当时利用他的老部下张树声到处拉拢，张树声原是洪帮头目，辈分高，是“大字辈”，他还和青帮四川袍哥都互通声气，冯先生利用他们以结交江湖之徒。入社仪式也是斩鸡头沥血酒，红烛高燃，烧黄表纸，神秘地宣誓等等。冯先生究欲何为？人们纳闷。是否由此要找出篡政之流，或是要寻找血滴子义和拳之类？不可思议。一直到1947年在美国，冯先生还继续在侨胞中开山门收徒弟，在四十年代的末期还留下这最后的谜题。

冯玉祥先生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的一生中，思想转化的过程在客观上是很清晰的。即使他的表现有些矫情，戏剧性，但他的本质是可以肯定，而且不可否认他确也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今天我们已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是应该有专题研究的。（责任编辑：刘家驹）



苏子元

西伯利亚， 一个中国囚徒的诉说

○于 蔚

“我是两个历史年代的见证……换个说法吧，是一个剧本中的某个人物出现在两个不同的舞台上。”

“一个在苏联，另一个在中国，是吗？”

老苏点点头：“不过还应当说得更准确些，第一个舞台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第二个……不说你也知道。”他爽朗的笑声带着苦涩。

初次见到苏子元是在1956年的仲夏。他穿件米黄色柞丝绸的苏联式外套，翩然而来。我们同席就餐，相互颌首一笑就是认识了。他已五十开外，使我奇怪的是他的右手除大拇指外，其余四指都从根部截去，筷子是箝在大拇指与手掌中间来夹菜。老苏又跟我在同一部门工作。我们是新闻单位，离不了执笔为文，老苏也是用同样的办法——用大拇指箝住钢笔写出流利的字。渐渐我终于知道了点底细，那只截去

四指的手，原来连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1923年春天，苏子元和几个青年在奉天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间斗室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

不久，小苏陆续接到了中共在上海公开出版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和一些以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基督教文化侵略为内容的小册子。小苏把小册子在学生中秘密散发。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反帝的怒火从上海迅速蔓延到各地。中共党组织找小苏说，“许多地方都在罢课罢工罢市，独独东三省还没动，能发动起来吗？”

“能！”小苏毫不迟疑地回答，“至少可以把一些青年和学生发动起来。”

一连好几个夜晚，小苏跟几个伙伴分头去各学校找人、开会。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工科学校、第一第三中学和基督教办的文华、文汇中学等等，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准备工作：偷偷地在校内外广泛进行串联，做小旗，写横幅大标语，拟演讲稿；组成纠察队……6月10日——上海“五卅惨案”后的第十天，在奉天举行了几千人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在东三省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振奋人心的壮举。

这一年，成立了中共奉天特别支部。1927年又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

……

在中国北方的辽阔土地上，一边是革命的地下火种在点燃，在迅速运行；一边是军阀势力张牙舞爪，妄图扑灭革命地火，4月，绞杀了中共领袖李大钊同志。

国共第一次合作因为蒋介石的

背叛而破裂了。在上海,在广州,中国南方土地上处处腥风血雨,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击倒在血泊中。日本正咄咄逼人的鲸吞,引起隔江而望的苏联的戒备……

没料想,苏子元无意中串演了一个平凡而举足轻重的角色。

5月末,中共哈尔滨地委通知他去苏联学习。他在海参崴停住了,“学习”就在这里开始。

一幢俄式的普通住房里。教员向几个中国青年讲军事知识,讲中国东三省军阀的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教员还带他们到近郊山地,学习目测地形地物,作简单的绘图练习。

“学习这些是干啥用?”苏子元憋不住问一道过境来到海参崴并兼俄语翻译的高同志。

“听说是要我们替共产国际工作,搞军事。”

从此,他走上了国际情报工作的艰途……

秋天一个凌晨。商人打扮的苏子元在兴凯湖吹来的弥天雾气中越过中苏国界,来到他工作过的黑龙江土地上。他的第一次使命是单人匹马地侦察依兰镇守使李杜所辖部队的情况。他到处“寻亲访友”,溯松花江北去,再沿乌苏里江南下,在与苏联接界的黑龙江省东部尖角地带走了一个大圈圈。

冬天,他又一次过境来到东三省。这回除了调查军阀及其所属镇守使的组织和军备外,还要和东边道的土匪及海龙大刀会打交道。有时他在农家茅舍避寒,有时投宿山林小庙,先后接触了十几帮土匪。一袭冬装从冰雪天一直穿到4月末春水泛滥。

当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时,沈阳市一片

混乱。苏子元又一次领受任务,他来到吉林省延边的龙井市。以延吉《民声报》的记者身份,西装革履,翩翩然四出采访新闻。

1929年冰雪开始消融的季节,他又化装成一个浪荡少爷,在宁安县和同住的乡绅、商人、军官一起吃小馆,看小戏,听鼓书,逛妓院。他得到了张学良在中东路全线的军队部署情报。

以后,苏子元获得深造机会,他只身来到莫斯科。一个便衣军人带他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亦名中山大学)。

班上的同学都不懂俄语。教员是俄国人,由秦邦宪(博古)担任课堂翻译,秦又兼班的政治指导员。上课几天之后,学校秘书来找苏子元,说:“以后学校党支部或别人问起谁派你来学习的,你就说共产国际知道,别的都不必说,不要谈你给苏联红军工作过。”又说,“你的任务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要介入中国同志之间的斗争。”

学校中的中国学生分成了两派,王明派正策划着夺取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权。而学校校长米夫已占据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宝座。情况果然不寻常。有一人,他走访在莫斯科养病的萧子璋(即诗人萧三),他们是1927年在海参崴认识的,萧子璋对王明一伙极端鄙视,但对派系斗争持超脱态度,劝苏子元专心学习。苏不与任何人交往,他每天学习16至18小时。

1931年暑期结业,学院通知他和同窗朱少骅由于成绩优秀,批准他转入研究班继续深造。苏喜出望外。4月30日,他和相恋已久的朱少骅结婚了。

二

没料想,新学期还没开始,学校

的秘书通知他到红军总参第四局去接受命令。苏子元一听这“四”字就不自在。

他在第四局见到了远东科科长尤思克维奇。

“别尔金局长派你去伯力,在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工作。”

像是最后的通令。原来他仍系在“第四”这根桩子上,解不开,走不了。尤思克维奇又说,“还有聂耶德娃同志,你的妻子,她同你一起去伯力,同回中国工作……”

苏子元夫妇是第一次来远东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是加伦将军,他曾是中国北伐军的俄国军事顾问,原名叫布留赫尔,后来升了元帅。不久给搞掉了。

他们来到东三省,此时此刻,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家乡的人民变成了亡国奴。在这种紧张局面下,苏子元要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家乡布置一张庞大的情报网。

1936年7月的一天。伯力加里宁街102号。一位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将军向苏子元宣布了情报局长的命令,派西伯利切夫(苏子元)同志去华北工作。这项命令是红军总司令伏洛希洛夫亲自批准的。

他来到北平,改名王义之,以东北流亡难民身份住进宣武门内一家公寓。他时常在东北流亡学生中活动,有时还接近军界要员。他跨进国民党二十九军张克侠参谋长的官邸。参谋长有爱国心,喜欢和青年人谈论国事。

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苏子元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嘉奖。

他不知道当时红军总参情报局和伯力情报科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已经在肃反中身陷囹圄。一张网已向

他张开——他得到通知：立即回苏联去。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他取道广州、香港，赤道的风将他送过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经过3000公里的狭长红海，又进入地中海，直抵马赛港。船共行15000公里，历时一月。

1938年1月29日，莫斯科的巨大城廓再度出现在他眼前。在雅罗斯拉夫车站，早有一辆小车在月台上等候，由内务部工作人员送他住进了“新莫斯科饭店”的单间。

1938年2月4日夜间12点，一阵扣门声把他惊醒，进来两个内务部人员，出示了由内务部首脑叶若夫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在卢绵克监狱，他接连从一间牢房转到另一间，一直转了十几间，每间牢房都挤得满满的。犯人们都不说话，苏子元觉得是进了僵尸陈列馆。从服装上辨认，他们大多数是军官，有些是党政干部。

在“僵尸陈列馆”摆了一个月，没有提审，甚至也没人过问，到3月初，他只身给装上一辆囚车，运到火车站的一列货车旁，上了一辆铁皮囚车，挂到货车屁股上。车厢里看押他的有9个内务部军人，各带有武器，其中一个是指长，一个女护士，一个炊事员。苏子元不知道自己要被送往何处？咋个发落？

漫长的整整一个月的密封旅行，车轮最终停止了转动。出到月台，原来他回到了他多年工作过的老地方——苏联远东的伯力。

苏子元被提上内务部的法庭。第一审是与伯力情报科副科长伊里亚沁克对质。

审讯员命令伊里亚沁克读自己的供词。据说他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当武官期间，与苏子元合

谋，并由后者指挥张作霖的军队抄袭苏联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

“这真是奇谈！”苏子元答辩说，“在1937年以前，我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我也没干过军阀张作霖的任何差使；……”

第二次被带进审讯室时，审讯员向他指指旁边的一个中国人。苏子元一看，原来是他很熟悉的范某，此人低头而坐，他在供词中将苏子元1923年在北京加入共青团说成加入日本侦探机关，把1925年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改为去日本学习，把1931年他同苏子元一起在东三省为苏军工作说成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工作……苏子元走近范某气愤地说：“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死都不可怕，但不该玷污自己，玷污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范某神色绝望，嗫嚅着说：“你，你以后也会这样干的。”

三

在无数次审讯之后的一天深夜，他被带到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内务部中年军官，没带翻译，此人用中国话请苏子元坐在办公桌他对面的沙发上，桌上摆了红茶、点心、纸烟，军官开始谈苏子元在苏军中多年工作的成就：谈他在莫斯科学习的良好表现，然后问他认识不认识苏联远东“三巨头”——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加伦（布留赫尔）元帅、远东边疆党委书记拉夫林切夫和内务部长吉尔巴斯。军官许愿说，保证将释放他出狱，去莫斯科见斯大林同志，还准备建议派他到中共中央工作……不等苏子元回答，军官又拿出一瓶俄式水酒，说：“祝你立新功，为你将获得自由，干杯！”

回到牢房之后，他发现身旁多了一个中国人，此人说自己是内务部翻译，新近被捕，还说自己在内务部工作时就知道苏子元跟加伦（布留赫尔）元帅尤为密切，等等。

这个说东道西的“犯人”谈话越来越露骨：“远东三巨头在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主张苏军出兵对日作战，得到总参谋部某些人的支持，却被联共中央否决了，以后他们又反对进行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反对关于中东路谈判，苏联新宪法公布之前，他们曾建议恢复远东加盟共和国。这种种，实际上是企图挑起对日战争，在战争中投降日本，把苏联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出卖给日本……”

到第三天，他更加暴露出真正的使命：“如果你以前知道这些情况，应当向党报告，现在正是你立功的时候，你揭发之后，不但可以自由，还能干大事。”

原来如此！苏子元立即向同牢房的难友公开了这个假犯人的谈话。20多个苏军军官把他痛打一顿，直到看监的士兵进来才把他救出了牢房。

第二天，苏子元被关进了地下水牢。

1939年4月14日，远东军司令部军法处的法庭上没料想竟然跟妻子朱少骅见面了，两人都在被告席就坐。他们时时相互对望，传递眼色。打1936年冬天分别以后，她苍老多了，精神有些恍惚，总是以惊异的眼神注视着苏子元。

检查官宣读起诉书：按照1936年苏联新宪法有关人民公敌的第58条，苏子元犯有以下罪行：（一）58条1款——叛国罪：参加阴谋叛国集团，密谋分割苏联远东及东西伯利亚领土，成立远东共和国，使之

成为满洲国式的日本属国；(二)58条6款——间谍罪：充当日本间谍，派遣日本特务几十人潜入苏联情报机关，窃取情报，并为苏联高级军官转送情报给日本关东军；(三)58条9款。武装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罪；(四)58条11款：历史反革命。

罪状宣读之后，就闭庭了。他和妻子被押回各自的牢房。

判决以后，苏子元被关在内务部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判死刑的案子，都要上报莫斯科最高法院批准。此时，30多名死囚都患了坏血病。苏子元的牙床里挤出来的尽是脓血，口腔全肿了，张合都困难。发展到全身浮肿。

1939年6月11日，他被抬出牢房。法庭宣布：经最高法院军法厅批决，将死刑改为15年劳动改造；他的妻子朱少骅改判5年。

茫茫西伯利亚，到处是沼泽地和原始森林。在坎斯克劳改营的五号野营里，苏子元和伙伴们用古老的铁镐修筑路基。这里要修一条连接林区的铁路支线，7000名新来的罪犯分布在沿线7个劳改营里从事沉重的劳动。

劳改营到处是积水和腐草。那成群成片的蚊子，没头没脑地向人的肉身袭击过来，简直要吃掉你。人们像抽风似的，不断拍打，咒骂，跺脚，扭摆着身子。有人在空地上燃起火堆来赶它们，犯人中不少人患了疟疾。

日复一日，苏子元越来越没气力，他觉着自己正朝一条死亡之路一步步走去……

“靠这一点残废人的食品定量，我们迟早都活不成，这里已饿死了不少了。你还年轻，不能坐等这一天，要争取活下去！”一个华侨老人关心地劝告苏子元，“我人老，体

力不行了，没法独立工作，但我懂泥水匠工艺，我来教你，你我一道做，我们去砌炉子，做泥水活，多挣些食物。”

过了一个冬天，苏子元被调到劳改营木材加工厂给一个俄国老师傅当帮手，上刨木机床劳动。

老师傅告诫说，“这种机床不安全，以前伤过几个人，你得格外小心！懂得吗，中国人！”

三个月后的一天，老师傅自己被机床上的回马枪击中膀胱部位，不久死了。

苏子元当了机床手。他使全力加紧出活，每天完成定额二到三倍。工资是没有的，食物增加了，而他更关心的是争取提前得到自由。按规定，劳动超额，可以缩短劳改期限。到这年年底，他得到五个月的减罪记录。

“多干点，争取三个定额！”他每天催促自己。这天快收工时，动作有点慌乱，只觉得右手一阵剧痛，电刨打右手一闪，他本能地赶紧缩回，四个指头没有了，赶紧用左手捏住断指，他跌坐在地上，头一阵晕，伤口像火燎，血喷涌出来，流了一地。

苏子元没法再上车床了。伤势稍好之后，他被派到伙房烧火。这里烧的全是木头，他右手被一根绷带挂在脖子上，没法活动，只能侧下身子，用左臂从地上抱起劈柴，用左手往灶里送。

四

1945年10月中旬，苏子元被装上货车，发遣到伊尔库茨克以北的布拉茨克苦役营。

苦役营是沙皇时代的旧名。这里关的都是判了重刑的犯人。它的周围围着重重铁蒺藜，一个个望塔无时不盯着犯人们的行动。其实，

即使打开大门让犯人们逃跑，他们能逃出饥饿，逃出严寒吗？

苦闷，孤独，与世隔绝，昏昏沉沉，患过病的神经，使苏子元再度陷入失常的病态中。

一个远东特别红旗军的前军官有一天告诉苏子元：他们的司令加伦(布留赫尔)，早叫契卡干掉了，据说他死在远东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苏子元半天说不出话，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1952年9月4日，他和另外几个期满的劳改犯一起被叫去。一个劳改营军官通知他们立即收拾好东西出发。

“我们劳改期满了，我们应该自由了！”苏子元高兴地对大家说。

但他们又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内务部的监狱。这里关的全是劳改满期的“自由”犯人。10月18日，这群有几十种国籍的百余“自由人”队伍，从牢房里被提出来，押解到叶尼塞河码头上。叶尼塞河，向北冰洋滚滚流去。

大伙明白了：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是更严酷的流放。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这尊大神倒下去了。

从此苏子元连续发出申诉信件：莫斯科最高法院、苏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委、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北叶尼塞区内务部军务处……除了要求平反昭雪，还提出回祖国的请求。他天天翘首以待。

1955年12月25日圣诞节，一位军官客客气气地递给他一纸通知书，上面写着：“撤销原判，恢复自由。”

泪水成串地爬过他那被风雪刮得粗糙的脸，落在那件污泥似的熊皮坎肩上。18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除了那一点人类本能的生存欲

望和一丝丝朦胧的弄清问题的要求外，他的情感世界已变得近乎空虚麻木了。而现在，快慰和悲哀突然一齐爆发出来，使得他承受不了。他几乎全身瘫在椅子上。

等他恢复过来，便问：“还有我的妻子，她怎么样？”

“跟您一样，自由了。”

军官请他去拍一张相片，好为他办公民证明，并说：“北叶尼塞区党委书记要见您！”

……

党委书记和他寒暄几句之后，说：“西伯利切夫同志，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件事：您在这里时间长了，专业也熟练，这里很需要泥瓦工人，如果您同意留下，您的工资增加一倍，是这里最高的工资，您的夫人也可以来，一起生活……”

苏子元感到可笑，又有点气愤：“我跟我的妻子多年为第三国际、为你们苏联工作，可从来没有想到过钱……现在我的要求是：恢复我和我的妻子的党籍，回我的祖国——中国！”

书记脸上有些不快，他稍一踌躇，说：“你不愿留下，我们当然不会勉强，但你提的要求，我们这里都无法解决。”

苏子元来到妻子流放的集体农庄。这是一幢孤零零的木屋，像所有俄罗斯的农舍一样，屋墙是用粗大松木堆成的，每边开着个小窗。木屋前围起了栅栏，夏天她在这里种些短期成熟的蔬菜和土豆，供一冬春食用，现在却严严实实地盖着厚雪。从1936年冬天在伯力分别以来，除了1939年在伯力法庭上的两次相见，相隔已20年。

她和自己一样，老了，缺乏阳光的极地生活使她的脸分外苍白，眼眶下已长出两只眼袋，从眸子里透出迟钝的光，木木地望着他的脸……

苏子元挨着她坐下来，默默地瞅住她，她的脸上，已看不出她在秘密工作时期的那种机警和勇敢，看不出1927年她跟一批年青共产党员一起由王若飞批准奔赴苏联的那

种坚毅和信心，更看不出中学时代在家乡湖南听徐特立老师讲述革命道理的那种热情和纯真，这一切不再回来了。

1956年，北京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苏子元和他的妻子朱少骅回归故国。生活重新开始，中国的“百家争鸣”在他眼前洒满阳光。他觉得这一方针好，如果斯大林也能容下不同意见，就不介意整人杀人了。

不久，不少身边的人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苏子元困惑了。

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他实在憋不住了，提出了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的步骤问题。他遭到批判，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种令人发怵的孤独和寒冷重新包围着他，仿佛又进入茫茫的西伯利亚……

（编者按：苏子元现已90高龄，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他的晚年，已于1993年晋为副部级待遇。）

（责任编辑：刘家驹）



作者于卧病逝前的留影



贺龙 —— 惩罚 —— 日本 —— 军火 —— 商

○宋川
何善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上海，时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窘困，即派人赴沪晋谒孙中山，表示为革命事业当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甚为感动，复函贺龙：

“云卿先生鉴：

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内战，迨来以各将领互开烟诚，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间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情，简练益精。一俟会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逞。切望秣厉待时，共戮大难。此复，即询戎候！”

1923年1月，陈炯明兵败。2月21日，孙中山由沪返穗，再组大元帅府，首先下令讨伐受北京政府支持的西南军阀，以求先平定南方再挥师北伐。

4月13日，贺龙率部重返涪陵，14日，贺龙以川东边防军警卫司令名义发出布告安民，并立即参加同北军的作战。春夏之交，北军合力进攻，熊克武部屡遭挫折，成都、重庆相继失守，贺龙所部也退出了涪陵。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但懋辛、吕超、石青阳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军军长。贺龙为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仍归石青阳指挥。熊克武受命后率部反攻。贺龙所部与汤子模

师，周西成旅协同，完成了攻取涪陵，切断长江交通，阻止北军增援的任务。

1923年8月底，在川的北军急电吴佩孚：“限4日运械弹到渝即行反攻，否则危矣。坐镇武汉的北军首脑吴佩孚即以日本人的日清公司客轮宜阳丸、云阳丸装运大批军火开往重庆，派军械处长张远矾押送。”

这两艘运军火的船能否抵达，对孙中山的武装在四川之战中的成败关系很大。船是日本的，船长是日本人，从武汉沿长江上驶往重庆，虽然是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可是，挂了日本旗的船，哪个中国人敢拦阻？因此吴佩孚认为万无一失。

贺龙派往武汉侦察的参谋得知日船行动的消息，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立即与川东边防军前敌总指挥师长汤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有人主张阻止通行，迫其返回武汉。贺龙站起来，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我们手上也缺嘛！扣了它，我们多了一大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必胜。更要紧的是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大帅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如何扣船？贺龙提出：“日本轮船以经商为名航行长江，日本商人更是见钱眼开，我派人化装成几百个要搭船上重庆的乘客，乘小船围住日本船，就是从重庆往下水来办货的，如今打仗，回不去喽，搭日本人的船回重庆，沿途官员不会搜查，我们多付钱嘛。我看日本人准会要赚这笔钱，准会让我们登船的。上了船，得听老子摆布，由不得他们了。”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可以不公开动用武力，不在江上开火。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下“宜阳丸”，周西成扣下“云阳丸”。

贺龙回到旅部，把一些部下找来，朝他们笑着说“日本人的宜阳丸明早开到涪陵，上边装满了吴大帅运到重庆来打我们的军火，船要扣下，军火没收。我亲自化装登船。防止日本人逃跑，派一个连，一排炮兵在荔枝园码头上游的龟龙头埋伏，瞪大了眼睛盯住宜阳丸，他们要敢反抗逃跑，你们就开炮，敲沉它龟儿子。这桩事关系重大，只准全胜。从今天起，全旅进入战斗状态！这出戏，我们扮演喽！”

有人担心贺龙亲自登船会遭到危险。贺龙说：“危险到是碰上过许多，就是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碰它一碰，看看是我贺龙危险，还是他们得不到安逸。”

第二天拂晓，长江江面上雾气蒙蒙，两艘日轮沿江而上，驶近涪陵，接近码头。只见码头上站着几个客商，要求出重价搭船去重庆。日本人果然停船抛锚，让小船划过来。

贺龙穿着便衣，胸前搭着挂怀表的金练子，手上戴着钻石戒指，头上戴着遮阳帽，手里拿着“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上小船，几个化了装的卫士紧傍贺龙左右。七八艘小船毫无阻拦地靠拢了宜阳丸。贺龙和小船上的人都上了船走向日本船长。贺龙用杖轻挥。化了装的官兵迅速控制了驾驶台、机器仓、货舱、船长室和买办室等重要所在。后续上船的官兵也控制了甲板和其他地方。

日本船长大吃一惊，大吼着：“大胆，你们想干什么？”

贺龙说：“检查！”

日本船长在中国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土的。他叫嚷着：“你们敢……”

贺龙把手一挥，官兵散开，立即开始检查。

日本船长拔出手枪就要朝贺龙开枪，贺龙的卫兵们抢先还枪，当场击毙了日本船长。船上其他的人都老实了。

检查结果，缴获子弹82.2万发，炮弹300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贺龙等走出码头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一片震天的欢呼声。涪陵几所学校的师生也赶来参加看守虏获的宜阳丸。多年来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人民群众，今天一个个扬眉吐气了。遗憾的是旅长周西成胆小怕事，只派副官登船，使装满枪支的云阳丸逃回万县，还把上了船的副官捉住带走了。

贺龙扣船大获全胜，汤子模立刻向熊克武报告。贺龙和汤子模还向在汉口的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指出：“现在我军正奉命讨伐吴佩孚、刘湘，两军对垒之际，该公司轮船公然为吴佩孚载运大量武器弹药，前往接济被我围困之敌，显系故意违反国际公法，参与中国内战，与本军为敌。”

“涪陵为作战区，早经宣布戒严。该公司云阳、宜阳两轮，既已到岸接客，何以不接受检查？云阳丸何以砍锚逃脱？宜阳丸何以开枪射击？使我官兵受到伤亡！由于两轮严重违犯中国戒严法，该公司应负如下责任。”

“甲，对我方伤亡官兵，应赔偿一切损失，承担一切后果。”

“乙，依据戒严法规定，供犯罪之物没收。宜阳、云

阳两船，是此犯罪主体，应依法没收。除宜阳丸已经我方扣留外，现在逃之云阳丸，应由公司交出，一并没收。

“丙，该公司应向本军正式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违法私运军火及其它禁运货物。”

抗议信还强调指出：“根据中日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7条明白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得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能够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只没收两轮，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儆效尤。”

除提出严正抗议外，贺龙迅速把缴获的弹药支援了熊克武所率各路讨贼军。熊克武下令总攻重庆，贺龙旅协同熊军积极作战，大败敌军，攻克重庆。

仗是初步打胜了，可是日本轮船运送军火一案，尚未了结。各方都紧张活动起来。日本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北京政府以及依附它的云南、四川当局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疏通函件发到熊克武那里，甚至发到孙中山面前。贺龙是直接当事人，向他为日清公司说情的达官贵人就更多了。

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贵布根和驻重庆副领事康吉有风风火火赶来面见贺龙和汤子模。

贵布根是日本帝国官方代表，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说，重庆、宜昌领事事务由他主管，日清公司的事由他负责谈判。他质问贺龙：“宜阳丸的船主、领江和买办等6人失踪，听说被杀死。应由谁负责？”并说：“宜阳丸被捉押的司轮宫琦等两人应立即释放，交我领回。”“如果有罪，也应该按照领事裁判权，由日方处理”等等。

贺龙虽然没有与外国人谈判经验，却有满腔爱国反帝激情。他严肃地说：“日方船主、领江是不是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是他们拒绝检查，是他们首先开枪，我军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也有伤亡，又该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轮船嘛，我们已给你那个日清公司写抗议信，如何善后，我们提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战争状态时期我方颁布的戒严法，当然要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总领事火了，责问贺龙：“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也火了，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厉声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与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之罪是什么？”

贵布根又端出领事裁判权。

贺龙说：“我只管戒严权，谁要在我防区搞鬼，我就抓他问罪，砍头！”

日本总领事那一套能唬住北京政府的总理，却吓唬不了贺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北京政府、四川当局不顾与孙中山、熊克武一方还处于交战状态，不断派人来向贺龙求情。贺龙一概置之不理，并且进一步提出：日商必须赔礼道歉，赔偿我军100万，才能释放两个被扣押的日本人。

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在贺龙面前表示认罪。贺龙予以宽大处理，将其释放，还发给了路费。至于那两个日本人，日方强横交涉失败，又舍不得出钱赔偿，贺龙当然不予释放，把他们扣押了1年多。直到贺部回到湖南，日方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条件，贺龙才予以释放，也发给了两个日本人一笔路费。他们及日方代表都表示感谢，还客气地邀请贺龙方便的时候去日本访问。贺龙哈哈大笑地说：“谢谢喽，你们那个地方，恐怕容不下我贺龙呢！”

后来，贺龙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过：“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那两个日本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一个军械处长叫张运砚。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普通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那个军械处长哩，连信都没人写一封。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他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更加痛恨北京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埡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过盘川钱。”

（责任编辑：仲文）



邓小平 在解放战争中的二三事

1948年5月23日，在豫西宝丰县一个名叫焦楼的村庄，小平同志在中原军区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讲当时最关紧要的新区政策问题，以及由于大别山十分困难的无后方作战而产生的干部思想问题。

那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我们叫他邓政委。

他的报告一开头就揭示了中原斗争的四个实际条件：一、国民党军事力量还强大，必然要跟我们争夺中原这个战略区；二、地主、富农力

量还强大，不可轻视；三、群众觉悟需要时间；四、我们对地方情况还不熟悉。

这四个条件说明，要把新区变成巩固的根据地，不是那么简单和轻而易举的。

他指出，跃进大别山后我们犯了“左”倾急性病，就是因为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譬如，在我大军压境，群众一时兴奋、敌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便主观地要求半年完成土地改革。……

在报告中他重申：我们在新区群众工作上，应充分利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蒋、美为总方针。在政治上打击

首恶，建立人民民主秩序，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不让国民党抓丁征粮。

对大别山的“左”倾急性病，他一点也没有提党中央文件中有过的有关提法，他认为一个战略区的中央局书记，根据实际情况来执行中央指示，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他冷静地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政策、策略方面的建议。

会议的第二天，他收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在解放

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不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

他深刻地知道,实现一个战略目标,不但要有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来的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有许多不可省略的策略步骤。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纵队的政治委员,后来是这支野战军的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对我说他对邓的认识:“他是我们这个战略区的决策人。”

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从大别山转到豫西后,党中央派来了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兼军区副司令员。同他以及刘伯承、李先念、邓子恢、张际春一道经略中原。

1948年的七八月里,邓政委长途跋涉,从中原到西柏坡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前,他于8月24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专

题报告,总结中原新区政策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进入新区的意见。

大反攻以来的中原斗争,是极其困难的。关于困难,他不止说过一次。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突破汝河险关的时候,当一位指挥员嘴里吐露出“困难”二字时,他回答说:“困难,的确是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时,他向直属队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又一次讲到“困难”,他说:“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

在这一艰苦时期,他身体瘦削,眼窝深陷,过长的头发没有理,胡髭拉碴,在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稍带劳累的色调。这时我只看见他是那么冷静地思索。冷静得使周围的人有的感到有些寂寞,有的表示惊讶,有的怀着焦虑,有的会意地发出会心的微笑。但当困难的乌云一经飘散,正确政策和策略的阳光从天空投射到人们赖以进行革命活动的坚实土地上时,大家全都感触到他那脚踏实地的实在性格。

一

在解放战争中,邓政委多少次到过宣传部,但有两次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两次都是处理与战略有关的全区部队的教育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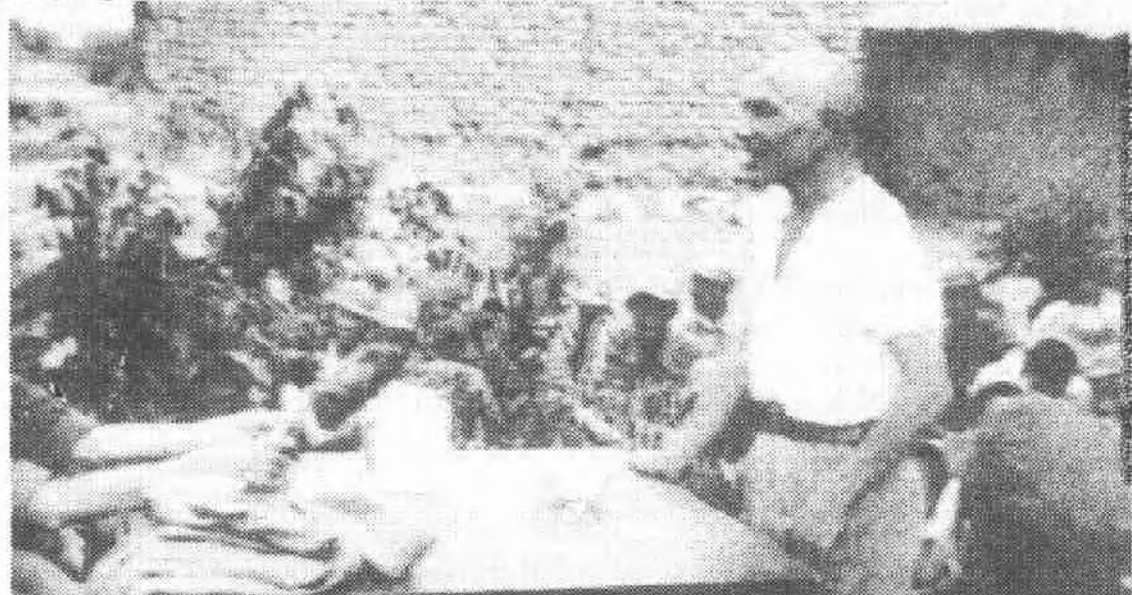
1945年,我党迫使蒋介石接连签订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从此,全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

邓政委对停战和整编军队的问题,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部队整训中,他特别强调深入时事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的教育。

进驻邯郸后,军区直属队就开始整训。在整训期间,邓小平政委倡导采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集合讲话”的方法,使首长的讲话一竿子到底插到基层。因此决定在整训期间利用每个星期一早晨全军区直属队在大操场会操的时候,请首长讲话,并要张际春副政委带个头。

于是第一个星期一,就由张际春副政委讲话,讲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整训。

第二周,由邓政委讲两个问题:认清时局和整顿纪律。他首先讲时



邓小平在大别山向直属队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通过黄泛区

局。他说：蒋介石企图撕毁停战协定，大规模的内战危机严重存在，怕斗争就是自己放下武器，自取灭亡。他号召大家要警惕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要准备从各方面打败敢于侵犯解放区的敌人。

不久，邓政委又来到军区政治部。张际春副政委把宣传部的部长一些科长都找去了。那时任白戈任部长，我任副部长。邓政委一见我们亲切地说：请你们来是要你们编一个本本。目前全军区在进行政治整训，最主要的是认清时局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进驻邯郸后发生过警卫团的一个排长和民兵队长冲突的事情，竟发展到架起机关枪来。人民军队手中的枪只准对准敌人，绝不允许对准人民。对准人民就意味着变质。还有一个和国民党谈判的整军方案问题。蒋介石是要把它搞成“并吞方案”的，企图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吃掉。用战争的方法吃掉和用和平的方法吃掉，这是蒋介石的两手。请你们编个本本，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中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部分编进去。发到全军区部队作为教材。

宣传部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很快就编发了，在军区政治部的印刷

厂印成精装和平装两种。发给营以上干部和每个连队，作为政治教材。

刘伯承司令员很重视这个本本。在豫西的时候，刘伯承司令员给中原野战军直属队和第三、六纵队干部讲大别山和全局问题时。谈到部队教育，刘伯承司令员批评说：“有些干部连基本的参考文件也不带。算命先生还带一本万历书。他给人算八字，只要一翻就知道。一个剃头匠也还要带把剃头刀。可是我们有些干部连一个算命先生也不如。延安出版的《革命教练》可以作参考，可惜不在了。政治部还有一个手本好得很。这两本书几两重都不肯带，怎么提高呢……”其中说的政治部有个手本好得很，就是指我们编的《人民军队的建设》这本书。

另一次邓政委到宣传部，是在第二野战军刚刚组建正准备渡江作战的时候。那是1949年初在河南商丘的事情。

当时，淮海战役后，部队要扩编为第二野战军，要进行两个月军事政治整训，准备渡江作战；中共中央中原局要开扩大会议，而他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作战总前委要在这里开会，部署渡江作战，而他是总前委书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很快就要召开，而他是中央委员。日程排

得密密麻麻，时间急急促促的。

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专门来到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和张际春副政委一道布置写两个战士教材。当时和我一同参加听邓政委指示和一道编写教材的，记得有葛洛、谈培德、毛雍如等同志。

原来他指示张际春同志起草的两个月军事政治整训大纲中，关于政治工作有两个重要内容，他决定专门就这两个内容编写教材，在战士中普遍进行教育，并且要由部队主要干部亲自讲课。其中一个是关于政治动员的。

邓政委指示，要根据这个精神编写政治动员教材，教材的名称就叫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整训大纲的政治工作的另一重大问题，就是政策纪律教育。邓政委对我们说，一个是政策，还有一个是纪律，这对进入新区有头等重要意义。他说：“你们编写的第二个教材，要明确地提出：人民军队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和《人民军队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个教材，整训时在全部队干部战士中普遍地上课，士气高涨，对打过长江去的战略方针，消除了疑虑，战士们加紧练兵。到新区

后,政策纪律都执行得比较好。

三

大陆上最后一战的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战果很大,国民党军起义的、投诚的,共达90万。

在胜利的锣鼓声、鞭炮声和欢呼声中,重庆街头发生的一件不为人注目的小事,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感触很深。

原来,他接到二野参谋长李达的一个报告:

“在重庆市上发现一个因病掉队的战士无人照顾,日夜在街上呻吟。有同志在街上碰着,即交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处理此事的同志并未送他到就近的该部队去,仍推他出去,使他匍匐转找司令部。”

“仗打完了吗?”

“仗打完了!胜利了!”

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却做了否定的回答,“仗还没有打完!”

90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有待于教育改造。

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着武装。如何发动6000万基本群众的任务,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60万军队,要成为战斗队和工作队,担负起这两个严重的任务,本身必须提高。

必须告诉全体指战员充分了解,仗还没有打完。向他们提出新任务,引导大家向前看。

1950年1月8日,邓小平同志起草了二野前委对川南地区的情况报告的回信。这就是“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当时杜义德担任川南军区司令员。

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四日电悉。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根据我们在重庆了解,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驻乡村,不愿住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而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如果区党委、省委、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计使风气一新,

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

1月17日,邓小平政委又和刘伯承司令员一道去参加在重庆召开的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他明确地提出了教育改造“九十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发动“六千万”基本群众,提高“六十万”军队三个任务。在谈到第三个任务时,他说:“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都依靠“六十万”为主去完成。要诱导大家思想向前看,部队要执行放手分散的方针,在改造“九十万”与发动“六千万”的斗争中去磨练,部队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必将大大提高。“克服落后思想就要引导向前看,提新任务,加强纪律的严肃性,保证新任务的完成。”

最后,邓政委以简洁明确的语言说:目前部队存在着许多不好的倾向,其来源是以为仗打完了。怎样克服?要提出新任务,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责任编辑:刘家驹)



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向淮海战场进发。



郭沫若在上海(1928)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郭沫若、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文学青年冯乃超、李初梨、彭康、宋镜我等人来到上海。从1928年1月始,经过整顿后的创造社,联合由蒋光赤、钱杏村组成的太阳社,在刊物上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说,郭沫

若等人在中国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这个口号,是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的。

但是,他们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存在着“左”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唯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扩大文艺界的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黄侯兴

郭沫若和鲁迅的 笔墨官司

郭沫若说创造社批判鲁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先生一人,而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创造社骨干成员认定鲁迅是代表没落的封建阶级。

署名杜荃(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



鲁迅先生

也有译为棒喝主义者)。”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就给鲁迅加上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

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常追忆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署名“石厚生”)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说“传闻他——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么?还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封建社会,流露了没落阶级的情绪……

创造社这些人并不注重问题的论争,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莫须有的罪名外,还要攻击鲁迅的籍贯、年纪、态度、气量,说鲁迅态度“尖酸刻薄”、“冥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

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坚持理性的批判。

首先,鲁迅批评了创造社推行的“左”的路线和唯我独革的行为特点。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其次,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说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

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第三,鲁迅反对这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人轻视生活实践,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

历时一年多的争论,鲁迅最大的收获是,为了弄清一些理论问题,促使他去研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1929年秋,中共组织经过细微的工作,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等人联合起来,停止论争,并于1930年2月16日,召集了鲁迅、蒋光赤、冯乃超、冯雪峰、沈端先等12人开会,检查了原先的小集团主义,没有掌握科学的批评方法与态度,放松了对真正敌人的注意等缺点。经这12人的筹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它标志着我国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责任编辑:刘家驹)(黄侯兴: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奥莉亚娜·法拉奇曾以记者身份采访过近百位国家元首、大主教以及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她咄咄逼人、如连珠炮般的提问令不少首脑人物震惊。基辛格声称，接受她采访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尼克松由此一度拒绝见她。随身总带着两只狗的塞拉西皇帝最后只能惊叫着撵她：“这个女人是谁？她来找我干什么？”

1980年邓小平接见过法拉奇，法拉奇说：“我在采访时就被他迷住了，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最好的上乘之作。”第二次见到邓小平时，她失去了控制，激动地叫道：“邓先生，I Love You，我爱您！”……



惊世名记者—— 法拉奇的中国情

○王基高

奥莉亚娜·法拉奇(1929—1992)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作家、评论家。

法拉奇，个子矮小，青春容颜已逝，但爬上脸的皱纹显现着她那非凡的经历和坚韧的意志。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表情严峻，目光炯炯，使人感觉这目光具有的历尽沧桑后的穿透力。这位曾多次震惊世界、令许多国家领导人不安的意大利名记者兼作家三次来到北京，使京城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法拉奇旋风”：大报小报记者成群地采访她；无数闻讯而来的中国公众在某处长时间地等待，只为一睹她的风采、或签上一个名……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还是孩子时她就突发奇想：当一名作家。于是她编写了古怪的小故事《亲亲历险记》，描写一个离家远行的女孩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一些事。这是她最早的作品。也是从那时起，这位女孩就产生了去遥远而又

神秘的中国旅行的念头。

17岁始，法拉奇进入新闻界，初时任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五十年代起任意大利《欧洲》周刊特派记者。很快她觉得，舒适的城市生活、平淡无奇的采访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她渴望一种新的激励，向往成为一名重大战争的见证人。她认为，战争是憎恶的结果，她试图通过采访找出把人类从善和爱推向暴力的根源。

法拉奇充满勇气、激情。自1967年始，她成了一名战地记者。无论何处爆发战争，环境有多险恶，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南美各地爆发的起义，无不留下过她的身影。越南战争时期，她在西贡待了7年，还飞到炮火连天的河内采访了武元甲。印巴战争爆发，她又赶到战场的前沿，还分别采访了英迪拉·甘地总理和布托总统。中东战争烽火蔓延，她去了贝鲁特……

在弹痕累累的贝鲁特生活体

验，促使她后来写成了史诗般的《Insciallah》：一伙意大利军人在贝鲁特企图逃离死亡、最终又全部死去的悲惨故事，还有爱和不可逆转的命运。她了解战争后知道没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揭示人类了，所以她的小说总以战争为背景。“我小说所描写的战争的内涵，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要比任何详细的新闻报道都更接近事实。”海湾战争爆发，她又飞往伊拉克，采访了一个在沙漠中被俘、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的伊拉克士兵。她说虽然那个士兵毫无历史地位，他讲述的话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却是她所作的最富人性、最有悲剧性因而也是最精彩的采访之作。“当然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的，如果从历史意义上讲，13年前我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最好的上乘之作。”

隐藏在她钢铁般意志和倔强的性格的背后，有着十分宽广和仁慈的爱。她在纽约写《Insciallah》最紧

张的时候，她从电话里听到在佛罗伦萨的父亲声音不对，放下写作第二天就飞到父亲身边，从早到晚服侍患了癌症的父亲，直至父亲死在她的双臂怀抱中。“我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问我：‘你说话总喜欢挖苦人吗？你要对你父亲这样说话，他会不会给你一记耳光？’我当即回答说：‘我父亲不敢打我，否则我就去叫警察！’现在我想是应该这样回答，我父亲不会打我，因为我是有自我约束的人。但对眼下一些完全丧失了道德感和纪律约束的年轻人，我父亲、或邓小平，是可以给他们一记耳光的。”

法拉奇的已故丈夫希腊民族英雄阿莱科斯，就是她在采访时结识的。她以丈夫的生平素材撰写的长篇小说《人》一书，曾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小说记述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1973年，法拉奇在采访中邂逅了刚出狱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阿莱科斯，“他的脸就像是被钉了10次十字架的耶稣的脸一样，因为他被囚禁在5平方米的水泥牢房里5年，受尽酷刑……日日夜夜等待枪毙。”他俩坠入了情网，法拉奇陪伴阿莱科斯逃离了希腊，让她意大利的家成为后者政治竞争的基地。仅仅共同生活了11个月，阿莱科斯在潜回国内去妈妈家的途中，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把他的车挤出路外，当场死亡，150万希腊人参加了她丈夫的葬礼。法拉奇哭泣、诅咒，但她更铭记住一件事。阿莱科斯曾带她到伯罗本尼撒半岛上，看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刻下的一个字。她说，30年来，尽管日晒雨淋，尽管政府也曾经用石灰浆糊掉它，这个字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重新显露出来，这就是希腊文——“不”！

在写《Insciallah》期间，苏联解

体了，柏林墙倒塌了……每当发生这些事件时，她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倍受折磨，她要立即飞去莫斯科，去柏林。……

法拉奇从1964年起移居美国纽约。30年来一直从事职业撰稿与创作。《好莱坞的七大罪》、《无用的人》、《自私的人》、《假如太阳死去》、《采访历史》、《战时的佩内洛普》、《没关系，就这样吧》等作品不仅为她赢来了荣誉，也记载了这位传奇而富有挑战的作家辉煌的历程。她曾荣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两次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以及畅销书奖和其它多项奖。是美国及欧、亚、南美等地报刊杂志最受欢迎的撰稿人。由于她的神奇经历，好莱坞的制片人4次要要把她的生平搬上银幕，并挑了著名影星休斯顿的女儿安杰里卡·休斯顿扮演她，但法拉奇说“不”。并要律师回信，告诉他们：“你要敢拍，将让你有好受的！”美国流传起一些关于她的虚构的传记，半是虚假、半是歪曲，她的代理出版商在20年前就提出，愿意用“造一座金桥”的代价请她写一部真正的“自传”，她回答说“不”，“我不会写的，最美好奇妙、不可思议的生活经历都是自己的事情，不愿意让公众知道。我不相信那些能在我的自传中把我的事情告诉别人的人。”

“人就意味着勇气和尊严；意味着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这是她丈夫阿莱科斯留给她的遗嘱。

“我不是因采访名人而成名人的”

当人们问起她的记者和作家生涯时，她说：“我不是因采访名人而成为名人的，采访名人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而我写它也远没有写

其它作品那样花力气，大概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吧。可许多人一见我就要引用这本《风云人物采访记》，好像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的事情。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不过，采访很令我快乐，通过采访了解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这是职业的挑战。”

她强调说她是一位“作家”，只不过像吉卜林、海明威一样把作家的技巧借给了记者。

“你知道杰克·伦敦吗？他在日俄战争中作过报道，英国作家吉卜林，在印度也作了许多报道，今天来读也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很新鲜。还有海明威在西班牙战争中所作的报道，也是杰出的。为什么人们喜欢读？因为它们都是作家的作品，文学的作品。如果现在杰克·伦敦、吉卜林、海明威坐在你的面前的话，你就不会把他们当作记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当一个记者？……在美国就曾经出现过一个丑闻，就是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美国许多报刊一片嘘声，认为他是记者，怎么能获文学奖？……”

“我当时应《欧洲》周刊之约进行这些采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世界上一些大权在握的人物，才能参加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取到历史的直接见证。但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些大人物的，每次采访都是一种职业性的挑战，一种创造性写作的挑战，你读那些对话，不是更像一段段话剧片断吗？……”

“在这世界上最不让我害怕的就是权柄赫然的人。我只要求平静对话，你要是给权力过多的尊重的话，权力就不会尊重你。所以他们相反怕我，因为我总是说出事实，哪怕要冒坐牢和牺牲的危险。”

法拉奇认为：“作家能看见别人

看不见的东西,听见别人听不出的声音,想象和预知别人不能想象和不能预知的事物……亲爱的,任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作家。任何变革(无论好坏)离不开作家。不管怎样,总是作家们推动世界,改变世界。因此,写作是最有用处的职业,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和令人满意的职业。”这是法拉奇真实的自我。

也许正是因为法拉奇对生活的热爱,对写作的热爱,才使她在看到中国的变化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中国的改革意味着,你至少要写一本书!”

“我因为热爱你们而担忧”

10月14日下午3时,到北京建国门内的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作演讲,是法拉奇此行中视为最重要的事情。

她穿一件很体现她气质的米黄色的西便服,亚麻色的披肩发衬托起一张很有内容的面庞,她脸上不施朱唇粉黛,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尽管前一天她患了感冒,还在发烧。她亲自检查座椅的摆置,仔细地试麦克风的声,然后面对还空无一人的会场坐下了,静静地、一动也不动。

不久,大厅座无虚席,过道、门洞都拥满了法拉奇的中国同行及文学爱好者。在意大利驻华大使罗西先生致词后,法拉奇女士终于向我们敞开了她的心扉,把她深藏已久的文学梦、中国情娓娓道来……

感谢在座听我演讲的各位。你们的出席增加了我这次访华旅行的快乐。是的,我很高兴在这里,为了让你们了解我是何等的高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小的故事。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已经

想成为一个作家。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我写一些古怪的小故事,然后用蜡笔为它作插图,用针和线把稿纸缝在一起,使之成为一本书。一个糟糕的题目为《亲亲历险记》,谁是亲亲,是一个中国小女孩,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小女孩,她从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庄中出逃而去了北京和上海——一个神奇国家中的两个神奇的城市。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但那时我就爱上了她。

为什么我爱她。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得归功于赛珍珠:1938年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关于中国,她写了许多很好的书。然而,我发现《大地》在意大利翻译和发表的日期是1941年,也就是说在写作《亲亲历险记》的三四年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赛珍珠的份。点燃我对中国之爱会不会是马可·波罗?或者是一部电影,一个记录片,一幅画,一张照片?

我唯一能肯定的是,这爱从未熄灭过,也没有降过温。我遗憾长期被拒之门外。啊,为了来华,我竞争了多少年啊!向多少人请求帮助啊!在毛泽东的时代,我甚至向西哈努克亲王开了口,他以一公斤法国奶油鹅肝为交换物答应我向周恩来求情,但毫无音信。那时的中国不想要我,我应该等到邓小平的中国才得以最终实现我的梦想。也好,在我们意大利有一句谚语:“晚来总比不来好。”

1980年,我作了对中国的第一次旅行。那一年,我对邓小平作了一次奇妙的、令人意外的采访。在这期间,我遇上了一件相当美好的事情。这一礼物使我多么骄傲啊!以至两天以后我再见到邓小平时,我失去了自制。因感激而发狂,我喊道:“邓先生! I love you,我爱您。”为了缓和我的激动,邓不得不向他的吓坏了

的部长们低语:“她说话像美国人。”

法拉奇撰写的有关邓小平的采访,使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了正迈进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她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人们问我哪个是我所做的最好的采访?我总是说:对邓小平的采访。主要是因为我和邓小平先生之间有一种个人的、充满人性的互相理解。邓小平喜欢我,我也更喜欢邓小平。我在采访时就被他迷住了,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老人。当然我的提问还是很尖锐的,以致有一刻,邓小平问我‘你是不是总是好挖苦人?’我说:‘对的,我总是这样,有时更厉害。’

“作为一个报道记者,我那时很想来看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痕迹,譬如被称为‘造反一代’的红卫兵。我的了解先从他人的叙述、照片和电影里,首先让西方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穿一样的或黄或蓝的制服,我觉得可怕,很不合人性。尽管1980年我来之前心理作了准备,我知道在等待我的是什么,但在抵达时我还是感觉到很大的震惊。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悲哀的国家,很苍白、很悲哀。这对我从9岁小姑娘起就梦想来中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望。”

“这一次来华就发现了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这是在经历了许多艰辛,许多折磨和许多痛苦后的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的。……总之,改变意味着丰富和开扩个人所知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当然,它还意味着创造文化……”

法拉奇说,她看到了变化的中国,看到了许多欢乐,而很少悲哀,市政建设、服务设施、文化娱乐均有很大改进和增加。她认为:改革绝不意味着仅仅是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美酒佳肴,高楼大厦,丢弃自己的传统,现代化还应当包括丰富的精神

生活、开阔的视野、高尚的情操和人类的良知……

法拉奇警告说：“在西方，道德沦丧，文化衰退，常使我感觉又回到中世纪……我担心中国人正在往这条路上走。我接触的少数中国人，他们穿着非常糟糕的西方衣服，谈论的都是钱，也看到了酒店的拉客女郎，我对此非常遗憾。”

“由于我非常热爱你们也产生了两种担忧：一种是你们模仿西方社会的错误和荒谬，这样就会忘记你们的传统，忘记你们是中国；第二种是这么大的变化，如果结果仅仅是经济上的，而忽略文化精神方面，那么任何变化都不会是好的真正的变化。”

法拉奇演讲获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一位年轻学者站起来说，过去没有读她的书，但今天他要向她表示敬意。法拉奇眼睛湿润了，用中文说：“谢谢！”

“人就是意味着 勇气和尊严”

在此后的记者提问时，法拉奇平静又微笑地侃侃而谈，素来咄咄逼人的采访者回答采访提问自然十分独特、精采——

记者：许多人确实很钦佩您的勇气。您的勇气从何而来？

法拉奇：……在去采访霍梅尼的时候，如果是你们中的一位记者去采访肯定会说：霍梅尼先生，对您的接见非常感激，莫大的荣耀啦，就会有一种下拜的态度。我是用这么几句话开始的，用一种有教养的口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具有教养的人）说：“霍梅尼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伊朗的新酋长，新的霸主。”霍梅尼一下子震惊了，他阴沉地抬起眼睛，生气地盯着我，因为他的周围充满恭

维，没有人敢对他说这样的话。我又重复说：“对了，我说你是新的霸主、霸主。”霍梅尼这时只能对我这个肯定的问话作回答，他说：“我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霸主。在你作这么一个肯定的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看看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从那时起，他就对我产生了尊重，这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成为了一种很平等的对话。

记者：当时你不害怕吗？

法拉奇：（大声地）我为什么要害怕？我想霍梅尼应该害怕我。你说说我为什么要到霍梅尼先生面前害怕，我想知道。

记者：只要想想写《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

法拉奇：在我第一次采访霍梅尼以后，伊朗也有人要杀死我，但我没有像拉什迪那样做许多广告，我回去后，没人知道这段故事。8个月以后我又回到了伊朗，刚刚下飞机就被逮捕了，给关进机场的一个小房子里。我就高声大骂，骂他们的爹、娘甚至他们的孩子，什么糟糕的话都骂出来了，最后他们把我放走了……

记者：法拉奇女士，您作为一个关注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女记者兼作家。您对当今世界怎么看？

法拉奇：我很不喜欢这个世界。当然这里指的是我从属于的西方社会。我不能被指责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从我的个人生活、公民生活和写作生活，都可以证明我不保守而是相反。但没有一个明确的、一定的价值体系，一个人不能生活。好和坏总是存在吧，有些东西譬如叫做诚实、信任、勇气，现在都遭到了蔑视。

记者：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西方年轻一代？

法拉奇：只要看一下今天的人

怎么穿衣服就知道了，都穿得那么糟糕！还有音乐，喜欢Poke（摇滚），纯粹是震耳欲聋的噪音，我很憎恶。许多年轻人丧失了理想，过去不是这样的，年轻时充满理想，并随时可以作出牺牲，而现在的人只考虑金钱。也毫无纪律可言，要知道没有一定的纪律，不仅一个社会，连个人也无法生存。

记者：您对东欧及苏联解体后形势怎么看？

法拉奇：原来那个阵营解体了，柏林墙倒塌了，但我担心这倒塌只带来很少的一点东西，只要看看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发生的事情就可知道。譬如匈牙利过去没有出版自由，一到明白有自由了就拼命出版黄色书刊以赚钱，使市场充满性杂志。所以情况突变、又毫无准备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像给了他一个航天器，也不会使用。……我担心中国人正在往这条路上走。

记者：您能再具体讲讲对中国的印象吗？

法拉奇：我才三次来中国，这不允许我作绝对的判断。而且都是在北京，中国是非常大的。譬如前几天我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偏僻农村的情况：一个农民遭到他的村长的非常严重的欺侮和殴打。这同我在北京看到的状况实在不一样，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也引起我刚才说的担心。真的，我是非常爱你们的。

……

法拉奇的回答，不时引发阵阵哄笑和掌声。她显得轻松、从容，脸上又浮起了那种自信的微笑。正如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的：“在中国，记者还是很天真无邪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人民币 是不是毛了？

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变得最激烈、最彻底的要数金钱观。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节,《人民日报》破天荒地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恭喜发“才”》的文章,这饱含如意吉祥的祝福,使中国人从沉睡已久的发财欲望中一夜之间猛醒过来。

人们把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加在一起,惊奇地发现,竟是一个非常顺口的数字:“168.88元”,“一路发发发”。

昨天,“市场经济”这个字眼还令人毛骨悚然,今天,已经被党的十四大所承认,登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典雅之堂。

曾经被视为万恶之源的钱财,如今,也使人们认识到钱在市场经济中运转的魅力。

中国人从谈商色变、谈利色变的心理中彻底解脱出来。中国人不仅敢正视钱,也敢正视自己。

当前,一面是经济持续增长,一面是物价频频上升,老百姓在大喜大忧中惊恐地注视着:票子究竟怎么了!下面请听几位熟悉金融的人士评说:



钱,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票子”。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商品交换的最初形式是以物易物。渐渐地人们在物品交换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了一种简便、直接而又能被人们所认可的物品,这就是人类创造的万能商品——货币。

大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出现了贝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金属冶炼业的出现,金属铸币逐渐代替了光滑、耐用的贝币。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铜币的产生,标志着我国货币开始进入金属货币的阶段。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币制,不仅统一钱面文字,统一铸币重量,还推行“半两”方孔圆钱,奠定了我国钱币的形制。这一措施促进了各地经济的交流和发展。随后,

圆形方孔钱成为各朝代铜钱的固定形式,一直沿用到清代。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铸“五铢”钱,通行使用长达 700 余年,是我国铸币行始时间最长的一种铸币。

西汉是我国用金最多的时期。随着商业发达,金银币逐步发挥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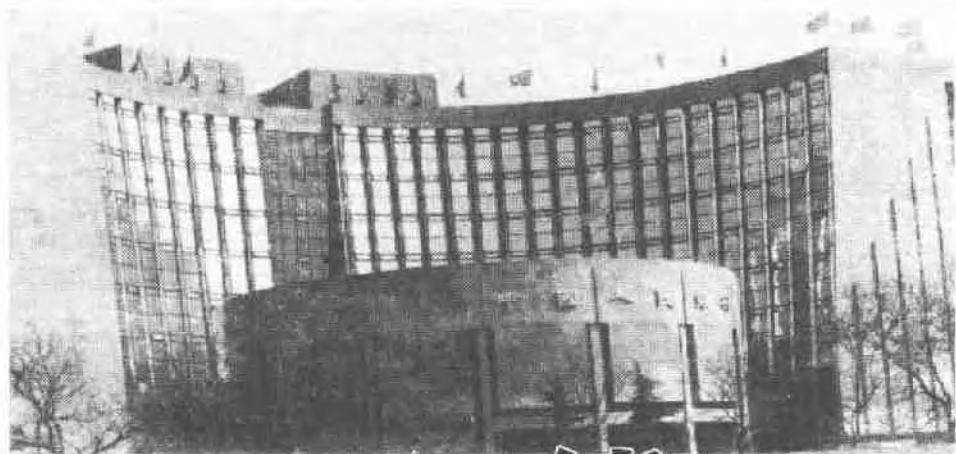
“元宝”一词是根据元代银铤背面铸有“元宝”两字,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在广东省首先铸造银元“光绪元宝”,又称“龙洋”,随后各省相继仿制。随着社会的发展,金属铸币的交易量也逐步增大,由于金属体积大,分量重,给人们的携带、搬运带来许多不便。于是社会上一些有地位、有信誉的人,比如寺院主持、商人、地主,就开始替来往商人保存货币或

兑换货币,还有一些人,手里的钱日益增多,自己用不了,就借给别人用,收取利息。久而久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从事货币处理业务的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叫柜坊,有的叫邸店,后来人们统称为钱庄。

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的“交子”、“钱引”,后来南宋印发“会子”,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的中统元年,出现了强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中统钞”。在明、清封建统治时期还印发了宝钞等等。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清政府核准在上海设立了商办“中国通商银行”,于 1898 年发行了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至此纸币逐渐变革成为今天流通使用的钱币。

(责任编辑:林琳)



孙勇

银行里的钱

是怎样进入市场的

在北京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物每天都吸引着过往行人，一个建筑被一座扇形高楼紧紧地抱在怀里，从高空下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座中国古式元宝的形状。元宝是财富的象征，中国金融的心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设在这里。

这座大楼代表着中国信贷、结算和货币发行的中心。它所发行的人民币使我们和它发生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你是个工人，那来自银行的贷款，如同“润滑剂”一样，保证着你所在企业机器的正常运转；如果你是个农民，那来自银行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就成为一种经济动力源；如果你是党政机关一个工作人员，那么这里发行的“票子”就有一部分成为

你口袋里的工资。

事实上，这个“金融的心脏”还吸收储蓄存款达 1.3 万亿元，发放的贷款达 2.16 万亿元，它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到 1992 年末达 194 亿美元，黄金储备达 1267 万盎司，它所发行的货币在流通中已达 4336 亿元。一句话，金融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影响着你我他的家庭生活，影响着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如果要问银行的职能是什么？通常的答案是：印钞票的、发钞票的、存钱的、贷款的……

实际上，银行是创造货币的特殊企业。

金钱的诱惑力超过了任何一种商品的诱惑，使金钱制造业——现代印钞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北京城的西南角有个叫白纸坊的地方，据说某位领导乘车途经此

处，见高墙、铁丝网、森严的警卫，脱口问道：“这里什么时候又盖了座监狱？”随行人员告诉他：“这不是监狱，这是北京印钞厂。”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印钞造币厂分散在数省、市，默默地承担着制造“金钱”的重任。在印钞工人眼里，花花绿绿的钞票不过是一些印有图案的纸，而最简单的叫法就是两个字：产品。可以这样说，货币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两者必须要保持一种平衡稳定的关系。如果商品总量大于货币总量，商品就贬值，就会出现“大甩卖”、“赊销”等降价现象。如果货币总量大于商品总量，社会上就会出现“抢购”、“有货无价”、“排队购货”等现象。因此，任何一方的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过多

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过多的商品追逐过少的货币,就会形成生产流通呆滞。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人们对银行货币发行过多的指责多了起来。不管这种指责是否准确,通货膨胀却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的实际后果。随着经济生活对货币需求的不断扩大,印钞机器不得不高速运转,努力生产更多的产品——金钱,来适应生产流通对它提出的要求。在一次印制工作会议上,印钞厂的代表们不无幽默地说:“别人是辛辛苦苦地制造新产品,我们是辛辛苦苦地保证‘通货膨胀’。”

从1952年到1992年40年间,人民币发行流通约4千亿元。

对这数额巨大的货币发行流通,有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疯狂的印钞机。

究竟是印钞机疯狂,还是体制上的原因?道理不言而喻,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例,1984年末,正逢信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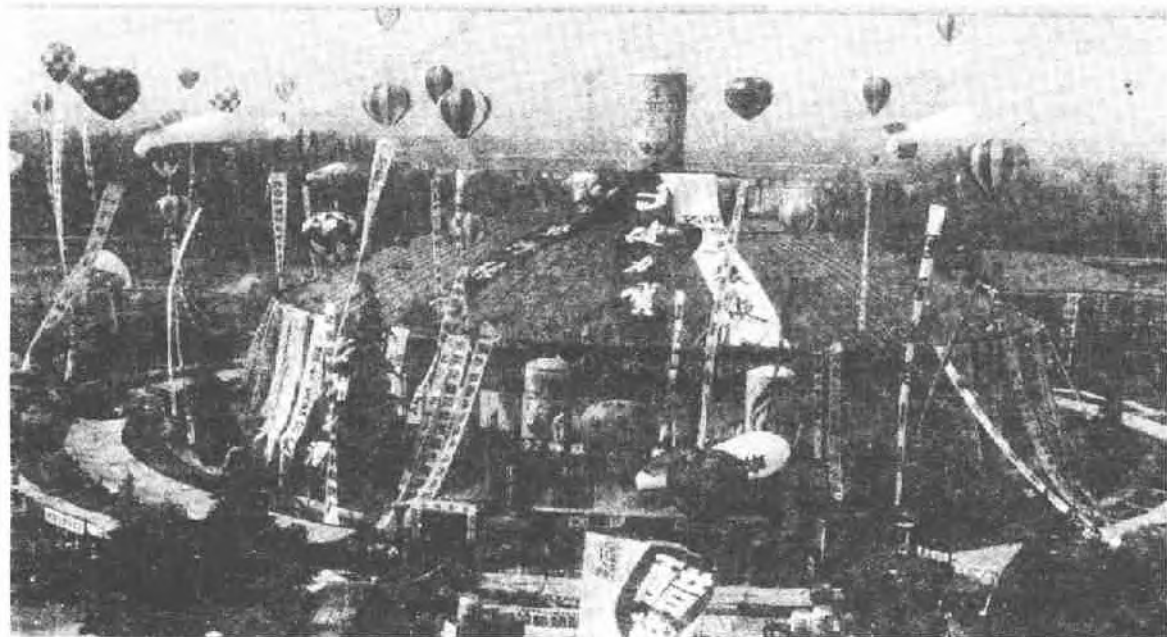
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实存实贷”办法,结果,各家专业银行争相占年末贷款基数,导致了货币发行大幅度增加,当年新发行货币262亿元,这在我国银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时正值吕培俭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此事过后不久,陈慕华调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改任审计署审计长。于是,民间出现了“房子、车子、票子”之说。房子(指原行长李葆华解决了人民银行办公楼),票子(指吕培俭在任时正逢第一次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车子(指陈慕华在任时解决了银行运钞车和其它办公车辆)。

对于民间流行的顺口溜,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善良的老百姓总是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人们相信,改革中的阵痛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然而,真正令人悲哀的是从此以后,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如同一匹野马一样跑得飞快。1992年,货币发行量绝对额创下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达1148亿元,全年增长幅度

达36.4%,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货币投放高峰年。大量的货币投放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票子毛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过多的考虑是衣食住行,而国家银行里的钱,考虑的不仅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还有国民经济发展建设的正常运作。

多少年来,中国的货币改革一直是在艰难的推进,既要维持经济增长,又要稳定货币,有时还要承担产业结构调整职能。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将逐渐减少,价格也将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实行市场经济,放开价格后,当票子发得过多时,就会出现公开的通货膨胀。有专家指出:在当前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加快的条件下,应以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把金融秩序稳定作为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责任编辑:汪洪)



○左 卉

第一张人民币面世

标志着

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印制了四套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同时发行的,第一张人民币的面世,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第一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合并各解放区银行的基础上,开始发行的。除东北解放区以外,各解放区原来发行的货币(冀南币、晋察冀币、西北农民币、陕甘宁币、北海币等)都逐步兑换成人民币。同时,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在金元券崩溃的同时,人民币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套人民币最明显的特点是战时性。有人说,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人民币和子弹一样重要。因为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要求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必须保证供应。在解放北京的前夕,当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之中,人民币的5元和50元钞票的原版就已经在北京的一家印刷厂组织印制了。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的同时,第一套人民币也开始和群众见面,可见,第一套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说起来,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大相信,第一套人民币五花八门。不仅是因为钞票的面额从1元、5元到5

万元不等,还由于版别繁多,采用多种印刷工艺,如凸印、凹印、胶印等等。1951年又制作了带有蒙文、维吾尔文的人民币。从1948年至1953年共印制了12种面额60多种版别的人民币。在当时建国初期的条件下,人民币油墨纸张全靠就地取材,有什么用什么,因而质量参差不齐,票幅尺寸大小不一,在今天看来,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于1955年3月,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期。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套人民币从1950年最初的酝酿到1955年3月出台,经过了长达5年时间。第二套人民币虽然是1955年出台,版面上却有1953年字样,称为“五三”版。第二套人民币的主币和辅币共计有11种面额,13种版面。当时新旧币折合比率定为新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风格,打破了固定的四边框,采取了以前未有的新图样、新格调,反映了新中国新的精神风貌,同时,第二套人民币上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票面额的数码均采用了蒙、藏、维吾尔、汉四种文字,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团结。

1962年面世的第三套人民币,采用了自行研制的设备、钞纸、油墨

和工艺,防伪性接近当时的国际水准,成为中国印钞工业技术发展的里程碑。

从1962年4月到1974年间,第三套人民币共发行纸币7种面额,9种版面,连续生产了20多年,是我国发行的人民币印制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种版式。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风格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把工业、农业、手工业、轻工业都设计上了画面。

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采用了14个民族与工、农、知识分子人像和老一辈革命家浮雕像为主景,钞票纸分别采用满版古钱水印和固定人像水印精制而成,防伪效能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1957年12月1日,我国开始发行1分、2分、5分铝质金属硬币。

1992年6月1日,我国又发行了新的1元、5角和1角三种金属币,具有色泽美观、耐磨耐蚀、成本低廉等许多优点。

这四套人民币的印制发行,浓缩了新中国印钞工业的发展历史,纪录了共和国成长的风雨历程,也使我们与人民币结下了不解之缘。

(责任编辑:吕先)



○
钟
卉

毛泽东不同意 他的画像 设计在 人民币上

纵览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钞票，会发现，许多国家的钞票都有人物的肖像，美元中有华盛顿、林肯、杰克逊等一系列政治家的形象，英镑上有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肖像。而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民币却没有毛泽东的画像。

是设计人员的疏忽吗？其实不然。实际上，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曾考虑过将毛泽东的画像设计在人民币上。

1951年，第二套新设计的人民币的试绘彩色票样，送到了国务院，请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批。

不久，这套新设计的人民币的试绘彩色票样，又呈送到了中南海请毛泽东主席审定。

面对人民币新设计的票样，毛泽东深思良久。新中国肩负的是一个已经衰败贫穷的古老国家。不是吗？公元1800年，中国生产的财富占全世界总值的1/3，过了一个世纪，到公元1900年，骤然下降到6.8%，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收

的原国民党的官僚资产所剩无几。泱泱大国，经济需要运转，人民需要饭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决不是空谈。

这套新设计的彩色票样，5元券上的设计主景是民族大团结，原设计的人群中有人高举毛泽东的画像。1元券的设计主景为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有红旗彩灯和毛泽东画像。2角券的设计主景是前进中的火车，火车头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

据参与人民币设计的罗工柳同志回忆：人民币的设计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元券的图案是当初参考苏联卢布的式样设计的。因为苏联卢布上有列宁像，故而设计人员便在人民币上设计了毛泽东的画像。

然而，毛泽东却不同意将他的画像设计在人民币上。

几天以后，周恩来向设计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对5元券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周恩来批示：“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可以用，但是根据

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5元券上的毛泽东的画像换成了标语。1元券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去掉了。2角券火车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改成了红五星。

于是，第二套人民币就这样问世了。

这些对人们并不陌生的5元券、1元券人民币，实际上是中国银行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其中两种。

（1964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限期兑换收回由苏联代印的3元、5元、10元券三种钞票，收回后全部销毁，重新发行我国自己生产的5元、10元券。因而，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再看到1953年的5元券钞票了。）

如果说第一张人民币问世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对人民币将会有个全新的认识。

（责任编辑：陈英）

让老外目瞪口呆的中国大款



1992年12月21日,北京建国门。

赛特购物中心开业第一天。熙来攘往的二楼女鞋专柜,一位年轻女郎挑中了一双400多元的白皮鞋,身边的男伴立即转向导购小姐:“还有紫色、咖啡色和蓝色的吗?再一样颜色给她来一双,好配衣服!”付款之后,两人又径奔“皇家丽人”时装屋。

地下二层,卖得最热闹的要数汽车装饰品和家庭用品。标价百余元的儿童小毛巾,有的顾客一买就是七八条。售价几万元的水床,当日即有人订购,而水床在国外尚属奢侈品之列。

一位日本友人来赛特购物,步入一楼大厅,来到各种名牌化妆品柜台,兴奋地指着其中一处,说这种英国名牌化妆品正是她所需要的。一问价,她大吃一惊,同样的货要比东京贵出好几倍。看着进出自如的中国人,她瞠目结舌。

八佰伴商业集团的田先生,对

日本的西装在赛特能卖出比日本多出两倍的价钱很感兴趣。同样的一把裁纸刀,赛特的售价8倍于日本商店。

“赛特”公关部经理鲍简介绍,赛特购物中心开业的第一天,她随便问了几位拎着购物袋出店的顾客,其购买的金额几乎都在千元以上。“银梦”纯羊绒大衣,900多元的卖不动,1500元的却已脱销。8000多元的男鞋,若非尺码不合适,也被人买走了。一些文艺界“大腕”盛妆而至,他们挺胸昂首,左右顾盼,一个劲地只管选购,随行的保姆、司机则忙不迭地帮着提这抱那,满载而归。

由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亲自剪彩的王府井“斯特法内”时装分店曾被人预言:“这店半个月后就得关门,推去买呀!”结果开业一年多,天时地利人和,销售额逐月递增,800—900元的纯毛“休闲服”尤其抢手,回头客还挺多。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开机后,该店轻轻松松地出

了一大笔赞助。笔者去采访时,营业员正叫苦:“我们这儿好东西都快卖完了,得赶紧进货才行!”

百货大楼四楼“名店走廊”,一位壮汉给自己选购了两块3.8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不久又折回来,说这表不过几万元,送人算了,请求经理能否专为他进一只12万元的“劳力士”,并表示即付现金,倒让见过世面的经理暗暗吃惊。同楼层的裘皮柜组,刚进的几件宝石蓝彩貂(单价1万多元)则告售罄,柜组的陈师傅笑眯眯地算着帐:“今年的有钱人更有钱啦!”

意大利“杰尼亚”西装,在国外是专为年收入逾10万美元的男士开办的,据说谁穿上它,等于拿到跻身富人阶层的通行证,连总统见了都会和他寒暄握手。即便在欧美,多数人也只能隔着“杰尼亚”的橱窗饱眼福。可设于王府饭店的“杰尼亚”分店,单价1万多元人民币的皮夹克、礼服,旺季最高一天能卖出18万元,业务代表陆婕小姐介绍,

这儿的回头客占了40%强,有的买了全套“杰尼亚”,付钱时特痛快,“面不改色心还跳”。一位北京的建筑商先后为自己和穿人选购了20套。有的还嫌分店花色品种少了,边买边抱怨:“这年头有钱没地方花,这叫什么事儿!”弄得在一旁呆看的洋鬼子们差点蹦出眼珠子。

高档、名牌、“哗哗”流入帐台的巨款……这些消费“景观”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直接地刺激着人们,并且势不可当。在东四“皮尔·卡丹”店,一位中年男子闲聊中提及燕莎商城:“燕莎算什么!您瞧瞧我这身。”确实,从服装、领带、鞋、皮包、笔乃至香烟,他用的全是英国“登喜路”牌,而一件登喜路上装就达19万元!无怪乎他连一般人不敢轻易问津的“燕莎”都看不上。笔者日前搭乘一位个体司机的货车,他从头到脚的“包装”折合10万元人民币,他说他是“车轮一转,黄金千两”。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一家高档商店拍下这样一幅画面:一只精心修饰的玉手轻按在一个做工考究的法国尼娜香水瓶上,旁边一纸价格标签是“2888元”。可以想象得出,在这瓶香水前,多少人会瞳孔放大,亮出舌苔。2888元,意味着大学毕业刚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女孩子一年的全部工资。望一望也是邀来一梦罢了,然而偏就有人轻轻松松地买走了它。

高消费不仅仅体现在服饰、礼品、日常补品方面,形形色色的阔佬们还在“吃”这一项上圆着“贵族”梦。在他们看来,所谓精美、营养、保健只是最起码的要求,吃新吃奇才是更大的享受。燕窝羹、乌鸡精、西洋参那是家常便饭,天空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越奇越要吃,越禁越要尝,什么穿山甲、猫头鹰、豹狸、

鱼翅、猴鞭、飞天虎、娃娃鱼……但凡吃得着,则不吝重金。据悉,广州首届美食节曾爆出一大新闻:清朝时创造的由134道热菜和48道冷菜组成的满汉全席居然被发掘再现出来,一时间,有钱人争相品尝这套人世绝味。青岛有名的“杀人街”,吃一碗海味面得花好几百元,女招待笑意盈盈,端碗送筷,问长问短;而客人也乐得红袖添香,大快朵颐。有些本地人几乎每天要去“杀人街”消费这样的一碗面。

轿车私宅亦是高消费中的高潮。据保守的统计数字,全国约有十几万人拥有私人汽车,西方学者预测的中国“大众汽车时代”似乎提前到来,持币待购者排起大队。京广等地的私人轿车堪称名牌荟萃:奔驰600、宝马、雪弗兰、本田、伏尔加、凯迪拉克……在一次汽车牌号拍卖中,上海做房地产生意的苏某“金”压群芳,以5.5万美元买下数字吉祥的Z0518(中文谐音“这令我要求”)。而报载广东、浙江人修盖一所造价60—80万元的别墅已在当地视为等闲,“先富起来”的京片子也纷纷赴沿海地区物色地皮,兴建自家的“行宫”,并布置得华丽无比,雕檐画壁,前院后院,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俨然高级宾馆。温州人更绝,于青山绿水之间大造数十万元一座的“椅子坟”,且此风愈演愈烈。

娱乐性、服务性的高消费也风头正健。北京东郊的“东方康乐园”,24小时提供全套服务。客人可在此享受“高丽人参汤”的沐浴,红外线、超声波加湿的滋润,专业的按摩及保龄球、麻将、游戏机、卡拉OK等等游乐设施,并配有美味佳酿和安静舒适的睡房。不吃不喝不玩,光门票就等于一名国营职工半个月的工资。而康乐园的常客们,则长期在这几怡注养身、挥金如土。30岁的林

女士每周固定来一次,用桑拿浴保持身材健美,用红外线增强皮肤弹性,她说比起购物,康乐园的高消费更是道不出的感觉,挡不住的诱惑。有一次,笔者和同事被一位商贾邀到兆龙饭店吃台菜,酒足饭饱后,主人余兴未消,又驱车将众客送至亮马河大厦,15000元包下了一个卡拉OK小单间,通宵歌饮。一些跑马场、射击场、高尔夫球场,晃动着大亨们的身影,他们声称:“玩的就是心跳!”

武汉的“汉正街”素以“花钱如流水”著称,那儿的个体户“钞票淹到脖子”。他们把10元钱叫“一分”,100元叫“一颗”,1000元叫“一撇”,10000元叫“一方”,并编了个顺口溜:“一万元贫困户,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才算富。”一天的生意做下来,他们便去酒吧舞厅放松,据服务员说,这帮人“一晚上玩两方钱不当个事,只求尽兴”,出手之阔绰,娱乐之奢华,匪夷所思。

更“邪”的是1993年春节前夕北京的一桩真人真事:

这天,一位男青年来到五星级的昆仑饭店前厅服务台,接待小姐洪媛热情招呼:“您好!我们的标准间每天66美元,加收15%服务费。”

“还有好的吗?”青年人不动声色地问。

“豪华间86美元,加收15%服务费。”

“还有更好的吗?”

“总统套房1000美元,加收……”

“行,就是它了!”青年一脸的豪气。

在洪小姐掩饰不住的惊讶中,青年从容不迫地交订金、办手续。

整座饭店轰动了。

在几十盏水晶灯的照耀下,七

七律

读《陈独秀

子孙们的命运》

一文有感

○苏渊雷

钩沉近史杂酸辛，
持较龙门笔有灵。
自笑天真同座客，
闻书吊泪感难禁。
纸上苍生笔下兵，
几人慷慨赋都京。
君看咫尺神州外，
海水群飞有不平。

（苏渊雷：八十七岁，著述宏丰
当代著名文史教授。）

间由名贵家具和古董珍品点缀的总统套房一派金碧辉煌，呈现出典型的明代风格，房内摆满娇艳欲滴的奇草异卉，迎宾小姐和领班彬彬有礼地引客人进房。当这位青年与他的朋友共进晚餐时，服务员铺好龙床，放上晚安巧克力及鲜花，并打开了冲浪式按摩浴池。

翌日，青年点了价值1000元外汇的早餐，尔后满意地退房而去。

自此，昆仑饭店总统套房登记簿上，在一串国外的要人官员、名流望族之后，增加了一个新的姓名：“北京崇文区李国治先生”。

高消费的旁观者们不禁迷惑：哪些人在高消费？那“贵族”是不是个个都真够款爷的份儿？

高档消费的群体中，高鼻蓝眼的老外只占一小部分，多是中国人。“杰尼亚”分店中国顾客的人均购买水平比港澳、日本、欧美顾客高出近30%。

手持大哥大，怀揣信用卡，一身进口服装，另有时髦靓女相傍，这是高消费中较普遍的一类形象，俗称“大款”（类似于英文的FATCAT），有的外报评为“超级富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目前中国大陆自有资金逾100万元的私营企业，至少达5000户，逾1000万元的

达300户以上，而几个沿海地区省份个人存款超过亿元的已达几十户，海南省最大的个体企业“吴氏集团”，资产评估近达60亿！有钱人的的确确多了。他们囊中饱满，财大气粗，从不问价杀价，态度也傲慢挑剔。久而久之，营业员都练就了“火眼金睛”，不用搭讪便知来人“谱儿”的大小。

一位西方记者在访华见闻中撰写道：“上海南京路上可以看到一些‘大款’出入于高档店，购买意大利时装和法国化妆品，一支口红价值50美元，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他们不时用‘大哥大’打一个电话，用欧洲产的自来水笔做一些记录。”其货币支付方式已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金”卡“银”卡不离身，再无须像古代富贾那样“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了。

这些人有的在搞各种生意，譬如办公司、开厂子、炒股、当穴头、搞边贸甚至以“练摊”起家，少数则是去日本、澳洲扒分回国享乐的。有的发财后，干脆成了闲人，把生意交付别人打点，自己整天吃喝玩乐，其中不少人素质不高。在国贸大厦“马克西姆”精品店，笔者目睹营业员上前劝阻一名叼着烟的“爷”：“先生，请不要在此抽烟。”他竟瞪眼大嚷：“大

爷想抽就抽！”直至领班赶来，他才扔下烟蒂扬长而去。一对教师夫妇感慨万千：“搁在二十年前，这拨人有好多会是批斗对象，如今却是大伙向往崇拜的目标。”

一些连ABC都不认识的姑娘买起香水来点名要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他们不在乎哪种香型适于黄皮肤，钱花到了数就成，就满足，生活就阳光明媚。较低的文化层次使这类款爷款姐在高消费时往往让人啼笑皆非，有位个体阔少去新侨服装大世界购物，不足1.60米的身高，却买了一套肥大的“皮尔·卡丹”和一双美国棕色大头鞋，他神气活现地对镜欣赏，营业员和其它顾客忍不住窃笑。东四高档服装街老板们说：“上这儿的大款，东西越贵越爱买，钱多烧的！你做好人给他压点价，嘿，他倒跟你急了！咱索性黑了心宰他。”一位个体鞋商坦言，他第一信钱，第二信花钱。他常去西单“半月城”歌厅消遣，点歌听歌，别人点唱后给小姐鼓鼓掌，充其量花几元十几元送一枝花，他献的花却让小姐抱不过来，且每次都要附赠一件货真价实的首饰，由此被视为该歌厅的上宾。大款们还出高价送子女进一流的学校，接受一流的教育。（责任编辑：林文）

明天,信用卡能代替人民币吗?

○夏日

1875年,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生财有道的小酒店老板为免去每日结帐的烦恼,为酒客们特设了“定点卡”——定期结算,老板客人都方便。没想到这一招,竟使买卖红火起来,于是,“定点卡”流传到了1915年,被美国银行“移花接木”将此方式推上了大雅之堂。

时下,信用卡开始进入中国消费领域了。中国的银行界一直在努力进入这个无现金的社会。

信用卡是像名片大小的精致卡片,上有持卡人签字、专门号码和发卡银行的名称。当您持有信用卡,只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就不用再为鼓鼓囊囊的钱袋担忧,不用为清点一张张钞票犯愁。一卡在手,就能潇洒走一回。

可是,我国现有信用卡特约商户不到2.5万家,也就是说,持一张卡只有在这2.5万个地方用。

北京一位靠死工资吃饭的张先生,抠抠巴巴攒足千余元,一番周折,终于拿到了一张某家专业银行发给的信用卡。可是,这一先进支付方式,并没给张先生带来方便。

一日,张先生去某家贴着使用信用卡标记的商场买条西裤,收卡、查单、压卡、验证、签单,一套程序下来,足足耗了半小时,换来的则是营业员小姐“买这么点东西,直接交钱不就得了”的白眼;月底,因急需现款,张先生想起这张卡的取款功

能,好不容易找到一台ATM自动提款机,谁知机里的一张张“大团结”千呼万唤不出来。原来这台提款机是另一家银行的。

一卡在手,连京城都不能走遍,神州就更不敢想了。

用卡的地方不多,顾客持卡消费就少。一些大型商场月均受理信用卡购物量不足三四笔。目前,中国银行有“长城卡”,工商银行有“牡丹卡”,建设银行有“万事达卡”和“维萨卡”,农业银行有“金穗卡”,交通银行有“太平洋卡”。由于各专业银行之间对于非本行的信用卡都采取互不受理的态度,这也为信用卡的推广普及增添了障碍。

1992年底,全国发行人民币信用卡是185万张。在首都北京,堂堂1000多万人的大都市却不足8万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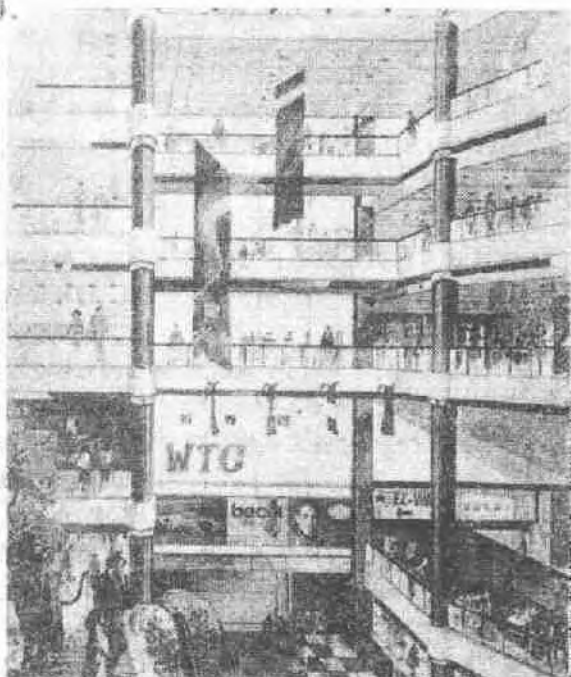
1991年,全国发行量占60%的牡丹卡,年消费交易额为2.7亿元,月均每张消费不足50元。

北京的情况更不尽人意,以万事达卡为例,1992年的交易额是363万元,月均每张消费20多元。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则不同,信用卡不仅为社会名流、高收入、高消费层所厚爱,就是低收入的低消费阶层也开始接受这一陌生而新奇的事物——有长远眼光的经理们,应该意识到,未来有一天,“谁拥有信用卡,谁就增加销售额”。

据悉,在广州市宾馆饭店100%已使用信用卡,国有餐饮部门和百货商店80%以上是特约商户。仅1992年广州牡丹卡发出近4万张;1993年头4个月,长城卡发出了7000多张;1993年1至5月,长城卡交易额已达4亿元。

(责任编辑:宏文)



硬骨头廉政名臣 范仲淹

徐庆全

1022年(宋真宗乾兴元年)十一月,宰相张知白,接到来自泰州西溪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是一个“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的人,但这种志向却不大为人了解。一般人只知道我有能诗会文的“雕虫小技”,却不知道我懂得农业、了解狱讼,对吏治、经济有极深的研究。所以,我写信给您,希望能在您的领导下做事,以优异的成绩有益于当世。写这封信的人就是范仲淹,这年他34岁,出任地方官已7年了。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知白,他也没有精力来调查这个毛遂自荐者的真才实学是否如信中所言,因为真宗皇帝刚故去9个月。仁宗皇帝登基还是个仅13岁的孩子,朝政换代后局面还需要他全力撑持,所以,这封信便被他顺手弃置一旁了。

心地诚朴的范仲淹,实属迂腐得可爱的一类人。熟知本朝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举动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自960年宋太祖赵匡胤踢开那仅有7岁的侄皇帝,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便把军政权力集于一身。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本朝,中央集权制已登峰造极。赵氏兄弟唯恐他

的官僚有自强之机,便倡导隐逸,鼓励官僚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后又推行子孙受惠的恩荫制度。范仲淹出身低微,在没有做出巩固皇权的政绩前,仅靠一封自荐信,是难以入朝施展其抱负的。

从另一方面讲,自五代起,随着封建割据政权的分崩离析,士人参与时代变动的趋向已不再萦绕心怀,而只满足于一种“花满渚,酒满瓿,万顷波中得自由”的逃遁退避消极心理。这种风气弥漫到了本朝,真宗、仁宗时期的钱惟演、丁谓、王钦若、晏殊等重臣,大都已是典型的知足安乐、无所事事的官僚了。在这样的氛围下,范仲淹想急欲奋起的努力,像是碰在一块巨大的软泥墙上,不会产生任何反响。

范仲淹自发出自荐信后,他先后当过掌管狱讼的司理参军、掌管盐税的盐仓监官等职。每到一地,他都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在泰州,他与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修筑了150里长的捍海堤,使2600多户因水灾而外逃的居民返回家园;在苏州,他主持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的工程,对保障当地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政绩,在当时暮沉的官僚集团



中是不多见的,因此,朝中的大臣们也知道了范仲淹这个卓越的地方官吏。

在这期间,范仲淹仍然没有放弃入朝为官、施展抱负的努力。三年后,他又给仁宗皇帝写下了洋洋万言的《上时政书》,详细阐述革除天下弊端的建议。只求天下平安无事的仁宗并没有理会,十多年后,当内外交困的政局迫使这位皇帝不得不改革时政时,他才急切地把范仲淹召到宫中征询良策,却忘了范仲淹那份《上时政书》。

又过三年,范仲淹又向当时在朝中执政的王曾、晏殊等人写下了一份《上执政书》。这是一份非常直率的万言书。书中分析了当时的腐败情况,并提出了一个六项18字的改革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对于每一项,他都作了详细的说明。例如固邦本,就是要选择一县之长,一州之长,州县长官得人,才可能为民兴利除害,才可使国家如磐之安。他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州县官的现状,说县令、郡守都是些“循例”而得官的人,衰老者为子孙之计,一心只想要钱;少壮者看不起州县的卑微地位,一心只想往上爬,只想要名。朝中虽然制定了惩治贪污的法规,但被办

罪的人却不多。他建议,把那些老耄的、无能的、贪污的、暴虐的、“轻而无法”的、“堕而无政”的人的官统统罢掉,叫那帮只知吃饭不做事的人,只知贪赃枉法的悚然震动。然后,责成臣僚逐级推举州县官吏。举出来的人有政绩,推举者受赏。

但是,王曾、晏殊等人对这份建议的实际内容毫无兴趣,但对这篇文章的优美文字却击节赞赏。1028年(天圣元年),晏殊从应天府内调,朝廷阙一馆职,晏殊推荐了一个人,王曾对他说:“你不是很看重范仲淹的文才吗?为什么不推荐他呢!我已经把你荐的那一位压下来了,你就推荐范仲淹吧。”

这年的十二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秘阁校理,到了京城,开始了几起几落的宦海生涯。

范仲淹是以文辞优美而踏入朝中的,而所担任的秘阁校理,也只是负责图书的管理、编写、校勘等事,却不能参政议政。虽然如此,毕竟是在京城了。他仍然一如既往,并没有埋没在书山墨海之中,而是时时牵挂着国家大事,往往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建言议政,抨击时弊。

在范仲淹入朝这一年,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已经6年了。太后根本不把仁宗放在眼里。冬至受朝时,仁宗还得率百官于会庆殿为皇太后上寿。这事在仁宗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满朝文武百官却认为这样做有损国体,但却敢怒不敢言。这一回,范仲淹便站出来说话了。他上书皇太后,认为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皇帝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上寿,就要“亏君体,损主威”。

皇太后的淫威早已威震朝野,却没想到一个迂直的人敢来对她指

手画脚。她怒冲冲地将这份上疏甩给宰执们,拂袖回宫去了。

晏殊这时为资政殿学士,认为范仲淹闯祸了。他忙把范仲淹叫到家里,斥责道:“你这般狂妄好出风头,自己倒霉不说,连我这个举荐人也牵连了!”

范仲淹说:“我常常担心自己不称职而使您为我羞愧,万没有想到会因直谏而得罪了您。”

几天后,范仲淹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谈了自己冒死直谏的理由。信中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也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十万铜钱,相当于二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踏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朝中百官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有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不会犯错误,百姓才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

北宋开封繁荣景象(清明上河图局部)



孤掌难鸣的范仲淹只能是遭贬黜的结局。不久,他便离开了京城,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上任去了。

但是,贬官丝毫没有影响他那忧国忧民的一片至诚之情。在河中府任上,他得知政府为修建太一宫及洪福院,从陕西大量调运木材,认为如此大兴土木,上不合天意,下不顺民心,应该罢修寺观。于是,他又上书谏阻。身处逆境而又毫不顾惜自己,连仁宗皇帝也承认他的忠直了。

章献太后死后,仁宗皇帝将范仲淹召回朝任左右谏。有了言官的身份,范仲淹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1033年(明道二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发生严重的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请求仁宗立即遣使前往救灾,仁宗却不以为然,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决定向面谏。他一见仁宗便问道:“陛下,宫中几千人,如果半天不给他们吃喝,他们将如何?”

仁宗不解其意,茫然地答道:

“人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呢？”

范仲淹于是接口说：“既然如此，眼下有好几路地面遭受严重灾害，百姓口中无粮，饿死了很多人，陛下怎能置之不理呢？”

仁宗这才被说动，只好派他去江淮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免去赋税。为了劝诫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妃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范仲淹这样大胆地谏净皇帝，举朝震动，惹恼了当朝宰相吕夷简。

中国历代做官最紧要的并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对付人。一个官吏能够应酬周到，他的官运即可亨通。在仁宗朝作宰相时间最长的吕夷简，即属于此类人。

吕夷简虽非庸庸之辈，但其为人处事的圆滑程度把那点才气全磨光了。出任宰相位之后，他看准了仁宗只想消极无为的心态，将朝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仁宗觉得这位宰相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史家对他的评价是“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在这一“屈”一“伸”之间，他网络了一批溜须拍马之辈，同时也贬黜了诸多狂介正直之士。秉笔直书敢于犯颜的范仲淹，当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吕夷简与范仲淹的敌对，起源于宫中的美人们争风吃醋。仁宗皇帝迷恋于杨、尚二美女，郭皇后常常和她们争吵。尚氏当着皇帝的面，讥讽郭皇后。郭皇后气愤难忍，一巴掌扇过，没有打着撒娇的美人，却落在皇帝的脖子上。一怒之下，皇帝便要废黜皇后。

为此，吕夷简拿出了圆滑奉承的看家本领，他搬经弄史，告诉仁宗皇帝，前朝已有废皇后的先例，比如东汉光武帝就废过。有史可鉴，仁宗

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了。

很快，皇帝的诏书下来了，诏书中说，皇后无子，愿意入道，特封为净妃。为了防止范仲淹等的耿直之臣上谏，诏令特意点明：有关部门不要接受台谏的章疏。

虽然诏令声明在先，范仲淹与孔道辅等十多名大臣还是要进谏，他们齐集于皇帝视朝的垂拱殿，抗议吕夷简的谄媚。

皇帝虽已命人把殿门锁起，但面对众多朝臣的群起也不敢小视，他派吕夷简出来解释废黜皇后的原因。范仲淹等人吕夷简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争论。圆滑的吕夷简又玩起了屈伸的操术。他请朝臣们明天早上向皇帝直接陈述己见。

第二天一早，范仲淹等人准备上朝与宰相廷争，刚走到百官早朝休息的待漏院，皇帝的诏令传来了：“范仲淹罢黜为睦州知府，孔道辅出为泰州知府。”

1034年正月，范仲淹前往睦州上任，心情十分忧郁，在《谪守睦州作》一诗中，他写道：

重父必重母，正邪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皇帝主意难回，他一家十口，只好走向天涯了。他仍鼓励妻子不要埋怨，要正视人生道路上的风波。

在睦州任上还不到半年，一纸诏令，范仲淹又来到了苏州知府的任上。

苏州是范仲淹的乡梓之地。他除了根治太湖水患之外，闲暇时间就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可是，不论站在太湖之滨看浪涛拍岸，还是在书房里用诗文描述烟雨江南的盛景，他都没有忘情于国事，在《伍相祠》一诗中，说伍子胥“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正直之气像波涛一般汹涌，忠心耿耿像江月一样清明可鉴。

1035年，由于范仲淹在苏州治水有功，仁宗又把他召回京城，升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职务。吕夷简仍居相位，范吕之争的戏又接着两年前的尾声开演了。争斗的起因还是皇后废黜一事。

皇后废黜后，移居外宅瑤华宫。仁宗却难以割舍夫妻情怀，常常派人去看望，并捎去自己做的诗词以慰藉。皇后见诗后，心情凄凉，应答哀惋。当初力主废皇后的内侍阁文应，对此颇为担心，怕皇帝与皇后修好，对自己不利。此时，恰逢皇后小病，他领太医前去诊视。没几天，皇后便死去了。

皇后的暴死，在京城引起一片震惊。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弹劾文应，认为皇后之死是由于他的谋害。刚返回京城的范仲淹，对此事件也做出了极快的反应。在他看来，皇后暴死，文应罪责难逃，决心向皇帝揭发其罪恶。为此，他安排好家事，对长子纯祐说：“吾不耻，必死之！”

宰相吕夷简和阁文应一向亲密，他对范仲淹死谏的做法极为反感，派人暗暗警告说：“你现在的职务是侍从官，不是言官，用不着你多费口舌去议论国政。”

范仲淹理直气壮地答道：“议论国事正是侍臣的职责，我怎敢不尽力呢！”

由于范仲淹的死谏，阁文应被贬逐岭南。文应贬后没几天，范仲淹便接到了权知开封府的一纸命令。当时京城开封府是最复杂难治的地方，吕夷简此举，即想用纷繁的杂事缠住他，使他无暇上书言事，并打算趁他稍稍有差错立时罢免。吕夷简低估了范仲淹的能力。范仲淹一到任上，就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上任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城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的字）。”吕夷简煞费苦心，反而大大提高了范仲淹的声望。

范仲淹见一批无节行的幸进官吏，常到吕夷简家串门子，便决定直接向吕夷简发难。他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张《百官图》，呈给仁宗，指明哪些人是按照规定升迁的，哪些人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对吕夷简任人唯亲，培植私党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吕夷简发现自己的老底给揭穿了，再也保持不住往昔的圆滑大度，愤恨地对仁宗说：“范仲淹不是谏官，不该越职言事，他中伤我正是耍挑拨我与陛下的关系，以便他结交朋党，蒙蔽陛下。”仁宗一气之下，把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府。

范仲淹这次遭贬，在朝廷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正直的官吏早就对吕夷简堵塞言路、排斥异己的做法不满，一听说范仲淹又遭贬，都非常愤慨。正直之士余靖、尹洙上疏反击，谏官高若讷最有发言权却冷眼旁观，惹得只有校读书籍权的欧阳修致函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一时间，朝中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派。

吕夷简看到这些下级官吏也敢公开责骂自己，更加火冒三丈，他唆使仁宗把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一起贬出朝廷。此后，又在朝堂上贴出榜文，禁止百官越职言事，公开压制舆论。

范仲淹屡次遭贬，声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遭贬时，亲友们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二次外贬时，同僚们又来饯行，鼓励说：“此行愈光（更加光荣）。”第三次被贬时，王质等人不顾吕夷简的恫吓，携带酒菜去送别，并安慰说：“此行尤光（非常光荣）。”范仲淹罢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经三

光了。”

景祐三年深秋，范仲淹乘船去饶州上任。瑟瑟秋风卷起片片黄叶，飘落在船舷上。入仕以来，他已经三起三落，来到饶州，虽然已48岁了，但他仍然壮心不已。在寄给谢绛的诗中，他盼望的仍然是皇帝要让谏臣讲话——“回头谏争路，尚愿无壅遏”；在给皇帝的谢表中，仍然表示了满腔热忱的报国之情。

1038年（宝元元年），西北边境燃起了战火。西夏国主李元昊率兵大举进犯，宋军不堪一击，战败的消息接连传至朝中。范仲淹在这危急的时刻，又打点行装来到了军事前线。他与韩琦等人经过三年的努力，巩固了西北边防，使整个局势转危为安。

1043年（庆历三年）四月，
3 范仲淹匆匆告别前线，奉调回京了。对于这次调动，宋仁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外患暂时缓和了，但内忧却丝毫没有减轻。仁宗终于萌发了改革萎靡不堪的社会的念头。这时候，吕夷简已衰老不堪，仁宗又想起了屡倡改革、有胆有识的范仲淹。

范仲淹一回到朝中，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同时，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王素、蔡襄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有志之士也都得到重用。范仲淹久存的改革吏政的夙愿有了付诸实施的机会。

此时的仁宗，迫切地急于扭转危机，三番五次地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请尽快提出来！”并且命人打开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范仲淹立即写出改革方案。天章阁是真宗皇帝在世时建的，收藏真宗文集和手迹。在此阁中延见大臣，这还是首例。范仲淹深深感到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

期待，他伏案疾书，从政28年来的酝酿已久的改革想法一齐涌至笔端，很快就写成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

这十项改革措施，概括起来就是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其根本出发点是限制特权、改善吏治、提高行政效率。仁宗看到这一方案后，欣然同意，很快以诏书的形式发往全国。于是，又一次挽救大宋江山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序幕。

在法令实行过程中，范仲淹亲自掌握，务求实效，不走过场。这年年底，他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吏，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吧！”为了赵宋王朝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不能顾及少数官吏的喜怒哀乐了。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之下，一大批只领俸钱不务公事、贪污腐化的官吏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小官吏被委以要职，官府の办事效率提高了。其它方面，诸如财政、漕运等也出现了转机。人们从濒临崩溃的危机中看到了希望。

可是，这一线希望之光，很快就被浓重乌云遮住了；在新政的热烈场面背后，一股潜伏的黑暗势力正集结力量向革新派扑来。

还是在范仲淹调回朝中倡议改革之时，就有人讥笑他“迂阔”、“务名”；当改革全面开展后，“恩荫法”的更定，使许多大官僚的特权受到

限制,按察法则使许多贪官污吏失去权势。共同的利益,使这些人群起而攻之。虽然他们治国安邦是无能之军,但在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时却有足够的勇气和机巧,并且手段也十分地高明。他们使用最下作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诽谤新政的参与者言行不合礼法,举止有伤大雅,最后集中攻击他们是一伙图谋不轨的“朋党”。

历史似乎在重演。多年以前的“范吕党争”,范仲淹被贬逐饶州,朋党就是一条罪状。反对派采取这一招是十分有效的。熟悉本朝的开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赵宋的江山靠朋党石守信、赵光义等人的支持发动兵变夺取的。因此,不能不为此深为惊恐。这样,本来没想有大作为的仁宗动摇退缩了。

反对派仿佛摸透了仁宗的心思,他们收买了改革派石介的女奴,让她摹仿石介的字体,将石介称赞范仲淹、富弼的言论略加“修饰”,让文中的伊尹、周公变成了伊尹、霍光(伊尹、霍光,分别是商代和西汉的名臣,前者把商王太甲放逐三年;后者废掉刘贺,迫立皇帝,均为佐主功臣),于是,更换皇帝的潜台词也就出笼了。一时间,朝廷上下,流言四

起,人心惶惶。

面对这场政治陷害,范仲淹沉默了。这时,西北边防又传来警报,范仲淹借机“乞罢政事”,要求再赴前线。于是,1044年(庆历四年),范仲淹以河东巡抚使的名义前往西北巡边;同时,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也离开了朝廷。

范、富二人离开后,欧阳修与反对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毫不畏惧,上疏仁宗,一针见血地指出范、富的出走,是受小人的排挤和陷害,要求重新起用。反对派对他恨之入骨,竟把市井妇女的诬语移到朝中,诬蔑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私通,这使他有口难辩。第二年的八月,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的醉翁亭山间去昏酌了。

反对派重新掌握了大权,仁宗天天两耳听的全是关于范仲淹及其新政的攻击语言,一年前还有点励精图治的锐气也消泯了。到庆历五年初,他便下令废除新法,免去了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庆历新政推行了一年零四个月便告失败了。

在邓州,范仲淹心中的愤懑是

难以平复的。他在给皇帝的谢表中说:“改参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齿;尚循默之体,则爱国者寒心。退孤上恩,进敛群怨。诚难处于要路,复请行边鄙。”

如今我们读到这位老臣无奈的话语,心中不能不感到颤栗。的确,在皇帝面前,他把心都掏出来了。可“爱国”与“谋身”,却像冰炭那样不能相容,怎能不让他有进亦难退亦难的感叹呢,所以他只好“请行边鄙”了。

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他撰写名篇《岳阳楼记》,将自己一生的思想抱负概括为千古不朽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一个封建士大夫难得的高尚情操和一个政治家可贵宽阔的胸怀。改革失败退出朝廷的范仲淹,并没有颓废,而是尽其所能为地方做事,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国家的事业上,直至1052年(皇祐四年)病逝为止。

洛阳的万安山下,埋葬了范仲淹,也埋葬了他富国强兵的改革之梦。这个难圆的梦,被后来的王安石圆着,张居正圆着……

(责任编辑:刘家驹)

欢迎订阅

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以关注热点,荟萃精品为宗旨,依靠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展示文艺界最新创作成就,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新闻性、文学性、趣味性为一炉的九十年代文化快餐。

《作家文摘》每逢周五出版,四开八版,辟有纪实之窗、传记文学、长篇连载、小说天地、艺苑春秋、风云人物、社会热点、生活随笔、文坛公案、文化市场、中篇拔萃、域外文坛、文海星辰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栏目,视野开阔,选编精当,真实生动,品位高雅。

《作家文摘》自一九九三年元旦创刊以来,已跃为首都零售量最大的周报,期望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怀与厚爱!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22

邮发代号: 1-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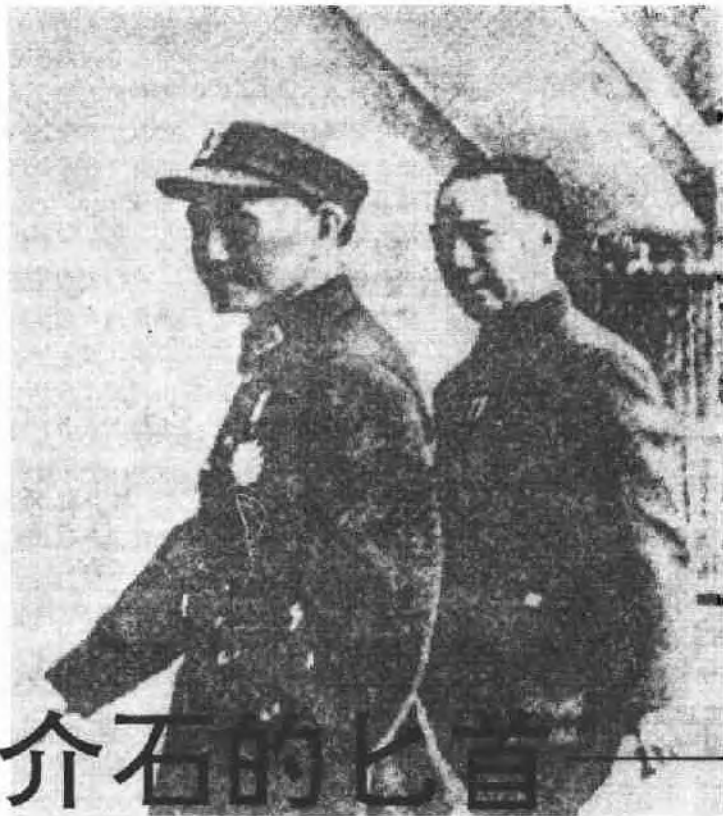
月价: 一元三角

季刊: 三元九角

半年价: 七元八角

全年价: 十五元六角

○ 荣华
江安



蒋介石的

戴笠

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少将,于3月17日乘G47型222号专机自青岛返回重庆途中,不幸在南京江宁县戴山上空,因飞机失事而以身殉职……”魔鬼,终于在空中爆炸!人们不会忘记他罪恶的一生……

戴春风的机遇

戴笠,1897年生于浙江江山,原名戴春风,果不其然,到了1926年他而立之年,便春风得意起来。

童年的戴笠,聪颖过人,7岁启蒙,10岁时便读完《四书》。14岁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连续两年担任级长。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后,又到杭州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

谁知好景不长,在杭州读了4年中学,却因擅入旧货店“强借衣服”的错误,被省立一中开除学籍。

随即就在江浙两省浪迹江湖。1921年,他在上海结识了流氓头子杜月笙。戴笠在上海混迹一年,又重返家乡,因见军阀连年混战,兵祸不绝,便组织了自卫团,自任团总。

1926年的5月,戴笠时来运转,在江山县城内碰到了他小学同学毛人凤,毛鼓吹“革命圣地在广州”、“革命朝气在黄埔”,戴笠听了他的宣传,萌发了第三次离家出走的念头。9月,戴笠到达广州,顺利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并将戴春风正式改名为戴笠,字雨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为了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

动,以“复兴民族”为名,以国民党内部的军方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体,成立了一种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1932年1月26日晚8时,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召见戴笠,决意对戴委以重任。

中山陵召见以后不久,蒋介石就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复兴社”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4月1日,戴笠受命在南京徐府巷正式成立特务处本部,又在南京鸡鹅巷53号设立戴笠的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并在全国各大城市与要冲区域都建立了情



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宋美龄

报组。

戴笠走马上任，一直都把协助蒋介石剪除异己、捕杀共党引为己任。其中最瞩目的案例有：北平杀张敬尧，上海除杨杏佛，天津捕吉鸿昌，梧州砍王亚樵，南京害邓演达，开封捉韩复榘，河内刺汪精卫……

使戴笠能够获得蒋介石进一步赏识，是他在“西安事变”中追随宋美龄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的一番经历。戴笠常把西安之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孙中山相比拟。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古城西安突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十七路军，在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举行兵谏，敦促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尚未在报纸上披露以前，远在南京的戴笠就已经收到了军统西安站站长江雄凤的密电。他忧心忡忡，如丧考妣，赶忙召集郑介民、余乐醒、文强等几个大特务密室相商。

戴笠哭丧着脸说：

“领袖在西安生死难卜。我去见了何部长（指何应钦军政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我又去见了宋院长（指宋子文行政院长）和夫人（指宋

美龄），却认为打不得，要政治解决。如此相持不下，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进西安去救领袖。请诸位想想办法。”戴笠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

几个特务头子都面面相觑，无以为对。戴笠又说：“既然诸位拿不出什么高

招，我只好跳龙潭、入虎穴亲自走一趟了。”

12月22日，南京政府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人飞到西安和张、杨谈判。谁料张学良异常鄙视戴笠，当即下令把他关入地下室，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他惺惺地在地下室写下“遗书”一封：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三天以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也和蒋介石同样恢复了人身自由，用戴笠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冒死而去，呈祥而归”。后来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一书中，还以蒋介石的语气，表扬了戴笠，夸奖他“忠勇可嘉”，这就是戴笠“呈祥”的含义由来。

计捉韩复榘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蒋介石为了举起抗日大旗，他决定首先除掉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韩复榘，河北坝县人。早年参加清末新军，辛亥革命参加滦州起义，以后在冯玉祥部逐步递升至师长。

此人反复无常，一会儿倒戈归冯，一会儿又叛冯投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当日军进攻时，他不战而逃，仅仅几天功夫，就使得大半个山东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戴笠为了落井下石，还拿出军统济南站站长密报，说韩复榘已和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谈妥，准备在山东建立日伪政权，并进一步扩大为华北五省自治，向日本天皇俯首称臣。戴笠将密报禀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情报问：“我让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去了没有？”

“委座，他没有出席会议。”戴笠回答。

“为什么不到会？”

“他说中央说话不算数，答应每个月给他60万元的军饷一直没有兑现。他信不过中央。”

“娘希匹！”蒋介石脱口骂了一句，“他对中央指责他丢失济南的电报有什么反映？”

“他大放厥词，说什么：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该不该蒋某人负责呢？”

“放肆！”蒋介石一拍桌子，怒不可遏。

戴笠吓得连退两步：“依学生愚见，委座西安蒙难，他通电拥护张、杨，最近又和刘湘勾结，藐视中央，现在对韩复榘该收拾收拾了。”

“他消极抗日，我可以理解；他要反抗中央，我就要制裁他！”

1938年1月8日上午，韩复榘在山东单县收到了军事委员会的急电，电文大意是：

韩总司令勋鉴：兹定于1月11日在开封召开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敬希准时出席为荷！又，奉委员长训谕，为严防途程不清，避免

日机骚扰,务请多带卫队,俾以防护……

因为一般军事将领赴会,都是轻车简从,不允许多带卫队,而这次赴会,蒋介石竟然特别关照他“途程不清,多带卫队”,诚为旷古未闻。

韩复榘犹豫不决,只好就商于参谋长。

“总座尽可放心赴会,听说这次戴笠奉命筹备会议,从武汉到郑州的一路上到处宣扬委员长如何看重总座为国之干城,足见总座实在拱高一着。”参谋长宽慰地说。

“是嘛!鼓吹华北五省自治,要和老蒋分庭抗礼,他又怎能奈我何?”韩复榘疑虑顿消。

那天,当韩复榘的专列经陇海线到达开封车站时,受到了与会将领的热烈欢迎。车站内外,彩旗招展,鼓乐喧天。

戴笠第一个走进车厢向韩复榘请安,他满脸堆笑地说:

“韩主席亲临开封赴会,委员长特命我恭迎大驾。请韩主席下车。”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韩复榘嘴上这么说,心中好不得意。

接着,戴笠又禀报说:“韩主席警卫团的驻地正在布置环境,请暂留车厢候命。”

这一着,韩复榘并未生疑。当下便带领 10 名贴身卫士,随同戴笠驱车前往会址——袁家花园礼堂。

戒备森严的袁家花园礼堂,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在“随员接待处”,韩复榘的 10 名贴身警卫被“接待”走了。

来到“将领签到处”,只见戴笠指着一张盖有“军事委员会”关防大印的“通知”说:“请韩主席过目。”

韩复榘举目一望,只见“通知”上写道:

奉军事委员会谕令,凡与会将领,均需将随身携带的武器交由会

议筹备处戴笠少将暂时保管,待会议结束后方准予领回。

身为军人,军令难违,韩复榘当即交出随身携带的两支德国造的左轮手枪,跟随戴笠进了会场。

整个会场气氛肃穆,李宗仁、白崇禧、刘峙等四五十位高级将领,一个个都正襟危坐,悄无声息。

铁青着脸的蒋介石身着军服、腰挎佩剑,端坐在主席的正位上,他一见韩复榘落座后便宣布开会:

“今天的会议,首先要解决个别高级将领丧师失地的问题。”

这番开会词使得举座愕然。

只见蒋介石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

“现在我代表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韩复榘因犯有丧师失地罪,着即免去本兼各职,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惩办!”

韩复榘这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欲待反抗,惜无寸铁,孤掌难鸣。他神情颓然地软瘫在自己的座位上。

当即由戴笠指挥 4 名持枪实弹的宪兵,把韩复榘架出会场。

是夜,戴笠又用专列将韩复榘押解到武汉候审,使他远离老巢,免生枝节。

1 月 19 日,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的高等军法会审在武汉开庭,审定了韩复榘“不遵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的罪行,判处死刑,褫夺公民权终身。

五天以后,这个号称“山东土皇帝”的韩复榘,便由戴笠指挥的军统特务秘密处决。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擢升戴笠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少将副局长。

刺杀汪精卫

193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8 时

许,重庆珊瑚坝机场上朔风凛冽,寒气逼人。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紧跟着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机场,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以及“义子”曾仲鸣等七个人下车后便欲登机起飞。

在机场执行检查任务的军统特务、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立即上前劝阻汪精卫等人登机:

“请汪主席珍重玉体,今天西北风很大,不宜起飞。”

“胡说!我是国民党副总裁,连去成都参加会议都不行吗?这是什么人的命令?”汪精卫勃然大怒。

姚悟千慑于汪精卫的威势,急忙退在一旁,让汪精卫等人上了专机。

姚悟千立即在机场挂电话向戴笠汇报请示,戴笠也不敢自作主张,赶忙和蒋介石接通了电话。

蒋介石朝办公桌上的记事牌看了一眼后便发出指令:

“汪主席出席成都军校的毕业典礼,确有其事。只要他不飞香港,在国内可以让他自由行动。”

这一着蒋介石可先——他没有料到汪精卫的专机中途竟改变航向,直飞昆明,旋又续飞河内;发表“艳电”,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急令戴笠派遣“杀手”追踪到河内,置汪精卫于死地。

戴笠于 1939 年 1 月飞抵香港,电召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天津站站站长陈恭澍来香港共同策划刺汪事宜。一周后,戴笠又化名何永年,带着贴身卫士王鲁翘,偕同陈恭澍乘班机抵达河内。

在国民党政府驻河内的总领事馆内,戴笠研究确定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方案。由陈恭澍担任河内行动组组长。

方案既定，戴笠即飞回重庆遥控指挥。他在特务队里精心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余鉴声、陈步云等人，先后从昆明、广西、香港等地潜入河内。

以陈恭澍为首的行动组，不仅查明了汪精卫在河内哥伦比亚路高朗街 27 号的布置情况，而且还弄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

1939 年 3 月 14 日凌晨 2 时，河内行动组织长陈恭澍收到了戴笠由重庆发来的绝密电报：“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3 月 20 日午夜 11 点 40 分，陈恭澍率领 6 名行动组成员，乘一辆福特汽车驶到了高朗街附近。陈恭澍留守汽车，并发布指令：

“开始行动！”

由唐英杰率余鉴声、陈邦国、王鲁翹来到汪宅庭院外，翻墙而入。其余一人防守后门，另一人则在街巷中巡逻望风，相机接应。

进入汪宅后的唐英杰等人，穿堂入室十分熟稔。楼内有一扇门紧紧关着，推撞不开。陈邦国用小斧头连砍数下，举腿一脚，蹬开了楼门。

不料楼门的响声惊动了汪精卫的卫士，一梭子“快慢机”的子弹，从唐英杰等人的身旁飞啸而过。

陈邦国和余鉴声连忙回身锁住卫队，唐英杰和王鲁翹乘机直奔三楼。

来到汪精卫卧室门前，王鲁翹急忙取出钥匙开门，由于精神过度紧张而手指发抖，却把钥匙拧断在锁孔内，无法开门。

唐英杰见状，急切掣斧在手，对着房门猛劈，三下两下就劈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窟窿。

凭借楼梯近处射来的灯光，王鲁翹透过窟窿一看，只见卧室内的法式铜床下面趴着一个男人，肥胖的屁股翘得很高。他断定此人必是

汪精卫无疑，于是操起手提机关枪，伸进窟窿，“嗒嗒嗒”就是一梭子。眼见得床下的那个男人，在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以后，就软瘫在一片血泊之中。

得手之后，唐、王二人便急速下楼，翻墙逃离现场。

此时此刻，被枪声惊动了的法国总督，派出了大批军警，乘警车来到了高朗街住宅区。

陈恭澍一手持枪，一手扳动方向盘，驾驶着福特汽车，冲出了军警的包围圈，躲进了中国领事馆。

就在陈恭澍等人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等待邀功请赏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被手提机关枪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亲信曾仲鸣！

原来，那天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到河内与丈夫团聚，汪精卫特地将自己的卧室让给曾仲鸣夫妇去住，他和陈璧君就改睡在曾仲鸣原住的房间内。行动组不知究里，阴差阳错地使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召回陈恭澍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他本人也被

蒋介石狠狠地训了一通。

这次河内刺杀汪精卫，用戴笠自己的话来说，真正是：“李代桃僵，劳而无功”。

捕杀共产党

1940 年初的重庆，春寒料峭，雾罩山城。在委员长黄山官邸的办公室内，蒋介石冲着戴笠正在大发雷霆。

起因是共产党员张蔚林、张露萍“打”入军统无线电总台里来了，它犹如一把钢刀刺进了国民党的心脏！

由于二张的积极活动，军统无线电总台报务员杨忱、冯传庆、安远、赵力等人都先后加入共产党，在军统情报中心组成了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

不幸，一个偶然的技术事故而引发的波折，使这个战斗集体陷入了戴笠的魔掌！

有一天，张蔚林在侦测台值班时，由于工作不慎，烧坏了一只真空管。他害怕处分，打算撤离军统，并及时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

汪精卫会见日军被俘中將



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听取了张蔚林的情况汇报后，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烧坏一只真空管仅仅是技术事故，与暴露张蔚林的政治面目毫不相干，无需撤离岗位。

张蔚林遵从地下党的指示，急忙赶回军统电讯处向副处长董益三主动请罪认错。

董益三对这个工作一贯勤勤恳恳的报务员说道：

“年轻人嘛，工作上有时粗心大意总是难免的，也不是什么大错，今后小心谨慎就是了。”

“谢谢处长的宽宥。”张蔚林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恰在此时，董益三办公桌上的电话，“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董益三抓起话筒听了一会儿，顿时脸色大变，搁下话筒，拔出手枪，厉声喝问：

“张蔚林，你老实说，侦测台烧坏以后，你跑到哪儿去了？”

“起初我害怕处长会处分我，想逃跑，后来在街上转了几圈，经过思想斗争，想想还是主动请罪认错的好，所以就回来了。”张蔚林沉着地答道。

“再问你，你家中为什么藏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

张蔚林先是暗地吃了一惊，但很快地便平静下来：“戴局长多次训导我们，要研究共产党人的心理，以攻心为上。我作为机要人员，看一点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哈哈，好一副伶牙俐齿！”董益三冷笑道，“我再问你，你家中为什么藏有军统电台分布的表册？”

张蔚林不动声色地说：

“我是机要人员，要能背诵几百部电台的呼叫和频率，没有资料怎么能行？”

一番应答如流，使得老奸巨猾

的董益三也不得不哑口无言。他收起了手枪说：“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以前，只好暂时委屈你几天了。”

说完，就命令几个军统特务把张蔚林先禁闭起来，等请示汇报了戴笠再作定夺。

这个专门收集共产党情报的军统特务头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人竟会反客为主，“打”入了军统局的要害！为了投饵钓鱼上钩，他故意把张蔚林看做是普通的刑事罪犯，送到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去关押起来。

张蔚林身陷囹圄，心念组织。他利用和看守所所长毛烈相识的关系，行贿 50 元，委托毛烈派人送一封信给住在重庆中二路四德里 14 号的“友人”。

毛烈贪图小利，又不知案情的复杂性，就满足了张蔚林的要求。

时隔一日，当戴笠从其它情报获悉重庆中二路四德里 14 号是共产党重庆地下组织的交通联络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时，才发现来迟一步，早已人去楼空！直气得戴笠暴跳如雷、捶胸顿足。通过追查，才知道是毛烈替张蔚林起了通风报信的作用。于是立即下令，以“通匪”罪判处毛烈死刑。

毛烈为张蔚林“通风报信”的事件，客观上证实了张蔚林确系共产党人的身份。戴笠根据军统特务多方面的密报，逮捕了张露萍、冯传庆、杨洮等六名共产党人。尽管由他亲自审讯，用尽了各种严刑逼供，也依然得不到重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蛛丝马迹。

1944 年冬，七位共产党人终于被戴笠下令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监狱的快活岭上！

建立中美合作所

1941 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四

个年头。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身着戎装、佩戴将官级梅花领徽和金星肩章的姜毅英，给戴笠送来一份机密文件。

这是她刚刚破译了一份日本军方的密电，日本特遣舰队近几天内将大举出动，目标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

“好！”戴笠向姜毅英翘起大拇指，“赶快向美国站站长肖勃发报，让他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美国海军司令部。”

现任军统局机要组少将组长的姜毅英，与戴笠是同僚，也是同乡。作为木匠的女儿，在杭州中学毕业后，便考入浙江警官学校，后被戴笠赏识，专攻无线电和译电训练。由于她聪慧好学，从日本空军战俘大石信三的口供中，获悉日本使用日文 50 字母的组成方法，通过精心研究，不久即成了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的权威，官阶也由上校科长破格擢升为陆军少将。

戴笠原指望姜毅英提供的情报，会获得美国主子的大加赞赏，谁料事与愿违，“山姆大叔”竟对这个情报嗤之以鼻：

“耸人听闻！中国人就会乱弹琴！”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天）清晨 7 点 50 分，日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悍然出动 350 架飞机、55 艘战舰，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 188 架飞机被击毁，150 架飞机被击坏，40 艘舰艇被击沉，2405 名美军丧生，整个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部被摧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珍珠港事件。

血的教训清醒了美国将军们的头脑。美国海军司令部立即指令情报署长迅速找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前来商谈合作事宜。

当戴笠在重庆获悉这一信息后，不禁欣喜若狂，就连蒋介石也都

笑歪了嘴，迭声赞好。

1942年夏天，美国老牌特务梅乐斯海军中校，率领上百名美国特务来到重庆，与戴笠进行商谈，决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地点选定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

经过近一年紧张的筹备工作，以戴笠为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的中美合作所，便于1943年4月这个人间魔窟正式开张。这里既是一个替国民党训练和派遣特务、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特务机关，又是一个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集中营。共产党员罗世文、江竹筠、李青林、蔡梦慰等烈士即被拘禁、相继杀害在此。关押人数最多时曾达700余人。

荣归故里

1943年，47岁的戴笠升任军统调查局的代理局长。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择定黄道吉日，回到阔别10载之久的江山。

恰巧，一桩骇人听闻的“柳莲芳日本间谍案”发生在江山县城。

所谓的“柳莲芳日本间谍案”的缘起是这样的：

军统局派驻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姚则崇，在江山县城设立了一个行动组，由少校组长魏哲秋负责侦查事宜。

一天夜晚，纨绔子弟出身的魏哲秋领着几个爪牙来到江郎旅馆查房。当他查到三号房间时，一位绝世的美人，使得魏哲秋的灵魂险些出了窍。

“请教小姐芳名？”魏哲秋假充斯文地问道。

“柳莲芳。”

“何以单身住宿？”

“我是学生，因为要到福建的南平去看望未婚夫，在火车上不小心丢失了钱包，今天上午刚向家中发了电报，等汇款一到就动身。”

姑娘烟眉笼黛，泪光点点地回答。

魏哲秋一听此言，大喜过望，急忙使了个眼色，爪牙们便知趣地全部退出房去。

色胆包天的魏哲秋，反手带上房门，饿狼似地扑向柳莲芳：

“哈哈！美人儿，让我先乐一乐。”

说时迟，那时快，“啪”地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到了魏哲秋的脸颊上。

“好，你个小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左手捂着面颊，右手掏出手枪逼向柳莲芳。

正在万分紧急之际，茶房严九如老师傅在门外“嘭嘭嘭”地敲响房门：“开门，开门，冲开水啦！”

就在魏哲秋稍一惊愕的时候，柳莲芳机智地打开了房门。

严师傅提着大铜水壶走进房间一看，十分了然，他故意慢吞吞地抹着桌子，灌着热水瓶。

恼羞成怒的魏哲秋，扬了扬手枪，恶狠狠地骂道：“老东西，我毙了你！”

柳莲芳正欲扑“离开是非之地，魏哲秋大喝一声：

“站住！我奉命搜查敌特、汉奸，快把你的箱子打开来！”

柳莲芳只好顺从地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魏哲秋一眼就看到了12只金光闪闪的赛璐珞的梅花别针，不由一阵冷笑：

“嘿嘿！好哇，梅花别针！这是日本梅花间谍机关的标记。来人啦！”他扯开嗓子大声呼叫。

霎时，几个守在旅馆大门外的

爪牙又拥了进来。一个弱女子就这样冤屈地落进了虎口！

当魏哲秋押着柳莲芳离开江郎旅馆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在大门口和他撞了个满怀。

魏哲秋走上去就是一脚：“畜生，瞎了狗眼啦！”

中年男子被踢得眼冒金星，顿时捂着肚子蹲了下来，手上的拎包也落在地上。

魏哲秋抬起拎包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二、三百块银元，白花花的，炫目耀眼。

“叫什么名字？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大洋？”魏哲秋喝问道。

“我叫侯寄远，是河南人。这些大洋是我在本县城收购来的，准备带回家乡贩卖谋利的。”

“哼！”魏哲秋冷笑一声，“好小子，想发国难财，没门儿。——全部充公！”他提着拎包便走。

侯寄远急得双手抱住魏哲秋的大腿乞求道：“长官，长官，求求你行行好吧，那可是我全家的身家性命呀！”

魏哲秋眼看着脱身不得，四周围观的百姓又众目睽睽，白日行劫毕竟缺理，眼珠子一转，立即沉下脸来：“你他妈的河南人，以收购大洋为名，从沦陷区混进我们江山县城来刺探军情。来人，把这个汉奸带到司令部去！”

顷刻之间，就凭魏哲秋一两句话，把两个平民百姓定成了“间谍”、“汉奸”！

军统局派驻第25集团军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姚则崇，对魏哲秋一味偏听偏信，立即坐堂审讯人犯。

“你们说我是日本间谍有什么证据？”柳莲芳气愤地反问姚则崇。

“这就是罪证！”姚则崇指着赛璐珞梅花别针说，“日本在中国的

四大间谍机关，分别以梅、兰、竹、菊为代号标记。你私藏梅花别针，不是日本间谍，又是什么！”

“笑话，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来推断，那么，凡是种植梅兰竹菊的中国人，不也都成了日本间谍了吗？”

姚则崇说不过柳莲芳，便拿侯寄远开刀。在“老虎凳”、“辣椒水”、“钢丝鞭”种种酷刑之下，侯寄远只好屈打成招，把在江山县城内凡是经由他收购银元的人家，统统指为“同党”。

姚则崇和魏哲秋二人则狼狈为奸，在江山县城内乱捕乱抓平民百姓，藉以敲榨勒索。几天功夫，就抓获“嫌疑犯”八九十人之多！

俗话说，路不平，有人铲。姚、魏二人的倒行逆施，恼怒了第25集团军司令部内几位比较正直的高级军官，参谋长郑再新、副官处处长罗永宜等人，纷纷利用各自的袍泽关系，向重庆国民政府越级上告，指责军统特务人员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

江山县城是戴笠的家乡，被上告的军统人员又是他的部下，于是，戴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钦差大臣”，衣锦还乡。

当戴笠的车队耀武扬威地开到江山县城郊区的时候，戴笠忽然感到口干舌燥，需要喝茶饮水。正巧公路边上有一位白发老人摆着茶摊，戴笠便喝令停车，走下车来。

白发老人对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身穿将校呢的高级军官仔细一望，劈口就问：“你就是戴春风吧？”

戴笠深感意外，在此荒郊野外，这位老者何以能认出他就是若干年前的戴春风？他尚未答言，随从副官立即大声喝道：

“老家伙，不要放肆！这位官长是戴笠将军！”

老人闻言，气愤地说：

“旁人要喝茶，我可以免费招待；戴春风要喝茶，恕不供应！”

随从副官正待发作，戴笠一个手势制止了他：“难道你老人家跟戴某有什么私人仇怨不成？”

“私人仇怨倒没有。”老人激动地说，“你这次回乡也可以走访走访，你们戴家在家乡究竟做了多少好事？！你的兄弟戴春榜鱼肉乡民，欺行霸市，你的儿子戴戴宜强占民女，无恶不作，你的部下姚则崇制造冤案，生杀予夺。家乡人被你们戴家害得天怒人怨，你还有脸来喝我的茶！”

这一番抢白直说得戴笠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眼望着这位银鬓白发、行将就木的老人，也奈何他不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戴笠急忙钻进汽车，一溜烟地驶往县城。

以江山县长丁琮、商会会长王寿昌为首的上层人士，既隆重地接待了戴笠，也客观地向他反映了“柳莲芳日本间谍案”的事实真相。几家被牵涉到冤案里去的戴笠的亲朋故旧，也哭诉上门，直弄得戴笠晕头转向，应接不暇。

高级军政人员的压力，故里士绅的直言，“众怒难犯”的古之明训，这些都不得不使戴笠意识到：江山毕竟是他的桑梓之地，他在家乡的名声不能搞得太臭。为了平息众怒，戴笠下令释放了八九十名无辜的人犯，并将制造冤案、作恶多端的姚则崇、魏哲秋等人逮捕法办，判处死刑。

戴笠的这次江山之行，的确捞取到了政治资本。一时间，“戴青天”的呼声，甚嚣尘上。

谁曾料到三年以后，当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在重庆举行追悼会时，在数以百计的挽联中，又竟然出现了三年前曾被判处死刑的姚则崇敬献的一副挽联。其中下联云：

攀龙附凤，愿教驰驱，天公胡不吊，星陨碧落白首何依。”

哀悼戴笠如丧考妣的挽联，揭露了这个“死而复生”的闹剧，正是绝妙的历史讽刺，终究揭开了戴笠欺世盗名、移花接木的面纱。

戴笠的黄巢美梦

1946年3月17日上午，青岛沧口机场上，日迷津渡，雾失楼台。

在候机室里，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惴惴不安地说：

“局座，机场上浓雾弥漫，上海方面也来电说那边气象复杂，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行起飞呢？”

戴笠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说：“个中缘故，不足与君道也！”

是呀，他戴笠终年南来北往，又何尝不知晓雾空不利于飞行的道理呢？但是，此时此际，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呵！

十天之前，远在重庆军统局本部的心腹毛人凤，给正在北平忙于“接收”汉奸财产的戴笠发来一封密电：委座谕令局座立即返渝，参加研究、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会议。重庆宜李翠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面对电文，戴笠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当着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文强的面，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

文强怕他过于激动，连忙陪着笑脸地说：“是呵，是呵，只是如今之计……”

“请文兄为我拟一份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至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个月才



沈谦、董益三(右)、文强(中)在全国政协会上

能返渝面陈一切。”

自从30岁报考黄埔军校以来，这今年已半百。在整整20个春秋寒暑中，他戴笠在蒋介石的鞍前马后，勉效驰驱，无论是为主子排除异己，还是为主子捕杀共产党人，哪一样不都是走在人前，耻于人后。这般的忠心耿耿，还算不得“唯命是从”吗？

就拿这次奉主子之命，到平津宁沪处理汉奸问题来说吧：

在沪宁，他戴笠拉拢了大汉奸周佛海，几十万的“忠义救国军”，转眼间就改编成了“交通警察总队”；几百万两的黄金白银，被“接收”进了国民党财政部的金库。

在平津，他戴笠略施小计，仅凭一叠“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帖，就一举擒获了王揖唐、殷汝耕、曹汝霖等50多名大汉奸，查封逆产1500多户。

“想当年，你老蒋对我戴某人何等信赖，何等器重，而如今却对我疑虑重重……”想到这里，戴笠不由得黯然神伤了。

“重庆宣李辈在捣鬼！”“宣李辈”者，何许人也？说穿了，都是历年来与他戴笠争权夺利时的手下败将！宣铁吾、李士珍都是黄埔军校第

一、二期的学生，比起黄埔第六期的戴笠，其资格要老上好几辈。这两个人新近都投靠了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而陈氏兄弟又是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党魁，因而宣、李二人也就有了与戴笠争权夺利的新的政治资本。

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率先夺去了戴笠的财政部缉私署署长的肥缺；现在，李士珍又在和戴笠争夺全国警察总监的宝座，而且据可靠消息，蒋介石已经特别召见过李士珍，委任状即将发表。

“真是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呵！”一贯工于心计、暗算他人的戴笠，突然悟到了这个哲理，恨不得能一步跨到重庆，面见蒋介石，痛切陈词，直抒胸臆，立时爬上“全国警察总监”的宝座，方才称心如意。

驱使戴笠急于雾空飞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在返回重庆之前，先飞到上海住上几天，跟被他霸占的电影明星胡蝶共效于飞之乐。

胡蝶，原名胡瑞华。1908年生于上海。她从影20多年，拍了100多部影片，创造了众多的银幕形象，是我国早期影坛上熠熠生辉的一颗明星。国外赞誉她是“中国的嘉宝”。

戴笠对于胡蝶的电影艺术虽然缺乏研究，但对于胡蝶的姿色却是垂涎已久。早在1932年他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的時候，就从电影银幕上仰睹了胡蝶那姣美的风采。嗣后十多年来，他虽不乏发妻和情妇的温存，但他的“胡蝶梦”却依然魂萦梦牵，经久不衰。只是鉴于胡蝶在中外影坛上响亮的知名度，一时无法以鄙陋的手段掠为己有。

谁知，1937年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炮火，将“电影皇后”胡蝶由上海轰到了重庆，陷入了戴笠的魔窟。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而戴笠则是在陪都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他凭藉力可通天的权势，先把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委以“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的头衔，施用调虎离山之计，让他只身去云南昆明赴任；继而又将胡蝶挟持到重庆神仙洞，了其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风流相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戴笠又将胡蝶用飞机送到上海，寄居在他的心腹知己唐生明的家中，并在暗中策划搞一个胡蝶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启事”，从而达到他长期占有胡蝶的罪恶目的。

经过戴笠、唐生明等人半年来的密谋策划，约定1946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出笼胡蝶与潘有声“离婚启事”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今天已是3月17号了，时不我待，他戴笠绝不能坐失良机。

“全国警察总监”宝座的诱惑，再加上“英雄美人”天长地久的风情，这两者构成了戴笠今天执意于雾空飞行的黄粱美梦。

“仙舫，机上多带了汽油没有？”

戴笠忽然向他的人事处长提出了这个问题。

龚仙舫连忙回答：

“遵照局座的指示，机上共带了800加仑的汽油。”

听了答话，戴笠随口“嗯”了一声，心里却盘算着：多带汽油，可以防备上海机场因气候不好无法降落而改飞南京，南京如果也不便降落，还可以折回到青岛或济南，这就叫做有备无患。

更使戴笠有恃无恐的是这架专机的性能极为良好。他乘坐的是北平航委会拨给他的美制C-47型222号专机。这种专机由雷达导航，可以全天候飞行，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用运输机。更何况这架专机的驾驶员，又是经过美国空军训练有素的优秀飞行员。有这两个优越的条件，今天的雾空飞行岂不是万无一失！

想到这里，这个常年铁青着马脸的魔鬼，脸上露出了难得的一丝会心的笑容。

11时45分，飞机腾空而起。

随着隆隆的机身以及伴着匀律

的颠簸，双目微闭的戴笠，陷入了恍惚的禅思之中……

正午12点半左右，专机飞到了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正值大雨滂沱，龙华机场不同意降落，便按预定计划改飞南京。

淮料当专机飞临到南京大校场机场时，机场上空也是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经过专机报务员与机场塔台的再三联系，机场方勉强同意降落。

只是由于当时云层很低又有雷雨，专机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机场而飞到江宁县的方向去了。报务员还一再与机场地面联络，但到下午一点零六分之后，电讯便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叫不到222号专机的呼号了。这时，这架专机已经撞在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戴山山腰上了！

关于专机雨中撞山失事的情况，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叙述说：

“……自戴笠摔死之后，连接三

天大雨不曾停息，他的尸体便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恶魔，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普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三天之后才被发现。”

戴笠机毁人亡的下场，使他的主子蒋介石特别感到伤心。为了“表彰”戴笠历年来效忠于美蒋反动政权的“功绩”，蒋介石不仅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追赠戴笠为陆军中将，并亲自为戴笠选择墓地，而且还指令全国各大城市都为戴笠举行“追悼会”。蒋介石本人还特地赐赠给戴笠一个“碧血千秋”的花圈，一副为戴笠涂脂抹粉的挽联：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如今那块残留在南京灵谷寺右侧、镌文为“故戴笠中将之墓”的石碑，已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责任编辑：刘家驹）

曹操为啥要

曹丕当接班人

曹操每当出征，次子、诗人曹植便慷慨赋诗，文采飞扬，为父亲壮行。而曹操的长子曹丕，既不能诗，也不能文，更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语言。他只拉着父亲的马嚼子，傻呵呵的满脸清泪，祈祝父亲珍重，在场的人都唏嘘不已。曹操曾有废长立幼、以曹植取代曹丕为继承人的设想，至此旧念顿消，深深地喜欢上了曹丕，反而觉得曹植华而不实起来。

旧官场所青睐的，从来就是像曹丕这样似笨似拙的憨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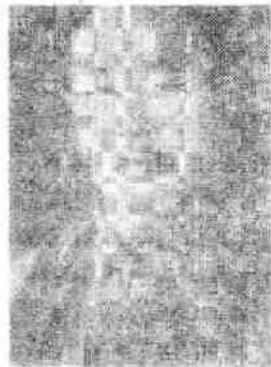
○ 竟陵子

萧何会做官

“汉初三杰”，韩信被诛钟室，祸及三族；张良明哲保身，归隐林下；独有萧何终身厚禄，老死庙堂。萧何也，把刘邦当无字天书，时时刻刻在揣摩研究，小心地解答着每一道难题。刘邦在前线和项羽决战，派人回关中慰劳主持朝政的萧何。萧何一想不对劲，这不是对我不放心吗？他连忙召集萧家子弟，一律送到刘邦的身边充兵，刘邦这才解除了后顾之忧。黥布造反，刘邦亲自率军前去讨伐。他又派亲信回关中调查萧何的工作。萧何想，大王还是不放心啊！他于是广积私财，一副天下太平就安享富贵的庸俗情态。刘邦这才捩须大笑：“农民意识，小人哉！”

○陆立之

我所知道的军阀 韩复榘不是



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笑话早已传闻天下，都认为他略通文墨，一介武夫，笔者却以亲见亲闻告诉我们，此人是满腹经纶，精明诡诈。

——编者

1936年夏天，中日关系进入紧张阶段，国民党中央政府迫于形势，研讨战与和的策略。决策者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拼实力则强弱悬殊，不如暂作拖延，运用外交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其设想是仿效袁世凯当年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前的手腕，希冀美英等国出面干预，获得所谓国际公道，因为美英法等国在华利益，必不愿拱手让日本吞噬。此种主张当然属当权者主流思想。其意图，在争得缓冲时间进行“安内攘外”的最后决斗。其次是反对派意见，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应破釜沉舟以焦土政策与敌周旋。理由是，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铮铮铁骨将士作殊死战，有气壮山河的群众为后盾，倭寇跳梁不足为患。意见虽稍偏激，却是热血沸腾，颇能迎合舆情，一时捋臂高呼，响应者众。另有一类见解则认为，强兵压境，似以卵击石，只能虚与委蛇，暂作和议。某公并引证1917年列宁与德媾和事例，借作遮掩亲日之嫌，并饰词说：“指望美英法援手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我应凭自力更生卧薪尝胆的生聚教养，然后可背城一战。”摇唇舌舌，亦颇蛊惑人心。

都城飞议，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权者为把握主动权，在“攘外必先安内”的主旨下，立即在南北各省市进行部署：一面作出准备抗战姿态，在重要战略地点派驻高级监控人员，严密控制权力机构；一面积极地防范“异党活动”，诱迫青年学生拥护“一个主义、一个党、一

个领袖”。

在山东，对韩复榘的监控也属重点之一。当时南京政府，先后派赴济南的中央大员三人：一是监察院派驻山东的监察使方觉慧（子祺，湖北麻城人，原中央党部训练部长，属CC系）；二是蒋伯诚以蒋介石代表名义慰问韩复榘，其目的在考查韩对抗战的意向；三是黄杰（达云，湖南长沙人，原中央税警总团团长，黄埔一期出身），其任务是探测韩部军情，设法与韩商讨构筑抗战工事等。

韩复榘对南京高层各派意见持怀疑态度，保守中立。对中央大员莅临济南，另有对策，即表示尊重不亲，分别派人监视，形同软禁，使来人无所作为，浪费时间。方觉慧早年于“四·一二”事变时，曾在武汉策动夏斗寅叛乱有功，因此深受蒋介石青睐，授以官爵，但此时常驻济南。方本人庸惰无能，在韩复榘的手枪队恐怖气氛中不敢出官衙一步，只得终日伏案撰写《新元史》，表示不问窗外事，藉以自保。蒋伯诚与黄杰先后到济南，都被“招待”居住在黑虎泉宾馆，终日以麻将酒色羁縻，不得越雷池一步。韩复榘常率小妾陪席，亦召致济南纬八路名妓侑酒。蒋、黄二人寄居月余，始终在黑虎，驹突，珍珠泉闲散消夏，竟也一事无成。

这就显示韩复榘胸有韬略，机智过人，远非一般传说韩仅是“略通文墨”之辈。

笔者于1936年夏季，奉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国民军事教育处”派遣，到济南主办“山东高中以上学生暑期集训班”，因此与韩复榘有多次接触，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第一印象，我发觉韩复榘是以一种粗俗的假象，蒙盖其诡诈多智的内涵，这与外间传言大相径庭。有一天，韩忽邀我赴宴，这是一次奇特的酒宴，不仅形式上特殊，而且是韩复榘着意安排的一次宣讲会，不重酒食，倒有些类似西方人的餐

间会谈。饮宴中韩复榘不再木讷而是侃侃谈笑，表露了他渊博的知识，使我当时就感到世人是误解了他。这次宴会的奇特处是：两桌酒席，一桌设在韩的起居室内，只有韩复榘、孔祥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方觉慧，陆梦衣四人入席。另一席设在房门外的厅口，有省政府的秘书长、民、财、建、教四位厅长以及一位机要秘书入座。当时张秘书长与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举杯祝酒时，只停步在门槛外，不再入室。这是一种我未曾见过的奇特方式。再一令人惊奇的不是什么美酒珍馐，而是聆听韩复榘的娓娓高论，这有些像新闻发布会或是什么雄辩会，韩复榘的放言豪饮，谈锋犀利，似在表白其心胸坦荡，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面对方觉慧谈论元代史，不仅评说了成吉思汗的黷武主义功罪，竟也背诵了元好问的绝句，似又意有所指。绝句是：“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韩复榘借酒论诗是宣泄着什么，恰又是面对正在撰写《新元史》的监察使，这可说是妙语双关，在当时的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觅到第二人。其次，韩复榘与孔祥榕评论《水经》，诙谐幽默。孔体胖善饮，挥汗不止，韩风趣地说：“你在治黄之前，先得治您这一身水。《水经》一书，连隋唐汉晋谁人所撰都搞不清，就不足为本。”这番话出语不俗，又显露韩复榘博古通今，并非一莽莽武夫。当时他又转脸和我对话，由于听说我在南京执教中国通史，又知道我在“暑训班”中讲话引述了法治精神，又值得我曾单独访问教育厅长何思源（韩复榘拨一小轿车供我专用，并派司机与警卫随伴，实即侦察我言行），因而与我谈青年教育问题。韩说：“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讲‘礼义廉耻’，这很了不起，确实

切中时弊。但是，对学生有知识的人可以提倡，对农村老百姓他们可听不懂。古人说过，要仓库有存粮，衣食无缺，才能去叩头烧香呢。俺山东就先从乡村建设示范……”

我从南京去济南之前，曾专程谒见几位名教授，礼聘他们同到济南暑期军训班讲学，想通过教授们博学宏论，策励青年学生爱国御侮。当时，在中央大学我专访了陶希圣、雷震两位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我访见了傅斯年；雷傅二人一再谦辞不愿北行，只有陶先生愿顺道考察山东碑林。我有些意兴怏怏，觉得专办一次集训只能聘请一位名人讲学，这会使学生们失望。但我在与韩复榘共餐后得到启发，我又在山东邹县专请了倡导乡村改革的梁漱溟先生，为暑期集训班阐说了梁先生的创见论。后来，韩复榘又亲自陪同马相伯老先生莅临莘庄暑训班讲学，策励青年人以武功救国，给予学生们深刻的印象。总的说来，这次暑期集体军训，还是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才成功的。

这是我亲见的有关韩复榘其人的实况。

有些传闻，说韩复榘仿《包公案》或《彭公案》《施公案》，以忠孝鬼神方术来断狱和惩治贪官，又歌颂他与日寇特务土肥原斗智等等，我未亲见不敢妄证其事。

我从济南回南京前，韩复榘表示惜别，亲自题上下款，临时赠送了一幅照片给我。当时他悬腕振笔，恭正地写了两行道劲的楷字，我又看到了韩复榘的书法也有功底。

回南京不久，突发了“西安事变”，我又听说韩复榘曾通电响应张学良、杨虎城义举。后来，万马齐喑，直到韩被处死。

（责任编辑：刘家驹）

重贖无廉臣

○竟陵子

唐德宗的工部尚书裴佖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我的姑父在朝廷当官，开初为人高雅绝俗，名声也很不错。有一天，他老人家退朝回家，对咱愤愤地说：「佖儿，咱看崔昭这个狗东西，整个机关上下都在说他好，肯定行贿收买人心！这样下去还得了啊！」他老人家正气咻咻地，门卫跑来报告，说寿州刺史崔昭求见。「不见！」姑父一声怒喝，见门卫站着不走，操起马鞭要打。他想了一想，勉强地穿上朝服，向会客室走去。一会儿，传过话来，命令赶快送上好茶，又一会儿，命令办公室立即安排酒宴；又一会儿，指示招待好客人的马夫和警卫。等崔昭走了以后，咱姑妈好奇地问姑父：「老头子，你咋啦？开始那么傲慢，后来又那么恭敬，肯定有什么原因！」咱姑父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笑昧昧地给咱和姑妈看。原来，那纸上写着，崔昭送给咱姑父一千匹丝绸。」

（见唐·李肇《国史补·卷中》）



他们
创造了第二次
核打击力量

彭子强

1970年8月……

经历了五年的艰辛攻关,我国潜射导弹终于已初具规模。现在,潜艇水下发射的一个最难点是,火箭是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的,它在弹射时会不会把潜艇砸了?美国的第一代潜射模型导弹在弹射出水面时没有点着火,结果导弹落下来,把潜艇砸扁了,造成“艇毁人亡”的事件。因此,美国在搞北极星潜射导弹时,先是在陆地的水池中试验的,就是用塔式起重机将试验弹系住,水下弹射后,钢丝绳便把它吊起来……因为潜艇造价十分昂贵,有人说,连它的厕所都是用黄金砌成的。

潜射导弹的总设计师黄纬禄和他的总体部的人,还有一些科学家四出全国去寻找水池。

青海湖、太湖、云南的抚限湖……

有的湖泊被选中了,然而要在几十米深的水下搞一套检测设备,等于重新建造一个测量基地,耗资巨大,况且水下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当时只有美国这样的富翁才掏得起腰包,才有那样的工程技术。

“干脆挖个大水池!”有人说。

但黄纬禄心潮难平,他不同意,他和他的总体部决定另辟蹊径,一个奇思妙想在他们胸中形成了。

他们去面见钱学森,提出在长江大桥下搞模拟弹的设想。因当时武汉正在搞武斗,这一历史的选择只能在南京。

钱学森一听,拍案叫绝,说:

“好,好,我原先就怀疑美国的老办法适合不适合国情。人家是大富翁呀!……”

钱学森当即召开会议,把总参、航天部的人找来,把军代表们找来,正式下文同意总体部的意见。总体部的同志们至今都称赞钱学森昔日的当机立断,至少为国家节省了七



八千万元。

然而,这个决定在当时是很难做出的。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是非凡人凡智所能为的。

当钱学森、黄纬禄正准备在长江大桥下搏击风浪时,一股相当大的人造风浪也向他们袭来了:

“改在桥上进行弹体落水试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美国没有比长江大桥更大的桥吗?”

“是呀,要是桥下可以创造神话,难道美国人会不开窍?”

“将来,要是砸艇了,看你们怎么向一百多人的生命交代吧!”

批文下去了,有的单位却按兵不动:“等一等,方案也许还要改变,这太冒险了。”

有的人对黄纬禄说:“黄总,你不给自己留个台阶下吗?”

“什么台阶?”

“万一长江大桥下不解决问题……”

黄纬禄沉默,怒目以对。那人连忙说:“我也是为你好,钱多花点,是大家负责,而失败了,你一个人担当风险!”

是的,确有很大的风险啊!然而科学家是为了捧铁饭碗而搞科学的吗?黄纬禄想起了在伦敦的那个岁月。德国人在一个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向英国的首都倾泻下成千上万枚V导弹。其中有一枚落在他实习的工厂,办公室的五位英国同事当场被炸死,他那天为了挑选一条领带恰好晚到了几分钟,才幸免葬身于异国他乡。后来,英国人想出了一条计策,在伦敦的郊区伪装一个假伦敦,以诱使德国人上当。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措施,认为劳民伤财又不会收效,因为活跃在伦敦的德国特务太多了。但是英国人辅以别的措施最终成功了,真正的伦敦城避免了重大损失。战后,依然屹立的完整的伦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在人为,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科学不尚空谈,科学需要勇气!黄纬禄挺起了脊梁,出发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我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实在是太贫困了,不能再让贫困的母亲掏大钱了,能省几个铜板也是好的啊!

于是,黄纬禄向钱学森保证

……

于是，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它坚毅的脊骨挑起了民族的重负，挑起了新的希望。

多么令人难忘的一页……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长江大桥实行三天宵禁。

正是火炉南京的八月，每一个街上的行人都汗流浃背。黄纬禄穿着背心短裤，头戴一顶草帽，站在大桥上指挥潜射火箭的溅落模拟试验。

上桥试验前许世友要为科学家设宴洗尘。他举起了酒杯。这个面孔黧黑、粗眉深眼、身板敦壮的将军，把希望和钦佩溶进酒里。

模型火箭被桥下的大吊车抓起，高高地吊起来了，硕大的白色圆锥体映照在蓝色的天幕上，如同一幅构思绝妙的画。

导弹专家做最后检查



摄影机启动。江堤上万人空巷，观看这一壮景。

黄纬禄手里举着报话机，满头大汗，来回在桥上奔跑，指挥着模拟火箭悬吊到位。

所有的仪器设备都紧张地闪动着信号。

长江水浪的测量结果，完全符合参数要求。

水下，象征性的潜艇也准备妥当。

“开始，10、9、8、7、6、5、4、3、2、1、放！”

随着黄纬禄一声令下，火箭以万钧之势坠落江流，激起的水柱比桥面还高，水花溅了黄纬禄一身，真凉爽啊！仿佛扑向大海的怀抱。

黄纬禄的一只臂上滴出一股鲜血，原来被火箭弹体急速牵落的电缆从他的手臂上擦过……

他顾不上包扎，也忘记了疼痛，一溜小跑，奔到桥下去看测量数据……

试验成功了，落弹不会砸着潜艇！

又试验了几次，结果还是这样。长江大桥向世界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是第一流的。无比兴奋的黄纬禄捧起长江水，往脸上泼着，泼去汗渍和疲劳。他摸了摸包扎的伤口，然后俯下身，美美地喝了一口长江水。啊，好甜的酒啊！

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们的潜艇和潜射导弹的研制成功，使世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1983年夏，美国“核潜艇之父”、工程学博士、退休上将军里科弗，应王炳南和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华访问。他来到我们研制潜艇水下发射的专家们中间座谈。他一进来后，便毫不客气地坐到上席。当对外友协的人把姜未根、黄纬禄、仇世民等人介绍给他时，这个小个子美国人显得表情冷漠。他是世界闻名的专家啊，著名的华人作家赵浩生就写过一本关于他的纪实文学《鸚鵡螺号》。

我们的科学家们要他谈谈美国现在的潜艇和核潜艇进展情况。

他不谈，他说：“要我谈，必须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看看你们的水池，看看你们的基地、潜艇和潜射导弹！”

我们说：长江大桥下产生奇迹。他不相信。

他说：“全世界的水池和潜艇，我都看了，中国的落后东西为什么不让我看？不让我看，我绝对不谈。”

一小时的会见变成了僵局，与其冷场不如退场，我们的专家出来了。王炳南听说了这个事，感到很为难，说：“别走，别走，这家伙在美国

说得满好，谁知到了中国这个劲头。”

黄纬禄说：“他凭什么小看我们？”

最后“官司”打到上层，海军刘华清司令员接见了，而后胡耀邦总书记也接见了。同意他看一看我们的东西，当然，条件是对等。

在参观过程中，里科弗介绍说：

美国是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开始研制北极星 A-1 潜射导弹的。在对该型号进行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试验以前，美国海军总是充分验证水下发射方案的可行性。首先做缩比模型水下弹射试验与全尺寸模型水下弹射试验。接着在陆上和舰上用发射管弹射模型弹，再利用“华盛顿”号潜艇从水下弹射模型弹。然后，用有真实第一级发动机的模型弹从水下进行发射管弹射试验。与此同时，按两个试验阶段对导弹做了几十次陆上发射与舰上发射的飞行试验。第一阶段发射了十多枚试验弹，然后改进导弹设计，扩大试验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从陆上和舰上发射了几十枚研制弹。这样，1960年7月的首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一举成功；不到三小时，第二发也成功。

北极星 A-1 导弹研制成功后，美国相继研制了北极星 A-2、北极星 A-3、海神 C-3 和三叉戟 IC-4 诸型号。潜射导弹的设计技术日趋成熟，试验经验日益丰富，虽然试验步骤有所简化，试验次数逐渐减少，但是并未降低转入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的条件。而水下试验有很多次都是在人工水池进行的。

最后，他确信了我们的神话，激动地擦了擦眼睛说：“以前，我一直以为你们水平很低……你们称我为核潜艇之父，你们也是潜艇之父啊……你们是顶聪明的跳班生，我



在中学就跳班……不过你们比我跳得距离更大……”

是的，中国的潜艇专家，仅以三级跳跃，跨越了外国的五个阶段，第三步就进入实际潜艇水下试验，这是了不起的创举。

潜航发射在龙宫

潜艇水下发射，是在大连附近的渤海湾进行的。

有两个女工程师上艇，做火箭瞄准系统的保驾工作。骄傲吧，她们是祖国潜艇的第一代女艇员。火箭击中的目标就是她们帮助水兵瞄准的。这在世界潜艇史也是首例。

然而水兵们冷眼相视了。他们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都冷峻地睥睨着她们。海上有个不成规矩的故事：女人上潜艇不吉利。海龙王是老色鬼，见了女人不安分，兴风作浪。

女工程师大李和大刘眼里噙着泪花，既激动又委屈。她们是担心瞄准手失误，自告奋勇，费了很多口舌才批准上艇的。批准者也不是封建

脑瓜，他们担心真应了那些邪说，砸了锅——把宝贝潜艇给毁了，那才不值啊，但最后“阴盛阳衰”，她们胜利了。

艇长石宗礼一个眼色扫了过去，艇员们才苦涩地咧开嘴笑了——向她们表示难得的热情欢迎。

石宗礼悄悄地训斥水兵们，说：“你们都留了遗书，她们俩也都给丈夫留下了遗嘱。大李对她送行的丈夫（他就在码头上哩）说：‘假如我回不来，老王，你等女儿长大点，再娶，好吗？’大刘的女儿正作为小演员出访罗马尼亚，上艇前，她特地去照了相，把照片留在女儿的梳妆台上……”

水兵们流泪了，不好意思了。穿背心光膀子的套上衬衣，穿短襟裤的，慌忙去找长裤。

女工程师制止了他们：

“小伙子们，一切为了发射成功，大姐不计较这个……”

潜艇内实在太闷热了。但两个女工程师却戴上了防护头盔。

一种献身的庄严感顿时充满了潜艇。

水兵们也戴上了防护头盔，并不时向她们挥手致敬。

艇长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看着戴防护帽的女性，忽觉得潜艇内亮堂了许多！她们带来了圣母之光！

她们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代表。

她们将潜航在水下几十米深，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美国、苏联等的水下发射潜艇上没有女性！

大概指挥部也没有想到：女工程师们头戴的防护盔无疑是一把火炬，它燃烧着艇上水兵的心和激情！

海龙王也将为这新时代的女神加冕！让路！

艇长深怀敬意地向她们投去一瞥后，说：

“同志们，她们是海里的神，就照她们的命令办。”

潜艇正待启动。一个消息传来——火箭出现了一点异常。

潜艇下沉不下沉？火箭按时发射不发射？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射向一个“眼镜”：火箭水下发射总设计师黄纬禄。他也是这次海上飞行试验的技术总指挥。

新华社的公告已发出了，错过了最近几个晴朗日子，台风季节就降临了，如果不打，把火箭拖回去检查，那就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关系国家之大事，必须当机立断。

到海龙王的“深宫”发射火箭，这在世界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干过。祖国母亲的心沉在看不见的深海里颤动，黄纬禄的心脏如同放在海底的声纳与之共振不已。

在这历史的一瞬间，这枚花费了他15年心血的火箭，连同潜艇就可能毁掉。当然毁掉或挫伤的不仅仅是这些，有比他的火箭更宝贵的东西：民族的锐气！

他回到屋里，把门插上，把厚绒窗帘拉上，让房间变得漆黑一片，找了几本厚如砖头的书枕在头下，两眼圆睁着，把火箭的研制关键像过电影一样回忆一遍。他太熟悉他的火箭了，就像母亲熟悉她的婴儿；他信任他的火箭，就像祖国母亲信任

他一样。几次试验都完成得很漂亮，难道临阵……他排除了异常源于火箭的结论，认为由于海洋的作用，这种异常是正常的。但是他没有勇气，直面大自然的挑战，事情太重大了，国威、军威系于一举。美国、苏联潜艇水下发射都曾经失败过，中国的首次试射不应重复弹毁艇亡的记录。别的不计，单就经济考虑，那是几个亿啊！他犹豫了，望着黑暗中的电话不敢坐起来。

忽然一幅清晰的画面映入眼帘，那是不久前从海里打捞上来的一门大炮，那是清朝“济远”号巡洋舰的尾炮。它就陈列在大连。他看见它周身铁锈，但脊背被人们抚摸得亮闪闪的，显出刚毅不屈的神采。88年前的一天拂晓，满清的“济远”、“广乙”两艘军舰在巡逻时，突然遭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神浪”号的伏击，伤亡惨重。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这就是著名的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济远”舰长方伯谦在日舰的轰击下不战而溃，下令掉头逃命。水兵们拒绝在挑战者面前屈服，奋起抗击，两个瞄准手操纵这门尾炮，对穷追不舍的“吉野”号开炮轰击，四发三中，击中敌舰要害，“吉野”仓皇逃遁。当然，甲午战争最终失败了，第二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门尾炮随舰沉没海底。

两个瞄准手是水兵王国成、李仕茂。这两个水兵的壮举给了黄纬禄以启发：应该有坚定的自信。

“打！”他坐起来，跑去找马捷和丁衡高，他们支持他的建议：如期发射。立即向北京指挥所报方案决定。

然后他短衫短裤地来到人员集结的山坡上，在鹅卵石小路上轻松地小跑起来，就像每日清晨锻炼身体那样。工人、水兵、工程师们心头的眉结开了，奔走相告：“没事，黄总像往常一样小跑呢！”发射基地上空



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这正是黄总所希望得到的。

北京指挥部复电：再慎重考虑。

黄总、马捷、丁衡高又去电，重申如期发射的请求。

国防部长张爱萍会同专家研究后终于回电：同意。

潜艇到达发射海区，并潜入水下。潜艇上几十米长的通天线冉冉上升，伸出水面。顶端涂着鲜亮醒目的红色。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天线杆。潜艇天线是因为试验才伸出水面的，为的是把射前在艇上测得的导弹数据传输给停泊在靶场的远望号测量船。

射前：潜艇艇员进入发射导弹值班岗位，直到射前十分钟，发射准备十分协调。

射前 60 秒：发射进入最后时刻。海边指挥所里，黄纬禄面海伫立，额门上渗出大粒大粒的汗珠，太阳穴上的青筋乱跳不已。他的双手

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扬声器传出艇上指挥员一板一眼字字如铁的报时声：“10、9、8、7、6、5、4、3、2、1、0！”

“发射！”

从蓝缎子似的海面冲出一枚乳白色的火箭，直窜云天，火箭尾部喷出一股强大的火焰，几十米高的浪花同它衔接在一起，当它们落下来时，在蓝色的海里开出一朵大雪莲。瞬间，火箭从仰着的视野消失，它已冲出大气层，进入太空，身后只留一缕轻烟漫漫在蓝天消散……

火箭准确击中目标，发射圆满成功。

此刻，祖国举行庄严的仪式，迎接凯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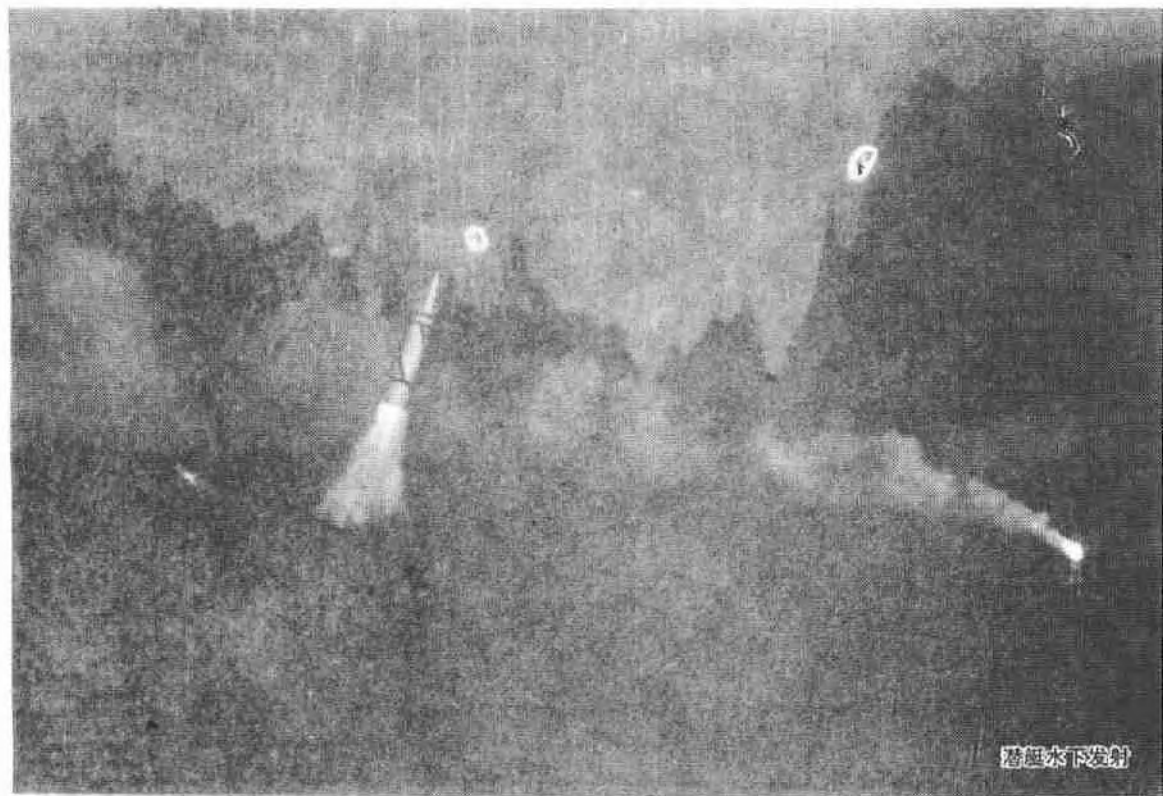
黄纬禄、马捷从鲜花中走过……他们走过了一个时代；我们没有潜射导弹——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历史结束了。此后在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中将等人指挥下，我国

用核动力潜艇水下发射火箭又获得成功。

世界各大通讯社对我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和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反映十分强烈。美国、日本等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和科学上已从文化革命十年摧残和挫折中恢复过来”，“增加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对亚洲的发言分量”。“无论谁进攻中国，都必须估计到中国核导弹打击给自己力量造成的重大削弱。”“如果有谁依然从酱油、糖醋鱼，或者是从‘文革混乱’、‘人海战术’这些陈词的角度来看八十年代的中国的话，那么他们必定会认识到，现在是改变这一看法的时候了，因为‘亚洲沉睡的巨人’不再沉睡了。”

啊，中国的洲际导弹掀开的不仅是浓重的大气层的迷雾，它撩开的是一个世纪新的破晓！

（责任编辑：刘家驹）



潜艇水下发射

“文胆”陈布雷之死

○王晓华

蒋介石“笔杆”陈布雷，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从大陆消失已四十多年。本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从历史的、心理的角度，再现了这位“文胆”当年不堪政治重负的境遇，唱出了一曲新的、动人的挽歌。



多事之秋

公元1948年的秋季，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笼罩在满目凄凉的枯黄色中。中山门里的中山大道、黄埔路、国府路等路旁，成带的法国梧桐，在瑟瑟的秋雨中，疏枝残叶在苦苦挣扎……

深夜，湖南路一座二层小楼的窗内，透出几缕昏黄的灯光，一个弱小瘦枯的老人，他独处桌前已好几个晚上，桌上铺着八行笺的稿纸上，仍然是“实行总体战计划”七个字，这位老人，就是蒋介石的幕僚长、被称作“文胆”的陈布雷。

数日前，蒋介石在总统府召见陈布雷，见他一脸疲惫的样子，劝慰道：“布雷，时事艰难，需要你同舟共济，过去，你是我的头脑、思想，现在，我和国家正需要你，人家都称你是我的‘文胆’，没有胆怎么行呢？没

有胆，怎样能打败共产党呢？”

“总统，我实在不敢当。”陈布雷诚惶诚恐地说。

蒋介石语气凝重起来：“我需要你尽快拿出一个‘战时体制’的方案来，与岳军（张群字）、哲生（孙科字）、达铨（吴鼎昌字），还有何敬之（即何应钦）、陈立夫等人商量一下，要尽快搞出来。”

……

几天过去了，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电话催了几次，陈布雷还是写不出来，真是到了江郎才尽，灯枯油尽的地步了。他不禁想起了抗战一周年时在武汉的那个暑天……

“文胆”之文

陈布雷，原名训思，字彦及，别署畏垒。清光绪十六年（1890）农历11月15日亥时（夜21点—23点），生于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一

个茶商家庭中。5岁开始识字，随其父及大哥习毛诗、尔雅、礼记等书，才思敏捷；12岁时一个秋日，陈布雷写下《苦雨》七绝一首，曰：

游子浮云梦不成，
挑灯独坐夜凄清，
明朝欲向横塘路，
大雨萧萧久未晴。

从中可看出他的文思。1903年，陈布雷14岁入县城应童子试，误中副车，“榜发置第151名，与考者亦151名。”其父大怒，认为“辱门楣甚矣”。这件事给陈布雷以极大的刺激，从此发奋读书，立下“不想蹉跎，患不能自奋，宜永记之”的誓言。1911年，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后，到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天铎报》任撰述记者。开始用“布雷”的笔名。民国元年，陈布雷为《申报》译稿，后在《四明日报》、《商报》主持笔政，用“畏垒”署名发表社论，一时声誉鹊起。1926年入《申报》主持社

1928年7月，陈布雷（左四）在北平和蒋介石合影，前排为孔祥熙夫妇和女公子。



论,为蒋介石青睐,1927年,延留于总司令部,为蒋拟文字,“佐助笔扎”。蒋介石自得陈布雷后,武略长进,“文胆”顿生。陈为之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暴日膺惩》、《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对新闻界讲话》、《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等。1935年1月,撰《敌乎友乎》一文,以徐道邻名义发表在《外交评论》杂志上。各报相继转载,日本报纸杂志亦纷纷转译。该文论道:“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终究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中日不再战”的观点放在三十年代,在日本军阀步步紧逼侵略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全国一片抗日声中发表是文,舆论导向引起的混乱可想而知。连文学泰斗鲁迅亦拍案而起,著文喝道:“竟连日本是敌是友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句‘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此时的陈布雷身不由己,他早参预蒋介石戎机,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了,成为蒋介石离不开须臾的关键人物。但陈布雷时时想重操旧业,辞掉官职,作一报人。他自述道:“余是年在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反映了他在理想与事业方面的矛盾心态与心理不平衡。

某天,陈布雷至南京六朝古刹鸡鸣寺,去求观音签,“问何时可辞官归里?”他虔诚地摇动着签筒,半晌,一根竹签掉了出来,拾起一看,签文曰:“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意思是说,一朝辞官而去时,可获财富满载而归,心中暗暗高兴。接着,他翻过签文去读签解,只见四字:“官不宜解”。心中顿时怅然若失。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布雷承命为蒋介石起草《外交报告》中有名句云:“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即出自陈布雷的手笔。而五中全会通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开始转向抗日的一次重要会议。其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紧张的、夜以继日的工作,使陈布雷“积劳之余,加之烦闷,几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头痛及失眠病转剧。不得已,他向蒋介石告假,说病体不支,需要调养,蒋介石最多复准病假一月,往往不到期又电召入幕。1936年,在蒋介石50岁生日时,陈布雷替蒋撰写了《报国与思亲》及《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等文。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激发了陈布雷的爱国热情,他更加孜孜不倦,投入工作。连续为蒋介石撰写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揭发敌人灭华的毒计与汉奸和平的罪恶》等数十篇重要文章。陈布雷自述道:“为蒋介石撰拟文字,此时期为最多,……写来亦觉顺利,此二三个月,为近年工作最愉快时期。”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在重庆就抗战后中国的命运举行谈判。通往和平民主的大门曾一度打开,然而,文胆陈布雷认为,会谈“深以终必破裂为虑。”这种局面,陈布雷并不能左右。他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做善良之建议而已。”果然,1946年,国共双方军队内战又起。蒋介石扬言,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可以完全消灭共军。对此,陈布雷坚信不疑,他对杨玉清说过这样的话:“委座对军事方面极有

把握,必须使共产党的武力,不致阻扰国家的建设,为国家根本需要,故此点必须坚持。”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同时,一方面召开制宪、行宪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在竞选副总统时,国民党内矛盾尖锐,李宗仁、程潜、孙科、于右任展开角逐,最后李宗仁虽然当选为副总统,但大厦将倾,气数已尽。这个残酷的现实,随着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就在眼前了。陈布雷的精神支柱亦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候。

变态心理学家认为有些人在长期的精神刺激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情绪消沉、忧郁、沮丧、焦虑,进而产生自责自罪的念头,认为自己思想迟钝,脑子变笨,不再对社会有用,乃至把以往的一般错误夸大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而要求处理自己。这是典型的心理异常疾病,即精神抑郁状态,结果往往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陈布雷后来的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支下下签

陈布雷自杀前,好像有所感应的似的,寓居上海的夫人王允默坐卧不安,无日不为陈布雷过度虚弱不支的病体担心。这一年的夏天,陈布雷“养病庐山”,夫人随伴。一日黄昏,在风景如画的仙人洞中,陈布雷夫妇“小坐闲谈。”

陈布雷看着妻子不禁动情,说:“我的病体拖累你太久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而给予你的却太少了,无法偿还了。”

王允默说:“老夫老妻,相濡以沫,何必客气?”

陈布雷细声慢气地说“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我今年五十九岁,较先人之寿

长矣。”

王允默心中掠过一阵阴霾，强笑着说：“何出此言？上至党国，下至家小，你舍得下吗？再说，现在科学进化，人的寿命长着呢！你不会撒手先去的。”

二人都沉默下来。夕阳西垂，飞鸟投林，陈布雷目送飞鸿，久久不曾开口。

想到这里，陈夫人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前往龙华寺，为陈布雷抽签问吉。

时局纷纷，前途难测。山门外，烧香的、问签的善男信女很多。王允默将手中的香点燃，绕签筒转了三圈，恭恭敬敬爬下磕了头，颤抖着手去摇签筒，口中默念“阿弥陀佛，心诚则灵。”

“啪啦”一支竹签掉出来，王允默一把抓过，心情紧张地看着，签为“观音灵签”第三签，签文是这样的：

冲风冒雨去还归，
役役劳心似燕儿。
衔得泥来成垒后，
到头垒坏复成泥。
是支下下签。

一霎时，王允默像一桶凉水从头浇下，血液都凝结了。签文中所云的燕子筑垒的垒，正是陈布雷别署“畏垒”之“垒”。陈布雷为国民党鞠躬尽瘁，又何尝不似“役役劳心”的燕儿。为蒋介石顶风冒雨，辛辛苦苦筑垒。然而，一生的心血白费了，蒋家王朝垮台在即，垒快坏了，又将成堆稀泥，这难道就是陈布雷的下场吗？

“一木难支，大厦将倾。”王允默哭了。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京的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均列席会议。

早晨，陈布雷从寓所的小楼上

匆匆下来，很快漱洗完毕，顾不上吃早餐，拖着病态和一脸倦意，坐车驰向国府路。

陈布雷怕开会，更怕见总统，但国事艰难，正需同舟共济，又不能不开会，不见总统。

会上，蒋介石宣布经济政策失败，他说政府取消“限价政策”，而要大量发行钞票，发行总额将不以二十亿元为限，竟可无限滥印。陈布雷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因为，这是一条绝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南京政府在加快自身垮台的步伐。

蒋介石一脸愠怒仍在斥责：“各单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党国前途丧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在总统府的门口竟问别人‘你有没有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

“甚至有个别党国中坚，在此多事之秋，以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诿的态度……”

陈布雷觉得，蒋介石的发言是针对他讲的，他感到对不起总统的信任。

刚才他在总统府门前下车时，好像是有人问他“你有没有准备？”他想起15岁时，母亲弥留之际，有邻居问他“你准备没有？”不禁打了冷颤。

蒋介石依然用嘶嘶的奉化土语杂拌着宁波官话说：“抗战建国，用了八年时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听后脸色苍白，浑身不住颤抖。

……

面对素白的八行笺，陈布雷怎么也写不出战时总体方案。当他还是一介布衣时，每次从杭州到南京，报界同仁就说：“看吧，又有重要的社论要发表了！”果然，第二天的大

报上，脍炙人口的大块文章在头版头条刊出，洛阳纸贵，传为美谈。别人陶醉在洋洋洒洒的掷地有声的万言文章时，往往以为是陈布雷文思泉涌，只有他自己明白这是怎样的呕心沥血。像一条春蚕，不论昼夜倾吐出雪白光亮的丝，不仅是丝，是它生命的一部分。而他现在已力不从心，心神委顿，吐出的竟是一条条殷红的血丝……

晚饭时，陈布雷吃得很少，临上楼前，郑重吩咐秘书，不要让客人打扰我，我需要休息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

陈布雷的八行笺上终于出现了字迹。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惫，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王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脑，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



▲图为蒋介石随从人员,右四为陈布雷。

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维，则生命便失去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写完遗书后，陈布雷思绪如潮，不能自抑，又写下《上总统书》：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累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自身已毫无可致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

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原谅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愆，况自问平生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谁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未敢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紧接着，陈布雷又用笔，用心血写下了《介公再鉴》、《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函及处理身后事务十则》、《致张道藩先生函》、《致洪兰友先生函》、《致潘公展、程沧波先生函》、《留交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先生并囑向中央诸友致敬之函》及《遗陈夫人书》、《遗陈公子书》、《于陶副官永标之手教》等12封遗书。

整整两个晚上，寝室灯光依旧。该交待的交待完了，陈布雷拿起瓶中的安眠药，一古脑儿倒出，一粒一

粒又一粒的服下，他安静地躺在床上，桌上数纸遗书，枕上二行清泪，窗外一天秋雨，他安静地去了。

黑色“十三日”

“13”的数字是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1948年11月13日上午10时许，秘书蒋君章与副官陶永标上楼唤陈布雷起床，当夺门而入时，“天哪！腊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儿温暖，等医生赶来时，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了失败。”

中午，蒋介石亲自前来，面对遗容，默默无言，绕了一圈说“好好的料理，我派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与政务局长陈方帮助料理后事。”

11月18日，中央社报道了陈布雷逝世的电讯，云：“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

3个月后，即1949年2月12日，蒋介石的至交，国民党内另一理论家，“笔杆”戴季陶在广州自杀。竟与陈布雷殊途同归。

又过了两个月，千帆竞渡，百万雄师下江南，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门楼的旗杆上升起了五星红旗。陈毅将军在部下的簇拥下，穿过走廊，跨进麒麟门，上了总统府六楼，打开了东面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宽阔的办公桌上，日历、文具、座钟依旧，但台历上的日期永远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二十二日。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终结，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22年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王晓华，43岁，副研究员，《民国档案》编辑）

（责任编辑：刘家驹）

军阀政客与风水迷信

○刘秉荣

34 袁世凯祭天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南北和议，北洋渠魁袁世凯夺得大总统席位，袁还想恢复帝制。其心腹张勋建议，请龙虎山的张天师进京相助，并谓“皇帝奉天承运，应天顺人，若不迎之入京，是逆天。”

龙虎山位于江西贵溪县西南部，由龙、虎二山组成，正一教的宫观座落于此间。

张天师即张道陵，是第六十二代正一教的传人。正一教创始人张道陵，张勋并建议袁先封后召。袁遂封张道陵为“正一嗣教大真人”

“洪天应道真君”。而后派专使赴龙虎山宣召天师进京晋见。

张道陵初奉召晋京后，袁世凯率文武百官到前门火车站迎接，时迎天师者数以万计。

是晚，天师向袁氏宣讲《正一法文经》、《修真要》等正一教经。袁听了大喜，认为有天师助自己成帝，万无一失，遂按天师之意，于京城中设法坛，坛明按八卦，暗合九星。并由士兵装扮成六丁六甲神。张天师披发仗剑，行着蹒跚步，高唱醮歌，声调昂扬转折。经过斋醮，张天师传下了

袁世凯 请张天师

玉牒金书。玉牒金书亦称“紫简”，即以“紫玉为简、生金为文、编以金缕、缠以青丝”所做成之书。袁世凯率文武大臣跪听张天师所宣之“玉牒金书”。天师大声道：“奉玉皇诏，天门开启，日月联璧，圣主当阳，人神共庆！”

袁世凯被奉为“圣主”。立即下旨重修天师庙，可惜没几日，袁世凯的皇帝梦就结束了。张天师的“洪天应道真君”的封号也就自然取消了。



吴佩孚 自诩 戚继光 转世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为北洋军阀中直系首脑，公元1874年4月22日生。其母生其时，其父吴可成打了个盹儿，梦见抗倭名将戚继光来到家中（戚继光亦蓬莱人），醒后方知南柯一梦，这时接生婆报：“老爷大喜，夫人生了一子。”

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进入家门，恰在此时夫人生子，料想此子不凡，大喜。——后来，吴佩孚便常自诩其为戚继光转世。

吴佩孚一生对中国的术数学狠下功夫研究，其行军打仗，多用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等术。因此，其一生从不把自己的八字告诉别人。以防

人之暗算。吴还特别崇拜关羽，军中供着关羽像，遇有难决断之事，就叩头求告。他不喜欢穿军服，而是袍服冠带，左右两个童子，一人为其捧青锋宝剑，一人为其捧古琴。吴常效法诸葛亮焚香抚琴。

由于吴极信易理之术，故行军打仗，必择吉日，且每次作战，都委派一参谋在早上观察天气，如果云生西北，雾长东南，便断定敌必从西北来，便于西北增加兵力，如果云从后方来，就断定敌人一定从后方抄袭，故当时在军阀中流传一句歇后语，谓：吴佩孚用兵——看天！

吴佩孚为了培训军队，请了日本人冈野增次郎做顾问，冈野是吴在日俄战争中结识的朋友。吴如今做了大帅，不忘故旧，亲自给冈野写了聘书，表示“自当焚香扫榻谨迎高车，并拟聘阁下为本署顾问”。

冈野得吴之邀，欣然来华，抵洛阳后，受到吴的热情接待，被安排在“戚光楼”住。吴还将一幅亲笔条幅挂于室内，其文为：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就在这时，河南的一个村庄里铁树开了花，消息传到吴的帅府，吴佩孚认为这是大吉之兆。遂写了颂诗，送与冈野。冈野接到吴的信后，恰好有吴养的一只白鸽飞入冈野室内，冈野诗兴大发，遂吟诗一首：

将军出世铁花发，
嵩洛山川王气开；
欲问扫清天下计，
白鸽一羽报庆来。

吴见了冈野诗，愈发高兴。恰逢其50大寿，那班捧臭脚的人将其捧为“蓬莱名将”。

1924年6月，曹锟指使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察赏请愿，围困黎元洪住宅，用断水断电等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而后贿

选曹为总统，自此，曹吴协手。是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十万火急地召吴入京，时吴正是其一生中登峰造极最盛时期，踌躇满志，图谋以武力统一中国，作诗以言其志：

龙泉剑斩血汪洋，
千里直趋黄海黄。
大禹神功何其伟，
洛阳一气贯扶桑。

18日晚，吴佩孚乘车抵北京，当晚，即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了“讨逆总司令军事会议”，到会的为直系将领60多人，当他刚宣布任命冯玉祥为讨逆第三军总司令时，突然电灯灭了，一直过了几分钟才亮。时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即在彭寿萃身边嘀咕，谓此乃出师不利之兆。吴佩孚也是极迷信之人，其目光冷森森地停在了冯玉祥身上。

说来也巧，此次直奉之战，由于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把曹锟赶下台，直系军阀从此一败涂地。吴佩孚由天津塘沽乘舰逃走。吴于甲板之上，回想不到一月，自己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弄了个众叛亲离，不尽叹道：

戎马生涯付东流，
却将恩义反为仇。
与君约雪黄州岸，
不管人间可自由。

1925年1月8日，吴佩孚逃到了川东，投靠四川军阀杨森，至此，吴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加感慨万端，吟诗道：

人生切莫逞英雄，
万事无知一理通。
虎豹还需防豺狗，
蛟龙最怕遭蜈蚣。
小人行路终须险，
君子困穷未必穷。
百尺楼船沉海底，
只因使尽一船风。

以赌咒主政的省长

周西成

民国初年，贵州省被主政的滇军唐继尧搞得民穷财尽，官场上极为腐败，百姓怨声载道。1926年布衣出身的黔军首领周西成出任贵州省省长。周为惩治腐败，将其所任命的省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带到城隍庙，面对城隍赌咒发誓，谓己如果贪赃枉法，将受到何种刑法惩治。赌咒时，有的官员说刀砍火烧的，有说挨枪子儿的。可谁都没当回事，只信口开河。周西成却对咒词执行得十分认真。谓己代替城隍执法。时独山县县长张五丰贪污大洋1000元，其咒语是若贪污即用九子枪打死。周西成即依其咒用九子枪将其枪决。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贪污大洋300元。周西成即按其说的若贪赃枉法，竹筒穿耳，游遍全省各县的咒词，用竹筒将其穿耳，披枷戴锁，坐无遮栏轿子，游县示众。后经黔省名流黄丕漠保释，谓拓虽贪污，尚不至死，已惭愧伤病交加待死。周西成才点头，拓羞归故里养病，众人皆谓其誓词中没说刀砍斧劈之语，若说了，便没了性命。周西成对亲信亦如此，其身边一李姓副官，被派到锦屏监发军饷，李自恃与周关系极深，遂截了团长周日璋大洋二百，又截了县长王铁棚的竹杠。王为人正直，愤而将李之挟势肥己的卑劣行径，举报周西成。周大怒，核察无误后，即按李之咒词，追回赃款，乱刀砍死。周西成的一个侄子，因贪污兵饷，被告发查实，周亦不留情予以枪毙。有一法政毕业生，被周派到黔东五县巡察。其

与一县长有瓜葛亲。那县长送其一口袋板栗，内藏50元。其人回家后发现，立时吓得浑身发抖，因其咒词有若贪污50元就下油锅。自此，每日魂不守舍，战战兢兢过日子。

周西成的城隍前赌咒之举，对惩治腐败确有显效。一时间，黔省上下官员，不怕犯法只怕犯咒。对制止官员的腐败，确起了一定的作用。1929年5月，周西成率军与滇军大战时身亡，其主黔政三年，管理方法虽近乎滑稽，但黔省风气和社会秩序都较好。他死后，人民为纪念他，特在贵阳市中心立了周之铜像。

阎锡山 寻吉利改地名



抗战不到一年，山西大部被日军占领，阎锡山遂带着第二战区党政军要人，跑过了黄河西，先到了陕北洛川。阎原想驻在这里，忽然觉得洛川二字不好，“洛”与“落”谐音，洛川即没落之意。而自己字“伯川”，若于此设司令部，是“伯川”入“落川”，是大将犯讳地名。于是，阎移师宜川。宜乃适宜之意，很适宜容纳自己这阎伯川。于是阎将司令部设在宜川的秋林镇。

1940年4月间，阎的战区司令部移往山西吉县南村坡。阎又认为南村坡之借音为“难存伯”，就是“难存他阎伯川”，于是，他下令将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改为“克难城”，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阎还给各机关的窑洞起了名字如“克难窑”等。

汪精卫塑像 落地而碎 大凶之象

1943年5月4日，汪精卫于凄风苦雨中迎来了他的60生辰，时汪派干将褚谊民在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为汪举行花甲日庆贺。伪首都警察所所长苏成德为拍汪的马屁，特请人做了一尊汪的瓷像，作为寿礼，不想其献媚心切，过于紧张，见到汪时，手一抖，竟将瓷像落地，摔得粉碎，汪见了，登时大惊失色，认为此像之摔碎，乃大凶之象，当场嚎啕痛哭，跌足捶胸道：“完了！完了！我的一切都完了！身败名裂了！”是日，汪伤感地写道：

六十年无一事成，
不须悲慨不须惊。
但存一息人间世，
种种还如今日生。

1944年11月10日上午6时，汪一命呜呼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部。果真“其瓷像跌的粉碎”矣！（责任编辑：刘家驹）

穆氏兄弟

谈

505 元气袋

穆氏兄弟出身于

游泳世家，电影《水上春秋》，就是写他们一家人刻苦训练，善池拼搏为祖国争金牌的光荣事迹。

游泳健将穆祥英，曾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穆祥雄为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国家队总教练，培养出女蛙王黄晓敏等优秀运动员。他是三项 100 米蛙泳世界纪录创造者。在欧洲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得 100 米和 200 米蛙泳冠军。穆祥豪曾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国家队总教练。最年轻的老弟穆祥杰是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 米仰泳冠军，接力赛冠军，四人中有穆氏兄弟三人。祥杰在迪那摩游泳运动会上荣获 100 米仰泳奖牌，震惊欧洲，他是我国国际级著名游泳裁判，中国

游泳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席。在北京举行的 21 届亚运会和上海东亚会上，均担任执行总裁判长。穆氏兄弟可谓泳坛一代英雄豪杰，享誉中外。穆祥杰实实在在地说：

我们兄弟出生在天津，长在北京，全家从事游泳运动，均进入国家队。在训练和竞赛中十分紧张激烈，饮食没有规律，都程度不同地患有胃病。劳累过度，腰肩疼，睡眠不好。多方求治，难以根除，影响生活和工作，让人烦恼。这次七运会上，给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发了 505 神功元气袋和 505 神枕，这些保健品，治疗我们的慢性病，挺对症，疗效好。神枕医好了我的高血压和失眠症，睡觉踏实了，工作起来提精神。有意思的是，我因公出国访问，我那位在大学任教的妻子，用上我用过的神枕，半月后，也治好了她的神经衰弱失眠症，她还给同事代买 505 元气袋，带上后治好了腹胀和胃病。小小红裹肚真灵验啊！在我的周围一传十，十传百，奔走相告，很多人得益于 505 元气袋。

更有趣的是，日前，穆祥豪从美国返京省亲，兄弟四人团聚，家人围桌就餐，自然聊起工作，谈起身体健康状况。除祥豪外，在国内工作的三个兄弟都用过 505 元气袋。用起来方便，内病外治，特别是治胃病及腰肩腿疼，疗效尤好。大家都谈及切身体会，祥豪听了我们的介绍，很感兴趣。他说：“我也买两个 505 元气袋带上试试，看看灵不灵？”如果疗效好，他一定会从大洋彼岸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

欢 迎 订 阅

《炎黄春秋》学术增刊

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炎黄春秋》杂志决定出版炎黄文化研究学术增刊。增刊编委会由著名学者戴逸、金冲及、冯其庸、张岂之、李学勤、姜义华等组成。主编李学勤，副主编王俊义等。

该刊辟有“文化研究专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中华文明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地域文化”、“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探索与争鸣”、“文化现象评析”、“学术动态与信息”等栏目，奉献给读者的将是各方面老中青专家学者最新、最优秀的研究成果。

第一期主要作者有：萧克、张岱年、戴逸、李学勤、金冲及、张岂之、温济泽、马少波、丁守和、顾佩、龚书铎、廖盖隆、刘梦溪、张立文、钱逊、苏双碧、刘起钊、罗琨、李绍连、葛荣晋、黄宣民、丁伟志、龚忠武、王俊义。

该期将于 1994 年 7 月 1 日出版，每本定价 7.50 元，购买者请将书款汇至：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 100802；联系人朗瑜；电话 6016633 转 227。

炎黄春秋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的二三事

他们创造了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蒋介石的匕首——戴笠

郭沫若和鲁迅的笔墨官司

惊世名记者法拉奇的中国情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